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39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9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版次/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登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主编 丁 江 高 厚
- 责任编辑 彭德才

湖南文史

19 3 90

目 录

(总第 39 辑)

· 革 命 史 话 ·

回忆我与毛泽东交谊二三事……………贺培真 (1)

同窗五载如兄弟——重洋远隔心相连——患难与共度难关

刘少奇和我家的交往……………洪克宗 (6)

攻读洪家——海外友谊——营救少奇——“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中”

记谢觉哉回乡召开林业座谈会……………吴岂凡 (12)

忆罗荣恒的故我行……………刘燕南 (16)

回忆解放前夕衡阳统战工作二三事……刘国安 卢其超 (21)

钻心战术话当年

——回忆我和姜亚勋的一段革命经历……………梅可华 (29)

智取遵义城……………朱永秋 (33)

· 抗 日 烽 火 ·

在抗战胜利的日子里……………郑洞国 (37)

从印度凯旋而归——胜利的曙光——狂喜的日子——上海
人民夹道欢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冈村宁茨的丑态

忆张治中在湖南致力于民众组训二三事……………刘树鹏 (42)

肖山令与南京保卫战……………郑绍周 (44)

在宪兵司令部——南京保卫战总指挥——下关喋血——自
杀殉国

长沙大火纪实……………许 权 (49)

蒋介石面授机宜——混乱的省会——纵火计划——火烧长
沙——祸首是谁

我在“中国驻印军”中……………贾维新 (57)

空运到汀江机场——兰姆珈训练二三事——三千华军保卫
加尔各答——参加密支那围攻城——八莫截击战和克底克
解围

望城沦陷时……………张 超 (71)

日寇犯境——罪恶累累——奋起反抗

临湘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机构内幕……………姚楚湘 (85)

我当维持会长的回忆……………张修运 (92)

· 湘籍国民党将领 ·

赵恒惕的军政生涯……………凌霄九 (95)

青少年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护国、护法战争——

驱张后的斗争——“援鄂战争”——当选“民选”省长
——谭赵之战——辞职下台——在省议会期间

回忆贺耀组.....周千贞(113)

略记先父何际元.....何衡生(123)

接受新思想——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立功——密谋起
义——湘中纵队——“丹心一点任浮沉”

· 往 事 钩 沉 ·

湖南省宪时期的选举戏法.....赵 恒(134)

湖南援鄂之役.....方鼎英(137)

北伐前夕国民政府派员联唐侧记.....张季任(140)

我所认识的几位长沙市长.....易甲熹(143)

王力航——梁霖——王秉丞——李毓九——汪浩——蒋琨
——陈迪光——任建鹏——吴博夫

· 民 族 史 料 ·

民国年间湘西苗民“革屯”斗争.....伍新福(177)

“苗防屯政”——民国初年的反抗斗争——大革命时期的
“抗租”、“反屯”——“永绥事变”和“革屯”运动的
兴起——“革屯”武装起义及其发展——“废屯升科”和
“革屯”军受编抗日

· 工 商 经 济 ·

- 外国洋行在长沙的经济掠夺.....罗立德(191)》
长沙开埠的历史背景——洋行操纵着长沙市场——洋行成了历史的陈迹
- 回忆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谢庆利(200)
- 浏阳花炮古今谈.....汤万全 杨敬儒(204)
- 中美药号与益阳西药业.....张永年(208)》

· 社 会 生 活 ·

- 衡阳市的“丐帮”.....周 沛(210)
- 桃花江的迷信活动.....刘建帆(216)
- 澧县禁烟见闻.....郭德山(225)

· 台 岛 追 忆 ·

- 湖南花鼓在台湾.....唐友邦(228)
- 回忆“台湾军校”.....杨异撰(232)》

回忆我与毛泽东交谊二三事

贺培真*

我自1913年春与毛泽东同学起，与他的交谊达60年之久。现将其中二三事回忆如下：

1913年春，我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恰与毛泽东一起同在新生第一班，我俩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合并到第一师范学校，我俩恰好又一同被编入第八班，同窗研读，朝夕相处，长达5年半之久。

一、同窗五载如兄弟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我与毛泽东都爱好体育运动，是运动场上的一对健儿。毛泽东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支配下，对各项体育运动都爱好。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体操等活动，样样皆能。而我只偏爱个别项目。毛泽东有意邀我一起参加踏雪、游泳、泛舟等活动。他对我只偏爱某一两个项目，深感遗憾，并多次进行耐心的启发和规劝，曾对我说：“你有锻炼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

*贺培真原名贺果，为音乐家贺绿汀之兄，邵阳桂江乡人，是毛泽东的同班好友。

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

读三年级那年，我的爱好转到了足球方面，并且很快表现出特长，跑得快、跳得高、动作灵敏，成为湖南第一师范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中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选派7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3名：我和陈绍修（赞周）、彭道良（则厚）。我们3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那天晚上10点钟启航前夕毛泽东匆匆赶来，在船上找到我们3人，送来一部《红楼梦》，让我们在船上好消磨时间。第一次长途旅行，大家没有经验，未曾想到在旅途中会困得发慌的，而毛泽东却体贴入微地替我们想到了。我接过《红楼梦》，心情非常激动。毛泽东就是这样赢得了众多同学的敬佩和信赖，与大家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1917年中秋节晚上，毛泽东邀集了10多个同学去水陆洲泛舟。在铜园局附近雇了两只小船，绕过水陆洲，又从北头逆流而上。是夜皓月当空，清光万里，大家谈笑风生。船行不久，毛泽东提议背诵唐诗中的诗句，要求每句含一个“月”字，看谁背的多。我记起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中含有“月”字的诗句不少。我便与张昆弟、罗学瓚、陈绍修等人竞相背诵起来：“海上明月共潮声”，“何处春江无明月”……。琅琅诵读，阵阵笑语，与欸乃的桨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船到水陆洲南头，毛泽东和大家下船后就露宿在沙滩上。大地作床，青天作帐，卧听湘江波涛声，不知东方之既白。

1920年9月26日，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仍回忆起这次快乐的中秋之夜，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旧历中秋，去年今日已到上海，前年今日却在保定，再前年今日却在长沙。是晚还作环水陆洲舟游，同船10余人，尽乐而归……。”

二、重洋远隔心相连

1918年秋，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以后，虽想继续升学，但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只好作罢。恰巧这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切合我的心愿。毛泽东知道我求知欲强，想继续升学，便把赴法勤工俭学的事通知了我。我接到通知后，便向长沙一个同乡借60元钱作旅费，和李维汉、李林、张昆弟等20多人一起来到北京。毛泽东帮助我们到保定育德中学赴法预备班学习。我在保定学习一年，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都是毛泽东、蔡和森到华法教育会要求解决的。伙食费有时接济不上，我只好去买烧饼充饥。保定冬天比湖南冷得多，滴水成冰。我缺衣少食，便和几个同学用棉被取暖。毛泽东支持和鼓励我们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我们与毛泽东之间不仅书信来往频繁，毛泽东还特地从北京来保定商量、处理赴法的具体事宜，看望同学、朋友，畅谈人生理想、革命道路，大家还一起摄影留念。

1919年冬，我们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利用报刊与我们这些身处异域它乡、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保持着友好联系。

我们在法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接受新事物，投身革命洪流。我与李维汉、李林、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发起组织工学世界社（前身叫工学励进会），我还是工学世界通讯社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蒙达尼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讨论。还从工学主义思想出发积极参与了“改造中国者——回国后怎样做？”这样实际问题的讨论。当毛泽东知道工学世界社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后，曾高兴地说：“我们总要有主义地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创办《湘江评论》，驱张（敬尧）反赵（恒惕），形势大好。毛泽东没有忘记告诉昔日的同窗好友，他应罗学瓚寄报的要求，把刊登这些消息的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寄给在法国的同学，使我们能经常了解祖国的革命形势，从中得到鼓舞。

毛泽东不仅利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刊登赴法同学写的通讯稿件，《湘江评论》被迫停刊以后，还向湖南《大公报》等报刊推荐发表留法同学的文章。1920年10月29日，我在法国哈佛柳工厂写了一篇《我鼓工的感想》，经罗学瓚转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篇文章后，热情地向湖南《大公报》推荐，该报于1921年1月17日发表。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竟给加了200多字的“编者的话”，高度赞扬这鼓文章是“一锤子一笔，一凿于一字”写成的。

三、患难与共度难关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我与毛泽东的联系时断时续。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我亦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着。建国初期，我出任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是时即与毛泽东恢复了交往。在北京开会时，毛泽东多次单独接见过我，叙旧情，谈未来，同窗情谊依然如昔。第一次接见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在，我以为你向阎王报到去了！”我向他汇报了在革命征途中经受的挫折，诉说了李立三执行错误路线时开除了我的党籍。毛泽东安慰我说：“开除了惕好，不然，你一定完了！”1953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这个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终于恢复了党籍，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与老同学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毛泽东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贵阳市中小学教育工作情况。1952年12月5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贺果兄：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亲笔给我复信：“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笃念旧交，情见乎辞。

1973年1月，“四人帮”猖狂肆虐。我将自己的危难处境，以及胞弟、音乐家贺绿汀身陷囹圄的情况，一一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我兄弟是十分了解的，他决定出面帮助。有一次，毛泽东当面责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了？不要整了吧！”结果在周恩来的具体过问下，终将贺绿汀从上海“四人帮”的监狱里救了出来。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的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才得以免除。当时我正在北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我闻讯弟弟出狱了，顿时热泪纵横，无法控制自己。这时，我非常想见到毛泽东，表达无限的感激之情，也非常想见到在监狱呆了7年之久、备受摧残的弟弟。但我以为见毛泽东的机会还会有的，就赴上海去见弟弟贺绿汀去了。谁知，就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了。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不顾耄耋之年，曾两次进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一代伟人长眠了，留给我们以无限的仰慕与绵绵的思念。

（姜道友整理）

刘少奇和我家的交往

洪克宗*

我的父亲洪赓飏和刘少奇同志是同乡，又是同岁。少奇同志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1月24日，比我父亲整整大一个月。他从12岁起就在我家设立的私塾读书，与我伯父和父亲同学两年，之后又一同读高小，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两人没中断联系。

1925年12月16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刘少奇同志由上海回湖南养病，被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逮捕。当时，我的父亲任湖南省禁烟局长（又名厘金局），也是政界中的一位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格外震惊，因为知道共产党人被逮捕的严重性。于是，与各方面人士配合，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青年时代的好友少奇同志保释出狱。现在我把我祖母及母亲所谈及的有关情况缕述如下。

我的老家原在宁乡县芳储乡洪家大屋，是一个封建的旧家庭。从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且历任清朝京官及地方官员。

*洪克宗，与刘少奇同志同乡，与父亲刘少奇交往甚多。

我的祖父只20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我的伯父洪迪光和我的父亲。伯母没生儿子，父亲就把三哥过继给伯父做儿子，我是第四子。

我出生在长沙市。到了6岁时，住在宁乡老家（洪家大屋）的祖母要我下乡伴三哥读书，当时保国民学校就设在我家中。我和三哥放了学就坐在祖母那红漆饰金的富丽堂皇的宁波床的大踏板上，听祖母讲故事，其中就听到了关于刘少奇同志青少年的一些情况。

祖母青年丧偶，她便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当我父亲6岁的时候，祖母即聘请了老师在家课读。

杨毓群老先生是当时家乡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他又名绍云，人们尊称为“绍云六公”。这位老师不但旧学根底很好，而且适应新潮流，读过一些翻译的外国经典名著，思想比较进步。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很少见的。一些人听说洪家聘请杨老先生专教自家的两个孩子，便纷纷要求送子弟入学。祖母都一一婉言谢绝。惟有炭子冲刘家要求送刘少奇来读书，祖母却欣然同意了。祖母说：“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他衣着朴素，很有礼貌，谈话不多，年纪不大，却显得很懂事；我看他一定会读书，将来必定大有出息……”。

刘少奇原名渭璜，家住炭子冲，距我家约10里。为了读书方便，1911年到1912年间，十二三岁的少奇同志就住在我家。他对杨老先生十分尊敬，读书又十分用功，深为杨老先生所器重。由于杨老先生的辛勤教导，三个学生的学习都进步很快。而且他们以后也都认为杨老先生的教育使他们得益非浅，常常怀念这位好老师。

少奇就读我家，祖母就要我父亲照刘家排列的顺序称少奇为九哥，要少奇称我父亲为庚弟，称我伯父为长哥。而他和我

父亲也确实如亲兄弟一样，每天谈论学习，砥砺志行，食同桌，寝同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两年之后，1913年（民国二年）少奇与我父亲同时考入县城玉潭学校。玉潭小学毕业后，两人又一道去长沙升学。少奇考入长郡中学（因收费较少），我父亲考入明德中学（当时两所学校都是湖南省会有名的学校）。之后，少奇于1919年在北京、保定等地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了苏联。我父亲与他分别后，去日本东京进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父亲在日本期间，两人还经常书信往返，没有中断联系。

1921年家父从日本回国，少奇同志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通过少奇同志的介绍，家父与我母亲结婚。母亲姓袁，名素，字荏苒，出生于宁乡一个书香之家。由于外祖父思想开明，她得以到长沙、上海求学，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师（与革命老人姜国仁同学，感情深厚，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及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母亲文学基础很好，擅诗文，长于音乐，婚前是位教师，她是在上海与正投入革命洪流的少奇同志认识的。父亲从日本回来，开始步入政途，不论工作、生活，母亲对他的帮助都很大。两人结婚6年，生我兄弟4人。1928年我父因生腰痛，不幸病逝长沙。那时我才两岁。随后不久，我那伯父也不幸逝世了。

二

1925年12月，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少奇同志领导了上海大罢工。因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下午1时，少奇同志到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被扭往戒严司令部。赵恒惕下令将少奇同志逮捕入狱。

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经第二天的长沙《大公报》登载后，全国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援救，通电多的一天达40多份，刘少奇同志的亲友也纷纷营救。少奇同志被捕时，家父正在长沙任湖南省禁烟（鸦片烟）局局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设法营救。当时，家父还只27岁，风度翩翩，又是留洋归来，深为当道者所赏识，遂委以禁烟局长重任。省禁烟局先设洪江，后移长沙，专掌鸦片烟税收工作。为了押送税款，禁烟局还配备了武装。当时，大量鸦片从云、贵等省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是个总关卡，税收不少，尽是白花花的银元。禁烟局是一个很为人羡慕的机关，当权者及大小军阀无不眼睁睁地注视着这个机关，而这里的收入却又无不为当权者攫夺而去。正由于这样，所以家父和当时官场中的头面人物来往很多，关系密切。

赵恒惕统治湖南好几年，是督军，又是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握生杀予夺权柄。他下属的四个师长中，贺耀组、叶开鑫二人都是宁乡人，且叶的军饷大都由我父亲直接拨给，所以关系不同寻常。另外，我的母亲因我父亲的关系也与赵恒惕、贺耀组、叶开鑫的眷属有所接触，尤其是叶的太太和我的母亲关系更为密切，如我母亲若有几天未去她家，她就要派人来接去。少奇同志被捕后，由于我父亲一再拜托叶、贺，我母亲又奔走于叶、贺、赵之间，早晚探听消息，一直奔忙了一个月，再加上党的营救和社会上各条渠道的协同努力，少奇同志才在我父亲等具结担保的情况下，于1926年1月16日得以获释。

我父为支持和接济少奇同志读书、革命及保其出狱，用钱是经常的。光保刘出狱那一次，就用了1000元左右。我父有一张乾隆皇帝的御笔字，价值600块银元，为了保刘，这张字也送给叶开鑫了。父亲还在银楼订制了一套银餐具，叫周维宾送

给了叶开鑫，请他力保少奇同志。周维宾还说，为营救刘，我父亲曾多次写信由他送到叶、贺的办公室或家里。同时，父亲还曾在长沙市天乐居、怡园酒家两次宴请湖南军政要人，请他们出面保释少奇出狱。少奇同志出狱后，到广州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受到广州各革命团体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父亲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可说是闹差事，是在金钱里打滚。可是，他律己较严，去世时家中没有添一亩地，置一点产。他病危时握着我母亲的手流着泪说：“真对不起你，连你和孩子们的住所都没有留下……”，那时我们住的是佃了人家的一所房子。父亲死后几年，母亲就带着我和两个哥哥搬回宁乡石塘冲居住。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就在抗战后不久，少奇同志从陕北延安对我祖母和母亲寄来了信和照片，表示了真诚可贵的关怀。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他在信中建议我们兄弟去延安学习。祖母因我们还小，只同意17岁的大哥去。大哥单身离家，终因年小和途中多阻而无法到达延安。为了早日从戎杀敌，他就投考了当时的中央军校。之后，我二哥又考入了空军学校，1943年，当日寇大举进犯湖南，我初中毕业后也考入了军需学校。解放后，我又考入了中南军区军需学校。

土改后，我母亲孑然一身，又不能躬自耕种，就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来了信，大意是告诉我母亲可去省文教厅请求分配工作，如不怕苦，可去北京学习。于是母亲去省文教厅联系，领了去北京的路费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经少奇同志批示，我母亲进了华北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毕业前的

一天，母亲正在上课，一位政治干部告诉母亲：有位中央负责同志要她去一下，车子已经到了外面，要她收拾书本马上去。原来是少奇同志派了汽车来接我母亲做客。这次，年过半百、白发盈头的母亲终于见到了阔别26年的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询问了我母亲的饮食起居，还亲切地垂询了我们兄弟的情况。当时，三哥虽在湖南大学毕业了，但抗战时曾被日寇打伤，遗留下间歇性的精神不正常症状，另两个哥哥均在解放前夕去台湾。说到这些，母亲隐隐流露几许悲伤。少奇同志便安慰她说，台湾一定会回归大陆的，分离不会长久无期。当天少奇同志还接待了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和我母亲一同被邀入席。席间，这位老人提出请少奇同志赠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饭后，少奇同志欣然在两张六寸照片上签好名分送给他和我的母亲。少奇同志还问我母亲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母亲告诉他说就是眼睛不好了，缺少一副老光眼镜，看书写字有些困难。少奇同志当即从他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副他自己用的眼镜给我母亲。母亲试了一下，正好合用。

这天，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也会见了我的母亲。因当天王光美同志的母亲和她有约，所以她未吃午饭就和我母亲告别了。光美同志亲切而平易近人的神态，也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母亲吃过午吃，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少奇同志又送我母亲上了汽车，离开了他家。这是解放后我母亲与少奇同志仅有的一次会见。

1977年母亲身患肠癌逝于宁乡城，终年84岁。1980年侨居国外的哥哥先后回国观光，并拜扫父母坟墓，看望洪家大屋，还专程去炭子冲瞻仰了少奇同志旧居。在外宾留言簿上写下了“您那富国强民的思想，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词句，表达了海外侨胞对少奇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

记谢觉哉回乡召开林业座谈会

吴 邕 凡*

1957年4月，谢觉哉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宁乡县沙田乡兰馥冲。在几天的接待群众中，了解到家乡山林破坏严重，群众意见很大。4月8日下午，谢老便在自己家里召集当地基层干部开了个座谈会，研究如何采取紧急措施，抢救林业的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有县委派出机关黄材办事组主任蔡声华、沙田乡党委书记陈应生、沙田乡觉委办秘书严志述、西湖农业社社长肖枯全、沙田农业社社长谢岳云、宁乡县副县长尹泽南、宁乡县公安局局长严仁贵，我和谢老的秘书吉世霖、高世文等也参加了座谈会。由我和吉世霖作纪录。

首先我向谢老介绍来人的姓名、职务，谢老很客气地一一握手，请大家坐下来。

谢老说：“我是回来看望你们的，你们工作辛苦了！我在家，接受你们的领导，多批评吧！家乡人，不要见外！”谢老这么谦和和平平易近人，严肃、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消散了，大家亲热地笑开了颜。

我叫来了茶，大家边喝茶，谢老边说：“我这次回来，看到了家乡可喜的变化，在你们辛勤的工作下，今后的变化会更大、更好。但是这几天也有许多人对我说，山里砍光了，没柴

*吴邕凡，参加了当时的座谈会，并担任会议记录。

烧，没木材用。我想，我们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这不就是人民的利益吗？”不知门外谁说了一句“有米无柴真难煮”。谢老就接着说：“听，这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吧！”谢老转头向门外望了一下，回头又对大家说：“记得30年前，我地山上有许多大树，伸手还抱树干不了（做抱树的手势）。我出生的那个肖家湾屋后山上，这样的大树就不少，楠竹也多，小时在树荫下真好玩，屋对门河堤上，也有很多大树，特别是‘油子丘’那田垅头有个大乌柏树，两三个人也抱不来。热天，老乡干活休息，就在这些大树荫下，不必回家。现在山上、河堤上那些大树，一棵也不见了，歇荫的地方没有了，你们说，这些大树怎么都全砍光了？”

沙田乡党委书记陈应生说：“这些大树砍光了，全怪我们没管好。”谢老马上插话说：“我不是要追你们的责任，而是了解一下情况，想出补救的办法。”陈接着说：“我地很穷，土改后，人民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很高，但缺农具、家具，还是个困难，要添东制西，就砍了些树；另外，为了扩大耕地而积，增加收入，毁林开荒，也毁了不少树。如我乡云阳社（谢老：就是云阳庵、清安佛祖那一块地方吗？陈：是的。）开荒作旱土，就达三分之二的山地。（谢老，开的那些土，经得起天旱吗？陈：都不大景气。）沙田农业社社长谢岳云说：

“毁竹开荒，同杀鸡取卵一样蠢。”谢老说：“对！”沙田乡党委办严志述说：“干部极据自身需要也砍了一些树，当然无法制止别人砍了！”西溯农业社社长肖祐全说：“贫下中农从土改中分得了树山，到手的是财，只图眼前，不想长远，也是个原因。”黄材办事组主任蔡声华说“山林砍伐得不成样子了，有些山头就象和尚的头，光秃秃的了。我们没有及时制止，教育群众从长远利益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

谢老说：“我看也外不了是这些原因，这样所造成的恶果

是穷山恶水。山光了，发春水，大量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粮田受害；山上没有树林复盖，益鸟益虫无处栖身，影响了生态平衡，说不定以后要向虫口夺粮；另外，对调节空气，影响气候，造成干旱都是严重的。那么山林破坏，是百害而无一利。再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生下来，没有一天不要同木材打交道的，农具、用具，无木不成。总之，这成了一件天大的蠢事。”

这时，谢老秘书高世文以谢老年事已高，又有高血压病，不能长谈受刺激，提议休息10分钟。谢老只好招呼大家休息10分钟再谈。休息时，蔡声华拍着我的肩说：“谢老早回几年，山林就要好得多”。我又叫来茶，谢老招呼我：“喝完茶，请大家坐拢来谈吧，他们也工作忙。”我说：“你老支持得来吗？”谢老说：“行，可以的！”

会议继续进行，谢老说：“刚才大家谈得好，使我明白了一些情况。我们还是继续谈下去，山光了，已是客观存在，我想今后怎么补救，请大家出出主意。”

陈应生说：“只有赶紧把山林封起来，看能救得这现存的一点树木不？”大家都同意封山。谢老说：“光封山不够，还要育林。封山育林，十年树木吧！封山要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记得以前有‘禁山会’，是群众封山育林的自发性组织，订了乡规民约，很有作用。现在不知还有没有？”谢岳云说：“土改时把它作封建组织打烂了，‘禁山会’还有点基金，也当封建财产没收了，我看要恢复。”谢老说：

“我记得那时的‘禁山会’，对保护山林很有作用。这不应该打烂。譬如我们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火车是资产阶级下的产品，是现代有力的交通工具，有益于人民，就不能因为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而把火车也打烂吧！山林已破坏到这种程度，还不抓紧抢救，将来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陈应生说：“马上发动群众，封山育林，不准再乱砍滥伐了。”

严志述说：“封山育林要与禁止毁林开荒结合进行，严重的地方要退耕栽树。”蔡声华说：“干部再有砍树的，要绳之以法。”谢老插话讲了一个风趣的故事：“有个人起了新房子，墙壁粉刷一新，唯恐别人画坏墙壁，就在墙头写了‘此壁不能画’的话，一个傲性人路过，看了很不服气，自己画坏还下命令，真气人，就在那主人写的下面接写一句‘自己画得我也画。’过几天，又一人路过看了好笑，针锋相对，于是接着写一句‘要画大家画’。你们看，这道墙要不被画坏，还能吗？”蔡声华说：“谢老说的，我理解了，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今后干部砍树与庶民同罪，官官相护，群众就是不服气，我们再不能手软了。”

谢老说：“会开得很好，问题摆出来了，认识统一了，办法也想了。今后我和你们一道，积极行动，10年树木吧！过10年，我一定回来看深山密林的家乡新林业吧。”陈应生说：

“谢老，承您指导，我明天就去开一个农业社的会大力封山育林，取得经验，全乡铺开，年底把情况写信告诉您老！”谢老说：“好！好！等着你的来信。”

暮日照紫扉，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谢老的家。

谢老回京后，又写信给我补充了意见：“就是要教育群众对树木有感情。要使大家爱大树如爱老人，爱小树如爱小孩，有了这个感情，即使要砍树的人，走到树前，也下不得手了。”

忆罗荣桓的故园行

刘燕南*

1956年9月，罗荣桓同志因病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职务后，日常工作负担本来可望减轻，但不久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感到需要用较多的时间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作些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于是，他在初冬的11月，偕同夫人林月琴，带了女儿巧巧，以及秘书、医生、管理员等几个随行人员，从北京乘火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只住了一晚，便在四十七军政委张天云的陪同下，乘军用吉普车南下，途经大托铺、易家湾和湘潭等地，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包括今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

那时，我在衡山县委办公室任综合干事，记得早前一个深夜，衡阳地委用电话告诉了县委，但当罗荣桓同志到达县城的那一天，县委书记和县长均下乡去了，只好由在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心平和县兵役局长郭耀武两人负责接待。

上午11点，胡、郭二人估计罗荣桓同志一行快要到达衡山城了，便守候在县委机关门口迎候。可等了半天，只见门前广场上开来两辆空着的吉普车。一打听，才知道罗帅一行在后面步行。因为那天正是衡山县城的墟期，赶墟的人特别多，我

*刘燕南，当时在衡山县委办公室工作，参与接待了罗帅。

们生怕罗帅一行有什么意外，正准备派人分头上街去找，只见罗帅身着褪了色的黑呢中山装，头戴呢解放帽，脚穿布鞋，手策拐杖，安详地和随行人员一道从县人委后门穿过广场走了过来。

原来罗帅一行乘坐的吉普车驶进县城北门时，他们便舍车步行。罗帅边走边看，操着一口地道的衡山方言，在北街这家摊贩、那家店铺面前问这问那，并在四牌楼（十字街口）一家小百货店门前停了下来，向一位年岁很大的售货员问好之后，便打听一位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位姓邓的补鞋匠的下落。当他听说这两人均已去世时，他的眼睛湿润了，长叹了一口气说：“多好的人啊！”因为在大革命时期，姓赵的钟表匠所开的店子就是当时县委的联络点，罗荣桓同志在这里与县委负责人接过头，所以认识了这位钟表匠。那姓邓的补鞋匠是罗荣桓同志在1927年夏离家赴武汉路过衡山县城时，发现有人盯梢，他急中生智，装做补鞋，在姓邓的掩护下，才摆脱了敌人。虽然事隔多年了，罗荣桓同志却还牢记在心，怀念着这两位为革命做过贡献的普通群众。

当罗荣桓同志一行穿过广场时，郭耀武急忙跑步上前致敬，行了军礼。罗帅热情地与老郭握手，连说：“同志，你好！”郭耀武紧握着罗帅的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罗帅回来了！”这一喜讯不胫而走，传遍了县委机关院内，人们纷纷鼓掌，争着和罗帅握手。胡心平、郭耀武将罗帅一行迎到了县委会楼上一间陈设简朴的小房子休息。老胡抱歉地说：“我们县委没有添置一点家具，连张沙发也没有。”罗荣桓同志坐在一张竹做的围椅上笑眯眯地回答：“这很好嘛！这竹椅子准是我们草市、南湾一带的特产罗”。老胡请示罗帅是否要县委书记和县长面来一下，罗帅说：“县委书记和县长能带头下乡，这是种好风气，不要喊他们回来了！这次，我不

过是路过这里，顺便看望家乡的人民。”老胡又问他是否打算回南湾老家？罗荣桓同志回答说：“到了县委，就是到了家里一样嘛！”他的这些话，包含着多少深情厚谊啊！

罗荣桓同志在县委没有要老胡、老郭等作工作汇报，而是从谈家常入手，涉及到多方面。他老人家问了县委机关的房子够不够，食堂生活需要多少钱一月，干部下乡怎么坚持学习等问题，也问了白莲寺的向家、富塘的罗家、石湾的刘家、后山的赵家这些在解放前全县著名的望族有些什么变化，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外面读书、做事……。他一边听取接待人员的回答，一边感慨地说：“过去这么大一个县，就给这几家望族把持了，若经过一番暴风骤雨，这些地主庄园是冲不垮的。”他老人家接着又说：“这几个家族过去的读书人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有，这些读书人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有用处呀！”罗荣桓同志用一分为二的观点，阐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罗荣桓同志在谈家常中，还从坐着的竹围椅，把话题引向了他对青少年时代一系列的美好回忆。他说：“我小时候曾去过杨林四峰山十八湾岭上，看到那里大的楠竹可以做饭甑，粗杉树可以凿棺材，不知现在怎么样？要是全县的山山岭岭都和四峰山一样，我们的用材就不成问题了。”他勉励家乡人民进一步搞好绿化。又从洙河的自然风光问到治水问题，说：“白茅洲、去洲、小岳洲这些洲上，一到秋天，白芦红桔，碧水蓝天，交相辉映，至好看哩，只可惜洙河水浅、滩多，不利于舟楫；特别是大岳滩、三钵花这几处地方，礁石多，水流急，船工见了就害怕，不知现在怎样？”当接待的同志告诉他，县委即将拟订一个全面的治水规划时，他频频点头说：“好！”并一再叮嘱县委要切实抓好治山、治水，把家乡建设好。

罗荣桓同志一行在县委只停留了两、三个小时，随即驱

车直奔南岳，视察了祝融峰农业社，会见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康菊英，在店门前公路旁的一户社员家里听取了康菊英汇报农业社的情况。康菊英用南岳山下的清泉水泡了一壶云雾茶给罗荣桓同志一行解渴。罗帅接过一杯茶，风趣地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杯茶，我一定把它喝完。”他老人家问康菊英：

“社员有钱用吗？”

“有是有一点，但还不够。”

“这是句老实话，没有吹牛皮。我看这户社员家里，虽是栋茅屋，但还整洁，有点兴旺气象。房里也有点新用具，不过衣食住行要统统改善还不容易，要努一把力啊！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寻个门路抓些现金。”

康菊英向罗帅汇报了农业社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的情况，诸如搞了纸槽造纸，板车运货，水库、山塘养鱼，还组织了社员上山采药、打猎，或在家织草席……。罗帅听了很高兴地说：“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衡山人有句俗话，不要织了箍去买鸭蛋——大的也不要，小的也不要，农业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呀！”

康菊英还请求罗帅对农业社的工作多作些指示。罗帅谦逊地说：“我是个带兵打仗的，没有直接抓过农业生产，今天是特地向你们内行来请教的。”他笑了笑又说：“你是劳动模范，又是人民代表，今后你要多把一些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反映。”

在南岳，罗荣桓同志一行还游览了大庙，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他一再指示陪同他的地方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在半山亭的玄都观前，他看到一个石狮摆歪了，立即动手把它扶正。在福严寺看到一块木刻浮雕被损，他当即指出：“这是一件多么精致的艺术雕刻啊！任意破坏，岂不是败

家子？”

罗帅有非常丰富的文史知识，在磨镜台，他给陪同人员讲述了磨镜台的来历；在邨侯书院，他谈了这位唐代历仕三朝的中兴名臣李泌的故事。

罗帅教育地方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宗教政策。半山亭派出所一位同志向他汇报，有个尼姑想还俗结婚，但当地佛教协会的负责人不同意，应怎么办？罗帅笑着说：“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有的人看破红尘，有的人迷恋红尘，但谁也超脱不了红尘，这是个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要禁止他们还俗，也不要去强令他们还俗。要对这些人多做工作，使他们既懂得科学，也懂得民主。”

在祝融峰的望日岩侧，罗帅视察了高山气象站。这个站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从部队转业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常年坚持在这云雾山中与雷电风云打交道，不但工作辛苦，而且生活也较清苦。特别是一到秋冬，他们的生活物资均是靠肩挑背负从山下运上山来，好不容易！罗帅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盛赞这批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勉励他们扎根高山，进一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当罗帅了解到这批年轻人大部分尚未结婚时，就向站长老韩建议：“这个问题要很好帮助解决，不要把气象站变成了和尚庙。”

罗荣桓同志一行，当晚宿于磨镜台，招待所的人要为他们设宴洗尘，元帅坚决劝止了，只叫厨房炒了几样简单的菜，还请人弄了些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吃得津津有味。他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说糙一点，但营养价值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罗荣桓同志一行1956年回衡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给家乡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回忆解放前夕衡阳统战工作二三事

刘国安 卢其超*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渡江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即将解放的局面已经十分明显了。国民党营垒开始动摇，除少数顽固分子坚决与人民为敌外，许多人面临新的政治抉择。有识之士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积极寻找关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多数人则徘徊观望，想了解党的政策，寻找出路。这些人只要我们注意争取，就有可能弃暗投明，倒向革命。这种形势，对于地下党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衡阳是交通枢纽，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根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衡阳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南下大军解放衡阳，尽最大努力保护城市和交通，使衡阳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为此，工委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大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依靠进步人士，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由于衡阳市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时间不长，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力量还不够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统战策反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既重要又突出。

*刘国安，当时任中共两衡工委书记，现任省政协副主席；卢其超，当时系地下党员，后任衡阳市政协副主席。

衡阳工委的统战策反工作是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省工委深刻分析了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内部的分化、湖南地方势力与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加剧。这样，在思想上使我们对开展统战策反工作的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组织上又先后直接给我们转交了一些重要的统战关系，为我们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9月衡阳工委成立时，省工委即将刘公达（曾在长沙任国民党保密局少校科长）和曹润生（律师，市参议员、副议长）两个进步人士的关系交给我们。长沙和平解放后又转来了军统湖南站站长（起义人员）等在衡阳的友好关系。刘公达和曹润生这两位衡阳工委开展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起了不少作用，他们掩护党的干部，广泛联系非党民主人士，如谢晋、胡济石、肖企云、刘劲先、何一平、刘子直等，向我党提供敌人情况。在解放前夕，我们充分利用了所有这些关系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同时，还充分发挥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使统战策反工作更加有力地开展了起来。

一、对粮秣厂的策反

1948年10月，联勤总部命令第七粮秣厂与所辖新乡、洛阳、开封等几个分厂合并迁至衡阳组建衡阳独立粮秣厂，由原第七粮秣厂陈东江（少校）任厂长。通过刘公达和电厂技术课长于坚的关系，我们对陈东江和该厂的情况有所了解。陈在伪满洲国时期求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后又亲眼见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败，他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技术军官，在职工中有威信。全厂共有200多名职工，大部分是从河南随厂迁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不愿继续往南撤退。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定争取这样一个后勤工厂脱离国民

党当局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于是决定对陈东江进行工作。刘国安亲自与陈接触，帮他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了解党的统战政策和各项政策，使他解除顾虑，表示愿意弃暗投明。

1949年4月，联勤总部命令衡阳独立粮秣厂限期迁往重庆，并拨了经费，给了车皮。陈东江感到为难，既想靠拢我们，又不敢违反联勤总部的命令。在这样关键时刻，刘国安又一次做了陈东江的工作，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使陈东江坚定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决心。

经过磋商，为了应付联勤总部的命令，避人耳目，厂里派了20多名职工，装了几个车皮的废旧物资，经湘桂铁路撤往西南，绝大部分职工和重要的设备、资产皆留在衡阳。解放后，刻厂价值几十万元的主要设备、库存几万斤粮食和警卫班的枪支弹药等均完整无缺地由我们接管，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大西南。

争取了陈东江之后，厂内成立了党的支部。党员刘正平、刘泰来等在职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于是，这个后勤工厂就成了挂联勤总部招牌，实际上是在地下党领导下的重要据点。工委利用这个据点进行了活动，大量刻印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解放前夕，从农村调来少量地下武装，隐蔽该厂，以备保护交通之用，又为地下工作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卢其超同志在该厂挂职作为掩护，从事市区党的工作。

二、对粤汉铁路局的统战策反工作

从衡阳的情况出发，保护铁路交通是衡阳地下党配合南下大军解放衡阳的一项突出任务。在铁路的地下党组织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团结广大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

坏斗争，从衡阳机场运出一批武器隐藏在苗圃一带秘密进行武装护路准备。当时，在敌人反动军警武装统治之下，仅仅依靠工人武装护路，是很不够的，需要同时采取其它办法。这时，省工委给衡阳工委转来了两个统战关系，即王家骏和王长溪，还转来了中统湖南站站长（起义人员）给粤汉路局警务处长的信件，信中内容是劝其起义。地下党组织便通过这些关系开展工作。王家骏当时是铁路局总工程师室主管电务的高级工程师，刚从美国回来，人很活跃，关心政治，和路局上层有往来，在路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是一个很能发挥作用的统战对象。王长溪是从武汉来的，说是王家骏的亲属，住在王家骏家，实际上他是来做王家骏工作的。铁路地下党总支派袁树椿同志先与王长溪取得了联系，然后通过王长溪争取团结了王家骏。同时还通过别的关系，争取团结了其他两位有影响的技术专家：机务处长顾启文和局总工程师林诗白。这样，地下党总支就能运用这些铁路上层人士的影响，由他们出面，采取合法的形式开展护路斗争。在路局未迁往广州前，利用合法的“应变会”，安定人心，阻止了职工自发的南逃风。路局南迁后又争取成立“北段管理处”，并利用“北段管理处”进行工作。以顾启文、王家骏为首的“北段管理处”完全接受地下党总支部的领导，他们同时还和广州路局派来的人周旋，于是当时“北段管理处”实际上成为一个“两面政权”。它公开以行政领导的名义，配合地下党，组织职工坚守岗位，出资收买爆破队，保护器材设备。在真空期间维持铁路秩序，将铁路基本上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作出了贡献。

对路局警务处长的策反工作是工委直接派文传源同志持信前往进行的。对此人事先作了调查，有了初步了解，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派人护送文传源前往，由文单独进入宅内，递交信件，初次接触，没有公开身份，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又

再次前往，以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劝他和平起义，戴罪立功，放弃武装镇压，保护铁路职工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表示愿走和平起义道路，行动上也有些表现。后此人前往广州开会，去前还征询过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由他自行决定，去后没有再回来了，但未发现有破坏迹象。

在临近解放的关键时刻，为防止敌军撤退前的破坏，铁路地下党总支采取了疏散散散的措施。首先把机关的重要文件和图表，包括粤汉铁路全线桥梁、涵洞等各项重要设施总图表隐藏起来。接着又尽可能地把重要设备予以疏散和隐蔽，如铁路机厂的两台发电机、电务段的两台散波机，都分别疏散一台，留用一台。剩下的问题是机车，根据机务段地下党员的建议，决定对车房主任段超英进行策反。此人政治态度不明，平日与交警有些联系，散反会有风险。为此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事先由机务段地下党员安排好时间、地点、约定联络暗号，由他们带路和放哨，然后派陈剑夫前往，与段直接谈判。陈剑夫要段认清形势，投向光明，按我们的计划和要求疏散机车，为解放衡阳做好事，散表示接受。事后了解策反发生了效果，阻止了十多辆机车南移。

三、为保护邮电、银行、电厂所做的统战策反工作

保护邮电、银行、电厂等单位，是保护城市的重点。在衡阳的三个地下党组织，都分别在这些单位互相配合地进行工作。如电信局，我们指派原参加过民盟的地下党员戴受祺，继续保持盟的关系，与在电信局的盟员、局测量台主任蒋介石卿保持联系，经常接触，商议保局迎解的散施。在衡阳临近解放时刻，由蒋介石卿配合华中区直属支部在该局的地下党员进行护局工作。蒋利用测量台主任的职权，采取拆散、迁移、以旧换新

或以废代新等办法，将测量台重要机器设备和关键器材加以隐藏保护，终于使测量台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在邮局，地下党支部按照工委的部署，在局内发动群众，掌握了“应变会”的合法组织，成功地开展了保局护产工作。同时还对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衡阳邮政汽车站做了工作。在衡阳即将解放、该站奉令撤回贵阳的关键时刻，支部派党员王展楮、李培德到该站通过宣传教育，争取团结了站长李学元，使他下决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抗命撤回。为掩人耳目，采取拆除招牌紧闭车库、拆卸藏匿等办法，使邮政设备继续留在衡阳迎接解放。

湖南省银行衡阳分行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复兴银行工作的地下党员粟受祺，为了扩大党在金融界的影响，利用同行关系，与省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张天禄结交朋友，当工委得悉“华中长官公署”命令该行将全部库存上缴“国库”的关键时刻，立即派粟受祺前往该分行说服张天禄进行抵制。张天禄接受了地下党的任务，团结留守职员，采取委善办法，抵制了上缴“国库”的命令。在深夜两点钟，秘密地将一万一千多银元装成六箱投放在水井里，并由会计连夜在账表上做平，应付了检查，保住了库存巨款。接着，“湖南省政府驻衡办事处”又令该行全部撤往邵阳，张天禄又采取了拖延办法，把所有物资包括大小汽车、电台、长短枪、档案、账表等保存了下来。

衡阳电厂的安全对市内生产和市民生活至关重要。白崇禧部撤离衡阳前夕，派了一小支武装进驻该厂安装炸药，准备爆炸，湘南所属的衡阳工委在该厂的地下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护厂队，为保护工厂的安全开展了斗争。我们通过该厂技术课长于坚，推动进步人士、厂长潘培系出面与之周旋，应潘培系要求，由我们出面筹集一笔银元，用以收买敌军士兵。我们便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与商界人士有联系的党员滕国祯。滕国祯会同商会内的民盟成员李超丸和新远东酒家店主丁子钦，在商界长郡同乡会同仁中筹集了500银元（解放后此款归还了有关人士）送交潘培系。在商界人士的支持下，地下党组织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保护电厂的艰巨任务。

四、策动杨晓麓和平起义

长沙宣布和平解放后，我们也积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放衡阳。工委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当时衡阳市市长杨晓麓有可能接受程潜影响举行和平起义，于是便确定杨为统战策反对象，并决定首先由党员粟受祺，通过民盟渠道了解杨晓麓的政治态度。进步人士屈子健与湘南所属的衡阳工委有联系，受命动员杨晓麓举行起义。屈对杨十分了解，他给粟受祺提供了杨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对杨的情况有所掌握。就在这时，省工委给我们送来了长沙起义人员写给王继武的信，内容是要王继武动员杨晓麓和警察局长胡笃一（王继武的女婿）举行起义。我们便通过谢晋、刘子直、刘劲先、肖企云等进步人士进行了解，摸清了王继武的情况，认定王继武是值得信赖的人士，再由刘公达、曹桐生打通关系，由党员粟受祺到王家送信。接着工委又写信敦促王继武加紧进行动员工作，仍由粟受祺送往王家。王转达了杨、胡二人接受和平起义的意愿，粟受祺便以复兴银行职员身份，到杨家拜访探明情况，证实了王继武所提供的情况，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工委认为与杨直接会谈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当时形势已十分紧迫，机不可失，于是决定由卢其超代表工委秘密到杨家直接与之会谈。杨第一次面对共产党的代表，心情十分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卢其超对杨的进步表现加以鼓励，同时阐明衡阳解放在即，举行和平起义机不可失，杨

听后郑重地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决心。鉴于当时白崇禧仍坐镇衡阳，杨的实力不足与之抗衡，一致商定起义时机定在南下大军与白部接火之时，卢其超还责成杨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和在白部撤离、解放军入城前负责维持城市治安。事后了解，杨、胡为和平起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由于白崇禧多疑，对杨晓麓不放心，为防止杨受程潜影响举行起义，先下手将杨裹胁到桂林，致使起义未能实现。

五、策动商界人士出面维持城市治安

从白部撤离到解放军入城之前的这段真空期间的城市治安，原拟由杨晓麓、胡筠一起义后负责维持。在杨、胡起义未能实现之后，工委对维持城市治安问题又作了研究，曾设想动用衡西游击武装入城，但难以掌握时机，不便施行。最后决定策动商会出面，党员滕国楨利用他与丁子钦的关系，做商会理事黄匡伯的工作，取得他的同意，以商会名义组织纠察队维持城市治安。丁子钦是新远东酒家店主，当时在衡阳帮会中有一定影响和实力，我们想借用他的力量为解放事业效力，便对他进行了教育，讲明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交待了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要他为人民做好事，丁子钦接受了，表示一定约束他手下人员，决不胡来，坚决按地下党的安排具体组织纠察队，负责在市内巡逻，维持治安，结果起了相当好的作用。在白部撤离、解放军入城前两天多的真空期间市内没有发生一起骚动和抢劫事件，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钻心战术话当年

——回忆我和姜亚勋的一段革命经历

梅可华*

回忆起来，那还是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的1939年11月，国民党部队第十一师，守备洞庭湖南岸和湘江西岸三角地带，防止盘驻在汨罗江以北地区日寇的进攻的时候，姜亚勋同志来到该师参谋处任上尉参谋，我们同在作战科工作。我是参加过大革命的青团员，但失去了组织关系，曾因在工厂组织罢工和宣传抗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方获出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去当时在上海抗日前线的十一师工作。后来我随十一师调湖南。

姜亚勋同志来后，我们同吃、同住，彼此有了共同的思想语言，所以很快成了知心朋友，互相透露了过去的经历。姜当时告诉我，他事先曾去长沙，找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人和老师王凌波同志，要求介绍他去新四军。由于刚发生“平江事变”，王不同意姜的要求，要姜自找工作，并说只要能参加抗日就行。所以，姜找了他的亲戚谢某，谢把姜介绍给第九战区军务处长贺某，贺再把姜介绍给比较开明的十一师师长叶佩高，这样姜才到十一师工作的。

*梅可华，抗战时曾与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同志在十一师工作，积极抗日，并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有密切联系。

当时，我们在工余经常漫步于岳麓山头，徜徉于爱晚亭畔，共同谈论抗战前途，寻求革命道路，对于国民党怠于抗战，积极反共，深感痛心疾首，何去何从，内心彷徨无主。于是姜亚勋同志提醒我，何不一同去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请示徐特立、王凌波同志，我欣然同意了。大概是在1939年12月或稍后，在一个黄昏，我们一同横渡湘江去长沙，无比兴奋地在白沙井见到了徐特立、王凌波同志。经过姜亚勋同志介绍，徐、王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详细向徐、王同志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并重点汇报了我们在十一师的有关情况。我说：“十一师师长叶佩高比较开明，对我们也很信任，可以利用。为了对付日寇的南侵，我和姜亚勋同志一起努力争取叶佩高积极准备打游击，并在衡阳创办师教导队，招收爱国的青年学生，积极培训作为打游击的骨干。而姜亚勋同志家在宁乡黄材山区，人事地理均极熟识，到时尽可以全师隐蔽到山区，继续坚持抗战，我们还利用检查湖防工事之便，分别到望城、新康、靖港、临资口等地，联系当地学校和坚持抗战的地方人士，相约一旦战局有变，实行军民协力，坚持抗战；我们还购买国际新闻社编行的《国际通讯》和《神明的子孙在中国》等进步书刊发到连队，以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增强爱国主义观念，坚定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并推动叶佩高把部队的臂章代号改为‘爱民’两字，以严肃战地纪律，加强军民合作关系。”所有我们在十一师的这一些做法，深得徐、王的鼓励和赞许。对于我们为抗战前途耽心，王凌波同志指示说：“国民党专闹磨擦，我们必须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办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分裂投降，坚持抗战。”关于当时国民党正在部队搞强迫集体入党一事，我特地请示徐特立同志应该怎么办？徐老答复我说，“万不得已，为了坚持抗战，可以从权。”这一切指示，无异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1940年2月，我们再一次去看王凌波同志，谈了一下抗战发展形势。王介绍青年方簠来十一师工作，我们托人事参谋沈润生代为安排到参谋处当文书。王还嘱咐我们：“你们只要呆在那里就行，不要进行组织活动，才不致出麻烦。”1940年4月，十一师要开往湖北当阳阻击日寇西进，临走之前，我和姜亚勋又特地到八路军通讯处辞行。我们交谈了日寇进攻的动向，王凌波同志告诉我们说：“部队开往当阳，方簠就让他回来，不要去湖北了。”所以在部队临出发时，我们就让方簠借口请假回去了。至于方的政治面貌，王只说是一个进步青年，并未介绍其它情况，姜亚勋也未跟我谈及其它。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我认为姜亚勋同志和王凌波同志之间，决不仅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当时姜亚勋曾经告诉我，他参加革命，受王的影响最大。特别是1937年冬，他们在长沙见面长谈，给姜的启示很深。所以在1938年秋，姜从军校逃回湖南，可见这不是偶然的了。姜来十一师工作以后，又经常与王凌波同志联系，直到十一师开往当阳，因转战鄂西，天天打仗，无法联系，我们才与王凌波同志失去关系。

我对于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深感愤恨。于是在1940年11月，坚决脱离了十一师，转到重庆的国际新闻社工作。“皖南事变”后曾决心去延安，因道路被封锁未成，只好留在重庆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为了妻儿的生活，后又转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粮食部工作，并经常把可以测算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力量的“田赋征实、征购进度表”等机密材料，提供给石西民、梅益同志转呈党中央。我就这样钻进国民党的心脏为党工作。

1945年7月，姜亚勋同志辗转去到重庆，经原第三师参谋长孙鸣玉介绍到军令部一厅一处当参谋。我们分手五年又重新聚首，畅叙离情，真是无比高兴！1946年2月，姜亚勋同志忽然告诉我，他决定跟孙鸣玉去济南工作。我听了以后，深感气

愤。我对他说：“目前政治协商会议虽已圆满结束，而国民党却借助美国的援助和日本投降的部队，妄而独占胜利果实，企图消灭共产党，阴谋已露端倪，抗战虽然胜利了，国共两党终将一战。再去干国民党部队，就是反革命。”姜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说：“你看问题机械！我在国民党部队干了几年，有些人事关系可以利用，这次我去，决心一手抓钱，一手抓枪，拖枪起义，从国民党部队内部烂出来。”我听了更是怒不可遏：“你说得漂亮！其实是想升官发财，去杀人放火，我看不惯，我们从此绝交好了。”姜说：“只要你能找上关系，我们就一起到解放了的江汉区去。”我说：“现在就是找不上关系啊！”姜说：“我这个人是在‘身在曹营心在汉’，过去如此，现在仍是如此。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等将来的事实证明好了。”

1949年2月，我在南京一方面从事地下军事情报工作，一方面担任《联合晚报》通讯版的编辑。我在收到的香港《华商报》上，连续发现关于姜亚勋同志1949年2月，在湖南宁乡举行黄(材)唐(市)起义，及以后进行英勇的游击活动的种种报导，使我不禁喜出望外，这样才知道老战友确系矢志革命，已“从国民党军队内部烂了出来”，高举武装斗争的义旗，真是难能可贵！他在国民党部队所干的“钻心战术”，比我更为艰苦困难。我当年在重庆不该和他剧烈争吵，乃至绝交，完全是对他的误解，想起来不胜后悔！于是，我便万分高兴地把这一批新闻报导，集中撰写成长篇通讯。用“缘洲”的笔名在《联合晚报》上刊出，标题为“请看今日之湘西，竟是谁家之天下？”报纸发行后，使国民党的“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大为震惊，该部政治处主任罗春波特向《联合晚报》社社长王淮冰同志，提出严重警告，必须立即撤掉我的编辑职务，否则，就要把我装麻袋抛进长江里去。经过再三托人关说方得从宽处理，以把我调任秘书了事。这是一段惊险的历程，至今难以忘怀。

智取遵义城

朱水秋*

1935年1月4日，我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黎平整编后，向乌江进发途中，师政委刘亚楼跑来命令我们，他说：

“四团已控制了乌江，上级决定，你们六团立即渡江，直取遵义城！”刘政委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快速攻下遵义城，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开通路，减少损失。”并说：

“为了保证我军的胜利，刘伯承总参谋长也随你团渡江前进。”接令后，我们立即行动，连即打起数十只竹排。当时的部署是：我率一营和侦察排为先头部队，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二、三营随后，团政委王集成率团直属部队为后卫。全团渡江后，休息了一小时，即向遵义前进。

行军约30华里，部队便找了个村子驻扎下来。据侦察员报告，再往前约20华里有个团溪镇，驻有大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外围营。我考虑要取遵义城，必须先扫除外围营，即布置夜行军，拂晓前赶到。我命令一营包围团溪镇西面，二营包围北面，侦察排则对遵义大道封锁消息，不准任何人通行，我自己则率三营从东南面取包围形势。随后，我即将这一部署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作了汇报，他听后说：“同意你们的部署，要取遵义必须不放走一个敌人。你们六团在中央苏区打了很多胜仗，这次取

* 朱水秋，浏阳人，1909年生，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当时任团长。

遵义任务很重，敌人在城内有一个旅二个团的兵力，又有坚固的工事，必须谨慎从事，决不可大意轻敌。”这时，王政委已率团直属部队摸黑前进，于5日凌晨赶到了团溪镇外。部队稍事休息后，天忽然下起滂沱大雨，黑蒙蒙的一片，敌人还在睡梦之中，除了嘀嘀嗒嗒的雨声外，几乎没有其它动静。我军冒雨从四面发起攻击，枪声雨声交织在一起，顽固死守的敌营长被我军当场击毙，其余守敌措手不及，全部乖乖缴械投降，当了俘虏。

休息了一天，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集合俘虏训话，说明我军是拯救穷苦老百姓的正义之师和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说明当时红军生活困难，红军当兵的没钱发，但给俘虏兵每月发三块银洋。话音未落，忽有一个被俘的高个子连长说：“以前听说你们是绿眼睛、红鼻子、割心脏、吃肝肺，真吓死人，今天眼见为实，才知道你们也是穷人，是好人。过去我们受了骗，上了当，现在我们当了俘虏，你们不杀，还讲政策，百闻不如一见，事实证明你们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打遵义要我带路，我愿意帮忙，争取立功。”我怕有诈，又找这个连长交谈，进一步了解遵义城的一些情况。经过反复做工作，他答应听从指挥。

在一间简陋的营房里，我和各营指挥员们反复研究敌情和战斗部署，一致认为，敌强我弱，硬拼硬打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智取。大家认为可以俘虏伪装成敌人开道，我部尾随而攻之。当即我把研究结果向刘总长作了汇报，他斩钉截铁地说：“装敌要装得像，敌强我弱，走漏了消息就不好办，行动要快，要造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次行动就叫‘朱团长智取遵义城’”。得到了刘总长的赞许，我特别高兴，浑身充满了力量，叫他们每人背两支枪，把枪机卸下，装成敌军模样。并告诉那个连长，如果城楼上问话，就回答是外围营的，营长

被“共匪”打死了，他带领剩下的一部分人跑回来了，快请开城门救兄弟们（反复教过多次）。

是日深夜约12点，我们轻装出发。一营和侦察排为前卫，佯扮敌军，由一营长曾保堂率领，我走在二、三连前头，刘总长、王政委率二、三营随后，全团向遵义急进。雨不停地下，风不停地刮，夜幕降临了，伸手不见五指；只得扯衣拉手，鱼贯而行。出发前我命令：“在黑夜中急行军，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准讲话，如果先头部队在进城时，与敌人接了火，后面的部队要跑步前进，只准进、不准退。这次战斗，是考验我们每个同志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下遵义城！”在黑夜急行军征途上，有的同志跌进了溪边与路沟里，有的跌断了脚、手与负伤的，始终没有一人讲话叫痛的。后速部队将人扶起来用担架抬着又急速前进，就像一支离了弦的箭快速地向敌人射去。

行军约4个小时，有个农民向导小声地对我说：“长官，前面有火的地方就是遵义府”，曾营长也从前头回来向我报告说，离城仅5华里，我传令原地稍息后，继续前进。逼进城边时，特地要俘虏的那个连长佯作惊慌状态逃跑，城楼上喊话：“你们是哪里来的？站住！”那个连长答是“外围营的”。“你是谁？”城楼上又再喊话。“我是一连连长，营长被打死了。”连问三遍，连答三遍。城楼上仍不开门，过了一会儿，俘虏中的一、二个贵州人，按照我们事先嘱咐的办法骂了起来：“共军到了团溪镇，我们来送信，你们不让我们进城，让我们送死，你们还有良心没有”。城楼上的敌人骂骂咧咧地吼道：“你们不要急，吵个啥子，先等着，老子去问一下城防官就开门。”这时我心里很紧张，暗想敌人硬不开门，我们也到了城楼底下，就搭人梯打攻坚战与他拼到底。大约过了20多分钟，敌人又问：“你们到底是哪一支部队的？”又重复了刚才的答话后

才打开城门。进城之后，侦察兵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争先恐后解决了城楼上的敌人。紧接着，集合全团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来。喊杀声四起，枪弹声震耳欲聋，一阵猛攻，我们如同天兵神将在几分钟之内就占领了城内的制高点，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有的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哭着叫着“长官饶命”，高举双手，投降缴械。也有一部分敌军拼命顽抗，我们就展开你死我活的巷战，激战两个多小时，直至上午10点左右，占领了遵义城，终将守敌一个旅二个团打的落花流水，四面溃逃。我们紧追残敌直至80华里的桐梓县。智取遵义城，我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

1935年1月6日，朱德总司令进城，宣告遵义解放。户户红旗招展，炮竹喧天，迎接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进城。为毛泽东同志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福林整理）

在抗战胜利的日子里

郑洞国*

1945年夏，在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下，我率中国驻印军班师凯旋。回国后，新一军、新六军未及休整，即先后开赴湖南芷江和广东湛江一带，积极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原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随即撤销，我留在昆明待命。

在这稍前，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与美、英军队会师于易北河。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东方战场上，法西斯日本亦连遭惨败，曾逞凶一时的日本海空军和部分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英盟军消灭殆尽，而占其总兵力60%以上的侵华日军也在中国大陆愈陷愈深。从5月份起，侵华日军被迫开始由湖南、广西、湘桂路及粤汉路撤退。中国军队节节进击，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福州等重要城市，以及湖南、广西、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广大地区。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也积极向日寇发动局部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战争的进程表明，日本法西斯距离最后的覆灭，已经不远了。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多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 郑洞国，石门人，抗战中曾参加台儿庄、昆仑关、缅北等战役。该文系作者在抗战胜利之际，率部由昆明到柳州、上海、南京，目睹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等有关情况的回忆录。

是年8月，美军强大舰队不断向日本国土逼近，并于8月6日、9日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政府亦于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很快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对于战争前途已经完全绝望了的日本天皇，被迫于8月10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消息迅速传来。8月15日，当重庆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激动振奋的声音播放出这一特大喜讯后，祖国各地顿时一片欢腾。“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激动得难以自持，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加入到欢乐的人流中去，和人民一起庆祝这伟大的胜利。此后一连许多天，人们都是在狂欢的气氛中度过的。大家不知疲倦地唱呀、跳呀，大街小巷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群。锣鼓声，鞭炮声，连同人们纵情的欢笑声，汇成一片，震耳欲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的这首名诗，确能反映出当时长期饱受战乱之苦、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的中国人民的极度欢愉心情。

自日本天皇正式向国民发布投降诏书后，侵华日军陆续停止了军事行动。8月21日，日军乞降使节今井武夫少将一行8人飞抵芷江。由我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召晤，向其指示了在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有关事宜。这就是有名的“芷江洽降”。

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授权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全权负责中国战区内所有日军的受降工作。根据我方的指令，共计1283000余侵华日军先后在12个战区和四个方面军向中国军队投降。曾几何时，这些法西斯侵略者骄横不可一世，甚至狂

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经历了8年的生死较量,现在终于向中国人民俯首屈服了!

我在抗战期间,南征北战,鞍马劳顿,现在总算胜利了,心中着实高兴。在昆明期间,朋友们你来我往,终日摆酒欢宴,暂时把一切都忘到了脑后。但这种轻松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便接到了就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的委任令,随后便与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一起,前往设在柳州的方面军司令部视事。

大约在8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第三方面军另一位副司令长官张雪中将军首先进入上海。当我们的军队排成数列纵队,威武雄壮地开进上海城时,上海民众万人空巷,热烈地夹道欢迎。那一天,数不清的工人、学生和市民,手执彩旗、花束,涌满了我们的街道两侧,甚至连路旁的屋顶上,也站着欢呼的人们。许多青年男女学生争先恐后地将成束的鲜花抛向士兵的行列,抛向我们乘坐的车辆。队伍进入闹市区后,拥在街头的人愈来愈多,很多人干脆冲过军警的警戒线,流着热泪拥抱战士们,并簇拥着军队向前行进。由于人多路阻,队伍不得不走走停停,从机场到设在外滩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竟整整花费了几个钟头。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无不为一上海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所深深感动。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从“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整整逝去了8个春秋,上海沦陷区的人民终于第一次重新看到了祖国的军队,终于盼到了祖国光复的一天。此时此刻,有谁能抑制住自己由衷的喜悦呢!

抵沪不久,我便前往南京处理公务。

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附近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签署了投降书。

一星期之后的9月9日，在南京，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又隆重举行。斯时我恰在南京，有幸参加并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庄严的一幕。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选在陆军总部礼堂。那天，礼堂大厅正中墙上高高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大厅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对面设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受降席与投降席均以白绸环绕。左侧是我们所在的中国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军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仪式的共有1000余人，整个仪式气氛庄严、肃穆。

签字仪式定于上午9时举行。8时56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空军上校张廷孟等四名我方高级受降官入场。何应钦将军端坐于受降席正中，其余四名受降官分坐其两侧。紧接着，一名中国将领引导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侵华海军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日军参谋长谏三春树中将等日方投降代表入场。进入大厅后，他们面对受降席站好，规规矩矩地向中国受降官员鞠躬致敬，经何应钦将军示意允许后，方逐一坐在投降席上。这时大厅两侧座席上有些骚动，人们注视着面色阴沉、神情沮丧的日军投降代表，不时低语。我在战场上与日寇周旋多年，却还是第一次看到冈村宁次等人，长久以来聚积在胸中的仇恨、愤怒和作为胜利自豪情感不由地交织在一起，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9时正，司礼官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开始，大厅内顿时肃静。首先由小林浅三郎上前，以立正的姿式双手将证明文件呈递给何应钦将军。何氏认真审阅后，即命萧毅肃将军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付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接过降书，显得有些慌张，签字时，手微微颤抖。签毕由小林将降书呈交给中方受降

官员，何应钦将军亦在其上签字，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至是礼成。冈村等一行人听到命其退席的指令，在众目注视下，垂首走出大厅。

随后，何应钦将军即席发表了演说。我还记得他的演说辞中有这样几句：日本法西斯侵华军队的投降，是中国人民8年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亚洲以及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希望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奋发努力，迅速完成国家光复大业，永远维护中国和世界和平。

遗憾的是，后来中国时局的发展却有悖于何应钦将军的宣言。由于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了一场骨肉残杀的内战，重把国家推入苦难的深渊。人民在抗战中赖以苦撑8年的希望破灭了，但又在新的希望中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再经数载英勇奋战，终于创建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郑建邦整理）

忆 张 治 中 在 湖南致力于民众组训二、三事

刘 树 鹏*

1937年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提出了“保卫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口号，并制定了施政纲领和组训民众方案。首先是号召在校肄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集中接受短期军训后，由省民训总队派他们回到原籍县、市去，具体进行民众组训工作。当时，我正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长沙办事处”的乡村教材编纂室工作。“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先生接受了湖南省政府的委托，紧密配合当时正在积极开展民众组训工作的需要，由“平教会”承担了编写民训教材的任务。教材分为二十四课，用活页印行，每课一张，一面印课文的正文，一面用图画来解释课文，不加装订，用一个纸袋装好，大批大批地印发下去，供回乡学生在各乡、保进行组训时宣讲。

为着全面开展民训组训，作好保卫湖南的准备工作，省府创办了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张治中兼校长。分设各种短期训练班，其中有个乡镇长班，由于校直接招考学员，受训三个月后，分派交各县政府任用，打破了原来由县长委派乡镇长、省级不过问的老规矩，这是张治中在湖南的一个创举。由

*刘树鹏，衡东县人，当时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长沙办事处乡村教材编纂室”工作。

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接训练乡镇以下的保一级干部。首先经省府决定由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主持创办的保学校长训练班，可算是张治中在湖南的又一创举。

1938年5月间，在原衡山县吴集乡五里坪，临时搭起两栋人字形的大茅棚，一栋作课堂、食堂用，一栋作受训学员住宿用，受训学员来自衡阳、常宁、衡山、安仁、酃县等五个县，共约五百人左右。当时主持这个保训班的总负责人，就是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孙则让（别号廉泉，山东省人）。在主办保训班期间，他是认真负责、全神贯注的。当时创办这个保学校长训练班的意图，是要在基层建立一个文教中心，用保学校长来代替旧保甲制的保长，以保为单位的学校，除办小学教育以外，还要办成年教育，把扫除文盲和组训民众结合起来，期能逐步做到融管、教、养、卫于一体，纳男、女、老、少于一校，以政为教，以教推政，敌人不来时，则各搞各行各业；敌人若来侵犯，则立即动员，齐心抵抗。

张治中对这个保学校长训练班的创办，是很重视的。约在开学后的半个月，他就亲自来到吴集乡五里坪，在补行开学典礼中发表了重要讲话，首先讲述当时抗战形势，着重在鼓舞全体学员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讲完话后，他还到吴集乡公所视察。当时任吴集乡长的向梅卿，正是经省行政干部学校受训结业分派回县来的。他以省干校学生的名义，向省主席兼校长当面作了简明扼要的吴集乡政教概况报告。张治中听了后，表示满意，说了些鼓励他的话。事后，向梅卿和我谈起这些情形时，还表现出眉飞色舞，由衷地感受到做一个乡长能够得到省政府主席当面嘉奖为荣。直到1976年我寄居在坪源时，和当地一些老年人闲谈，一谈到张治中到过吴集这回事，他们还说：“在旧社会，象省政府主席这样大官，不摆官架子，亲自到乡下来看一看、讲一讲，真是了不起啊！”

肖山令与南京保卫战

郑绍周

八年抗战，以首都南京的沦亡，最令炎黄子孙没齿难忘。因为日寇在那儿留下了永远无法洗清的血债，而守城军民孤忠碧血，誓死抗敌的精神却光耀千秋，为我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志节，写下不朽的篇章。本文所要介绍的肖山令将军，就是抗战军兴，敌骑兵临城下，临危受命，带领军警部队誓死捍卫首都南京，最后城破军溃，杀身成仁的一位民族英雄。

肖山令，字铁依，清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出生于益阳县四方山祖宅。幼承庭训，6岁入私塾研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成绩优异。由于满清政府腐败不堪，强邻入侵，频遭败绩，有识之士不得不起来过问国事。到19岁那年，感于国难严重，他再不愿摇头晃脑啃线装书了。

肖山令婚后未满3个月，即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研习军事。他当时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满清不断丧师辱国割地赔款，原因在于国防力量薄弱，常常引起愤慨难平，立志要以“兵符在握，一扫群魔”，拯救国家的危亡。

肖山令于1914年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当时保定军校学生都是军学优秀知识分子，为各方争相罗致的对象。他25岁，以优异成绩毕业，但尚无涉世经验，已深知北方军人领导阶层，都是个人利益重于国家利益，为了各人的名位，不惜干戈相见，因此毅然鄙弃财高势重的诱惑，投效偏向革命的湘军，在蔡锷部担任排长。

1926年，肖山令35岁，随贺耀组参与北伐，先后任营长、团长、参谋等职务。1928年三军统一全国之后，他在家乡益阳任职，时间虽短，但对桑梓建设尽心尽力，颇有治绩。到1929年，肖山令38岁，由于志向仍在军事，他辞去地方职务，重披战袍，5月调任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随长官吴思豫接收青岛、济南，同年12月奉令编并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建制。

肖山令40岁时，三军要建立完整宪兵制度，他倾个人军学才华，辅佐编订各项计划，使全军性的宪兵司令部在1932年1月16日于南京正式成立。肖山令担任总务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并成立两个宪兵旅、一个特务团，及车站、船舶、邮电检查所。1936年3月，肖山令服务宪兵已达10年。这10年正是宪兵部队的开创与成长期，他运筹匡赞、任劳任怨，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深得各级长官的嘉许，由上校处长擢升少将参谋长。他虽然不是黄埔出身，却在首都济济人才中出类拔萃，节节上升，若非有真才实学，何使如此。根据将军旧部属口述，他虽然学习军事，但言谈举止中溢出儒者的气质，从不盛气凌人，思考事物则条理分明，缜密周到。如此才德兼备，体国公忠，所以在1937年3月又升任宪兵副司令，时全国宪兵团队，已扩充编成，执行任务。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浩劫，虽然国人知道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但没有想到来得那么快。在1937年11月11日由于在淞沪会战失利，我军忍辱退出了上海。日军随

即垂涎近在咫尺的首都所在地南京，计划用闪击战方式在京沪一带消灭我陆军主力。

政府洞悉日军这项战略计划，为了实行长期的抗战国策，宣布迁都。可是南京终究仍为我国首都的所在地，绝不能拱手让敌。除了将主力部队向内陆作有利的转进和部署外，另以最精锐的宪兵部队一万多人，以及两个陆军师和工兵部队驻南京，拱卫首都。

二

当时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已有重病，无法指挥部队作战，所以接到武汉就医时，就把宪兵司令、警备司令、防空司令等职务，都交给肖山令代理，从此肖将军成为拱卫首都的实际负责人。肖将军知道南京孤城已危在旦夕，顾虑到宪兵部队的栽培不易，不能全军覆没在南京，因此将司令部大部分人员先撤往湖南长沙，自己则统率宪兵五个团及军警人员三万多人固守南京。

南京保卫战是自11月18日起，到12月13日止，前后历时26日夜。先是11月日军分兵西进，对南京采取大包围态势，以一部分兵力进据芜湖，断绝我军后路，一部分兵力偷渡长江，袭击我军侧背，正面主力则攻陷句容，占汤山、淳化、牛首山、大胜关，直逼紫金山、大教场、雨花台等地，南京形势岌岌可危。

11月26日，战火已迫近了南京城郊，守城部队进入战备位置。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寒风刺骨，阴雨连绵，淞沪线上的难民和国军伤兵拥塞道途。

关于当时肖将军对南京保卫战所下达的作战命令规定两点：

一、清凉山防区：由宪兵两个团一个重机枪营归罗友胜任总指挥官统一指挥，防区为清凉山、草场门、定淮门到老虎洞止。二、明故宫防区：由宪兵两个团及重机枪连归陈烈林任总指挥官指挥，迅速进驻明故宫机场、复成桥与三十四标附近的防线，并均适时机动支援前线据点作战。

11月底，日军已将南京城完全包围，但若干外围据点仍在我军掌握中，集中火力坚强抵抗，所以日军仍不敢长驱直入。经过了10多天的苦战，日军以极优势的陆空军投入战斗。12月初，第一线我军早已渡过长江，南京成了一座孤城，剩余的兵力，只有肖将军的宪兵部队和陆军的两个步兵师。

12月9日7时左右，日军首先攻进光华门，占领警官学校，再由光华门向通济门攻击。肖将军以据守通济门的教导总队兵力薄弱，即刻命令据守清凉山的宪兵一个营急速增援。这时日军10余架九六式轰炸机分批对我阵地轮番轰炸，以掩护步兵及30余辆坦克向前移动，我军誓死坚守阵地，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后撤。稍后，明故宫又遭由中山门逼进的日军猛烈攻击，激战一小时后双方都伤亡惨重。肖将军深知我军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与敌人决战，为了歼灭更多来犯的日军，他下令缩短防线，退守到淮清河、逸仙桥一带，便将力量完全集中，顽强抵抗杀敌。

12月9日晚上，清凉山方面的军情也十分紧急。为了将水西门外围的桥梁彻底破坏，以阻挡日渐逼进的日军野炮部队，肖将军再下令宪兵部队增援陆军师，把突入光华门的日军全部歼灭。由于双方限于巷战，日军的优势兵力及火力难以发挥，加上敌明我暗，所以日军的前锋部队更加伤亡惨重。12日拂晓，南京城外的日军源源开到，各线的兵力剧增。8时左右，日军长程大炮开始向我军水西门清凉山阵地轰击，我军死伤枕籍，惨不忍睹。到了下午4时，南门阵地在日军以装甲部队为

前导的情况下陷落，形成一片混乱，电讯也中断，我军守城部队彼此失去联络，只能各自独立作战。

三

这时，肖将军正要传令军官分头转达坚守岗位、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时，突接到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命令，要所有在南京的军警后撤，向花旗营集中待命。肖将军不得已，只好由第一线抽调大批军警前往南京下关江边待命，并且交由罗友胜指挥，自己率余部进入蛇山、五台山一带阵地掩护宪警部队后撤。由于后撤部队无法轻易脱离阵地，再加上沿途有逃难民众、车辆拥塞阻道，行进十分困难。因此将上级原规定必须于12月12日晚上10点抵达下关江边的命令耽搁到深夜才完成，而江水滔滔，天寒地冻，缺乏渡船工具，不得已只好以木筏渡江。但人多船少，直到13日清早，仍有三分之二的部队无法渡江，而等待渡江的民众还有一万多人。

13日上午7时左右，日军的骑兵部队数千人与部分海军已逼进江边，一排排机枪向我扫射，水陆夹击，我方又没阵地可以掩蔽。肖将军率领掩护撤退的部队来到江边，看到这般情景，即刻高呼杀敌。双方展开近距离的冲锋肉搏战，无奈众寡悬殊，在弹尽援绝的不利情况下，血战5小时后，我军在江边的官兵，牺牲惨重。肖将军为人民尽忠，遂举枪自杀殉国，当时享年46岁。

获悉肖将军殉国噩耗后，曾派员赴江边寻找忠骸，可惜无所获，全国军民同声哀悼。将星陨坠，功绩长昭，肖将军的生命虽然短促，但他的牺牲重于泰山，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巩固了长期抗战的决心，他的孤忠伟志与历代忠臣烈士共垂不朽。

长沙大火纪实

许 权*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南撤。一路从鄂东渡江，进入幕阜山区，沿崇阳向岳阳以东地区集结；一路从公安、石首渡江向常德以东地区集结，意图在岳阳地带阻击日寇，并保卫岳阳。

1938年11月9日下午，蒋介石委员长在长沙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军事会议，出席的有何应钦、何成浚、唐生智、冯玉祥、杨森、张治中、熊斌、关麟征、王敬久等约30人，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鄧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我负责会议警戒。

会后，鄧悌告诉我：“会上，校长（蒋介石）指示两件事，一是布置了长沙外围的作战，一是说如果日寇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而长沙弃守时，就举火烧掉长沙。”又说：“校长指责陈诚没照计划烧掉武汉，是‘即不从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校长说：‘弱国抵抗强敌的入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得胜利的要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人忍痛把首都莫斯科烧光，以此击败了法军。这段历史值得仿效，而且‘坚壁清野’（我们叫“焦土抗战”）的方针是中常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的。’校长说完这段话后，转头望着参加会议的粤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问道：

*注权，长沙大火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

“这么多火车头和车皮退到西南，铁路塞满了，怎么办？”何局长未及答话，校长说：“‘壮士断臂’，还思索什么，都烧掉。”校长又面对张治中主席问：“长沙怎么办？”张主席也未及答话，校长说：“不要迟疑，烧掉就是。事先把能转运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也要烧掉。公用和民用房屋都烧掉。”一连说了三个“不资敌用。”

11月11日岳阳沦陷。蒋介石、何应钦，还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于上午10时离开长沙，说是到南岳游击训练班讲话。蒋介石等刚到猴子石，日机来炸，渡口极混乱。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召开省政府会议，报告了蒋介石委员长的指示，并通过了“必要时焚毁长沙市”的议案。

武汉沦陷后，汉奸制造谣言，长沙人心惶惶，又由于“长沙人力物力转移委员会”的转移工作大量进行，人们更加疑虑。还有以下的几件事，助长了混乱。

（1）湖南省政府首先迁往邵阳（即宝庆）设立行署，并公开委派省属各单位人员，湖南省政府院内的场地，放置着大小行李，狼籍不堪，字纸随风飞舞，落叶蔽地，特别是电话机和器材抛掷街头，最惹人惊恐。

（2）省会各机关、学校、工商企业以及市政府的单位，亦同时疏散，特别是眷属仓皇就道。

（3）长沙以东万载、宜春之线战斗激烈。从前方送来的伤病员，数以万计，因后方总医院早已人满，悉数倒卧街头呻吟呼号，群众误传敌临近郊。

（4）大本营三厅宣传队在市内墙壁上用日文写标语，用以瓦解日寇士兵的斗志，殊料群众误认为日寇便衣已经进城。

这时，长沙市民留城者约计3—5万人。

1938年11月11日，侦知日寇先头部队在汨罗南岸构筑阵

地，掩护其主力集结，又日寇在江西万载、宜春之线，受我以第二十军为主力的部队的阻击，伤亡亦大，毫无进展。湖南省政府判断在十天以内，长沙近郊无战事。于是决定安民，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长沙市政府和省会警备司令部联衔布告安民，并劝商民回城开业；二是由国民党长沙市党部、长沙市政府、湖南省教育厅借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诞辰在教育会坪召开一个纪念会，并于会后举行火炬游行，以示安定无事。

正在设法安民之际，张治中主席接到蒋委员长由南岳拍来的“队”电，电文说：“长沙如下守，务将全城焚毁，切勿迟疑。”随后又接到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蒋委员长的电话：“长沙必须遵照长沙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焦土抗战，彻底破坏，切切。”军令如山，张治中主席不敢有违，乃于1938年11月12日下午召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烧长沙的事宜。

会后，已是下午4点，酆悌赶回司令部，上楼，头向左转，面对我们办公室窗口，他喊：“执中，来。”我应声走到他的办公室。

酆悌说：“校长有电报和电话给主席，主席召集我和徐处长商议，决定准备放火。纵火的计划由警备司令部起草，同徐处长研究后送批。限令本日下午7点把计划写成。保安处筹备器材及纵火用的燃料。”又说：“石参谋长另有任用，你接替参谋长的职务。”我强调我刚到长沙，人事不熟，不堪重任。酆悌说：“士见危受命，义不容辞。”我问前方的情况。酆答：“我已和关麟征总部通话，万载方面日寇伤亡大，正在待援中，岳阳方面，日寇在新墙河北岸集中。”我说：“还远哩，何必太急。”酆答：“主席急嘛。”

下午6点，我把计划写好了，共十三条：

第一条：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

围万一失利而决定放弃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 and 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

第二条：派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本纲要第一条规定的任务。

第三条：警备第一团和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四条：湖南省保安处供给引火材料。

警备团领到引火材料后，发到连，由连长控制，社训总队则发到中队，由中队长控制。

第五条：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算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几长几短，忘记了）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方准起火。

第七条：起火的秩序——警备团区以天心阁为中心，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社训总队区，从圣经书院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不准遍地同时起火。

第八条：警备团派少校团附协助市电话局加强保密，不准泄露火讯并利用市内民间电话组成通讯网。

第九条：不准封锁渡口，不准管制船只。

第十条：严禁趁火打劫。

第十一条，未完成任务，弃职逃走者，军法从事。

第十二条：警备团和社训总队收到警备司令部之书面起火命令后，方准以班（小队）为单位进入起火位置。

第十三条：本计划大纲业经湖南省政府主席批准。立即生效。

鄧悌看毕后说：“我们同到保安处和徐处长讨论。定稿后，再送主席。”

下午7点，徐、鄧和我三人都在保安处。徐权看完，一语

不发，提笔就改。原计划内定放火部队为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徐改为警备第二团。我说：“二团在郊区守仓库，调进城费时间。”徐低着头答：“徐团长精明强干。”又原计划规定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徐改为以“班”为单位……。鄧说：“不易掌握。”徐答：“不在郊外，在市区嘛。”徐处长显得极自信。

约7点半，鄧悌、徐权、我都在主席办公室。主席批准了计划，又写了14个字：“限明晨四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又说：“谨慎从事，不许失败。”

约8点钟，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应召开会。鄧悌把上述情况详细传达了。又说：“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警备司令部办，我是总指挥，你们（指徐昆、王伟能）分任副总指挥，现在是准备，不是行动，准备主席检阅。”接着鄧悌叫我宣读计划，我着重地讲了“防止失慎”的问题，因为当晚正在举行提灯会。最后鄧悌说：“校长在长沙，我连夜没有睡觉，我需要休息几小时，有事问参谋长。”

约10点，保安处处长徐权催领汽油。徐昆领到后报告我。我说：“汽油要由连控制。”徐处长叫汽油发到班。我问：“王总队长呢？”徐昆答：“王总队长也是照徐处长的指示办的。”

11点，大本营政治部二厅康泽领导的爆破队来报到，我分配到徐团和王总队去了。

约12点，徐团长和王总队长都进入了准备位置，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了。我顺便问徐昆：“市内的情况如何？”徐昆说：“市内议论敌寇已经到新河。”又说：“我国的下级军官看到省政府、市政府、保安处和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耽心同样被杀掉。”我看出问题严重，当即报

告张主席。主席在电话中说：“我们并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长官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军队增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第二团和社训总队的家属责成徐团长和王总队长就地疏散，尔后由省政府办转移。”主席又嘱咐：“检阅按原定计划进行。”

13日凌晨，我尚未就寝，谁料祸从天降。卫士来报，说南门起火，我上平台看，判断是“失慎”。因为南门属徐昆团的范围，所以我打电话找徐昆，而徐不在团部，徐团的中校团副也不在团部，团部只有几个通讯兵，说是都出去准备检阅了。随即打电话给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要他派消防队救火。文重孚竟说：“警察局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我说：“警备司令部没有命令。”文答：“市政府叫走的。”我气得没法。

不到一刻钟，南门三处起火。我想按计划，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我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是消防队走了，怎么办？

我摇关总部的电话，总部答：“前方平静无事。”

我问张主席，主席亲自答：“我没有下命令。”

我打电话问鄧司令，他的电话反应出占线的信号。

几个电话，几个折腾，壁上的钟敲了三点。看见全城火柱冲天。甚至警备司令部前后火舌肆虐，伸到我的办公室。我急忙夺路出来，到寿星街鄧司令的公馆去。在路上看见警备团的士兵在放火，不准我通过。我的卫士说：“是参谋长。”我问：“谁叫你们放火的？”他们说：“你管不着。”

我到了鄧公馆，鄧从梦中惊醒，闻讯，十分惊吓，只说：

“徐昆闯祸了，徐权点的将，他原是个荒唐鬼。”酆司令邀着我同去见主席。但车行至浏阳门，酆叫车停下，流着眼泪对我说：“你去无用，一切由我承担，校长怎么办，我就怎么受，反正是我犯了罪。你到邵阳行署报到。”我也流了泪，我说：“我留下有好处……”酆悌气急声哑地说：“叫走，就走。”用手掀我下车。我在路上回头看长沙，烈火冲天……我的精神飘忽，筋肉麻木……感到天地虽宽，已无容身之地。

蒋介石在韶关得到大火的消息，于11月16日回到长沙。陈诚不满张治中，蒋介石解释说：“这不是文白（张治中）一人的错误，而是团体的错误。”及至汪精卫发出电文攻击蒋介石“误解焦土抗战，虐民以逞。”蒋介石才软禁酆悌并逮捕文重孚、徐昆。接着，以何键为首的非蒋嫡系要人，四起攻击，邮电纷飞，斥责蒋介石为祸首。蒋介石知众怒难犯，乃令钱大钧组织军法会审，处酆悌、文重孚、徐昆死刑。我亦于同年12月被捕到案，运重庆受审，处无期徒刑。徐权在逃，没有归案。

解放后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民党长沙举火目的是烧八路军办事处并暗害周恩来、叶剑英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回忆1938年10月下旬，蒋介石待从室汉口电令酆悌，“妥善安排八路军办事处在长沙的驻地，并支持接运该处的大小行李。”警备司令部当即派宪兵营营长卫持平办理，有案可查。周恩来到长沙就下榻在张治中公馆。叶剑英早在岳阳失守以前就到了衡山，其余八路军负责人均平安工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兼长沙人力物力转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自1938年10月中旬起就多次派员商请八路军的单位向沅陵方向转移，并正式行文通知有案。

总之，国共第二次合作直到长沙大火，从我手上经办的事，完全可以作证，双方都有诚意，所谓长沙大火是烧共产党

的，纯属子虚。

敌骑未至而先自焚，致使千载古城蒙受浩劫，长沙军警当局应负完全责任。但把“焦土抗战”诬为“逃跑主义”，或“把准备变为行动”的殃民行为指作“政治谋害”都是不公平的。

在长沙大火过程中，国民党最高层从未提出“向群众征求意见”。相反，严囑“保守军事秘密，不准泄露。”当然，长沙当局事前确已转移了大部份的人员物资，但做得很不够，特别是东北两个战场后送的数以千计的伤病员无人运送，任其在街头苦楚呻吟，终罹火化的事实，难逃“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的责备。

长沙大火由于地方政府文嬉武怯，措施失宜，酿成自焚的浩劫，致使蒋介石陷入攻讦之中；一时难以自拔。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论坚壁清野”的发表，肯定了“坚壁清野”的做法，给国民党政府起了缓颊作用。加之日寇原拟挺进长沙，忽于大火后后撤，长期逡巡不前，进一步证实了新华日报社论的论点。民众是爱国的，为了抗击入侵者，宁愿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社论》发表以后，从而减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恨。

长沙大火后不几天，周恩来回到长沙，急忙调回大本营政治部所属已到广西的人员，包括西南各地的演剧队参加长沙的善后工作。他认为，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恐资敌用”、致触刑章的犯罪行为，但没有日寇的侵略，也就没有长沙大火。周恩来回到长沙的那一天，张治中主席问：“你回来干什么？”周恩来严肃地回答：“我们回来是为国民党补过的。”（以上的话是长沙大火三年以后，张治中在重庆政治部接见我的时候说的。）

我在“中国驻印军”中

贾维新*

从1943年7月起至1945年1月止，我曾在“中国驻印军”中的新三十师八十九团三营机枪连战斗生活过一年半的时间，曾任少尉排附、中尉排长等职，一直浴血奋战在最前线。回顾这段经历，的确惊心动魄，永生难忘。

“中国驻印军”的组成，是适应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和特定的地理环境而产生的。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作战失败，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惊慌失措，脱离部队，追随史迪威逃往印度。罗所指挥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大部都向云南边境溃退。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奉命掩护英军，并遵照史迪威的指示，由缅甸向印度撤退。该师于5月中旬退至印度的英普哈尔。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直属部队及该军的新二十二师，也由缅甸的打洛、新坪，经野人山向印度的列多撤退，于八月初到达印度的迪不鲁加尔。这样，退至印度境内的远征军有新五军的军直部队及所属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经史迪威与英国驻印度当局洽谈，决定以兰姆伽（加尔各答西北）作为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要求所有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在此集结。不久将

* 贾维新，龙山县人，曾任“中国驻印军”中尉排长，战斗在最前线。

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撤销，成立了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副总指挥部。到了10月，迫于史迪威的压力，蒋介石将罗卓英调回国，并撤销副总指挥部，把驻印部队编为一个军。委派郑洞国为军长，成立了新一军。到了1943年秋，国内又空运新三十师到兰姆珈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归于新一军建制。1944年夏，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又把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空运到列多，与原驻印军合并，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郑洞国改任副总指挥，孙立人为新一军军长，新辖三十八师、新三十师、五十师。新六军军长为廖耀湘，辖新二十二师、十四师。以上便是中国驻印军前后的组建情况。

空 运 到 汀 江 机 场

我未参加驻印军以前，是在第九集团军的五十四军五十师一四九团二营六连服役。1942年4月，我所在的部队从滇越边境退到昆明，负责保卫昆明城。在昆明时，我遇到在军士队受训时的指导员李国栋（常德人），他当时在昆明行营总监部第二分监部任科长，邀我去他那里共事。这样，我就调到他那里任少尉退信科员。后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役遭到失败，有的退回国内，有的退到印度。对于日寇的猖狂侵略的反动暴行，出于民族自尊心，我感到非常愤慨，决心到最前线去，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不久，看到报纸上号召有作战经验的职业军人去出国作战，我把此想法告诉了李科长，得到了他的同情与理解，立即到驻印军新三十师昆明办事处报名。经体检后，我以优等身体被录取。因又是现役军人，就委派我为新兵组的组长，准备空运到印度，参加对日作战。

1943年7月2日晨，新三十师的部队分别乘飞机从昆明的

伍家坝机场起飞，前往印度的汀江。部队临时编成组，每组40人，指定一各组长，乘坐一架飞机。因缅甸上空被日本飞机控制，只好飞越喜马拉雅山口，从西藏绕道飞往印度，但仍然遭到日机的拦截。我被指定为组长，是乘坐的最后一架运输机。登机后，在空中飞行了长约3个多小时，但飞机又降落在伍家坝机场。问是怎么回事，说是遇到了日机的拦截，前面的那架飞机被击落了，所以后面这架只好返航，要不是我们的战斗机赶去掩护，恐怕也要遭到不测。下机后，我们在招待所吃早餐，待命起飞，地勤人员对飞机重新进行了检修。下午2时，我们又乘该机起飞了。在飞越喜马拉雅山口时，气温突然下降，我们都冷得发抖。但出于好奇心，大家仍然从轮舱口向外观望，两边的山峰比飞机高，飞机是在山沟之间飞行，两边是耀眼的皑皑白雪。大约飞行了五、六分钟，越过了喜马拉雅山峰，飞机的高度逐渐下降，气温回升。经过4个多小时飞行，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的汀江机场。

下了飞机，运送我们的这架飞机加完油后，又匆匆起飞赶回昆明。我们往四周一看，没有一座营房，只见许多民工在整修机场。我用汉语向民工打听，没有一个听得懂。没办法，我只好把大家带到机场旁边的树荫下休息，等待来人接。过了一会，有一辆汽车向我们驶来，是一个穿便服的印籍华侨，询问我们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回答说是从昆明来的，刚下飞机。那位华侨说，接你们的汽车已经回去了，等了大半天，听说还有两架飞机的人员未到。我告诉他，因我们前面的那架飞机被敌机击落了，我们是返航后又重新起飞的，所以迟到了。那位华侨听了以后，便邀请我们坐他的卡车，送我们到驻地去。下午8时左右，我们坐这位华侨的卡车到达营房，对他表示感谢。他连声说，不用谢，同胞们都在为抗战流血牺牲，我做这点事是应该的。他的中国话虽然讲得十分生硬，确实使我们深受感

动，大家都流下了眼泪。

我们进入营地，到处都是搭的帐棚。每座帐棚可住10人。接着，我们便从仓库领来毯子、蚊帐、雨布和给养。在汀江休息了5天，把从国内带去的日常生活用品都烧掉，身体进行了检疫消毒，重新发放了被服装具。上级告诉我们，不准谈论印度的政治，不准单独行动，就地好好休息。汀江这个地方猴子很多，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树上、竹林里，都是猴子。只要我们稍一离开帐篷，这些讨厌的猴子就溜进帐篷，把我们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当地的印度人，把猴子信奉为神，告诉我们打不得。大家为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任它们胡作非为，不予理睬。

7月8日，我们带队的长官万汝霖中校宣布，“作好出发准备，乘火车到新的营地集结，具体地点暂时保密。”下午，大家开赴火车站，分组上了火车，都是卧铺，四人一小格。经过两天两夜的行驶，到达了印度的巴叭里铺。下火车后，又转乘轮船，到了土布居。下轮船上岸，又乘火车到加尔各答，最后在兰姆珈安营。第二天，进行编队，我被分到新三十师八九团三营机枪三连任上士排附，因自己文化程度低，比在国内服役时降了一级，但内心没有怨言。当时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下属三个师：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总指挥是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副总指挥由郑洞国军长兼。那时，新一军的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都已在前线作战。由于我们新三十师是刚组建的部队，就留在兰姆珈进行装备和训练，等训练完毕后，再开赴前线。

兰姆珈训练二三事

兰姆珈训练学校是1943年建立的。兰姆珈位于印度加尔各

答西北方约二百多公里处，英国人在此修了一所相当大的营房，中国驻印军总部也设在这里。当时，按照规定，驻印军的军、师、团级干部都要到这个学校进行训练，连在中国境内接受美械装备的十二个军的军、师、团级干部也要空运到此训练。我们新三十师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队，破例连士兵也在此接受训练。

训练时间为6个星期。教官都是美国人，并配有翻译。第一、二周，进行兵器训练，使受训者了解各种兵器的名称、性能并善于分解结合；第三、四周，为射击训练，使受训者善于使用各种兵器来发扬火力；第五、六周，为战术训练，分为沙盘教学和实地演习，使受训者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另外，我们还学习了“搜索”、“袭击”、“埋伏”、“侦察”、“测绘”及“飞机鉴别”等基本知识。最后几天，我们还进行了“步炮协同”、陆空联合进攻的演习。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训练基地驻有不少的英国步兵和炮兵，才知道是在严密监视下进行训练的。

在兰姆珈训练期间，曾发生一件我们驻印军与美、英士兵在电影院打架斗殴的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次，轮到我们晚上去电影院看电影，同时还有一些英、美军人。放映前，大家正在吃汽水、水果之类的东西，谈笑风生。放映后，开始秩序很好，影厅很肃静。记得是放映一部美国影片，描写某一歌舞团在外地演出，一些警察、宪兵也跟着女演员跳，到了狂热时，只见互相拥抱长吻。这时，厅内开始骚动，有一个美国上尉军医，把坐在他旁边的中国一名女护士也搂在怀里狂吻，引起这名女护士的惊叫。中国士兵看不惯美国人这种粗鲁行为，有几个人把汽水瓶向美国军医砸去，并听到喊声：“不准侮辱我们民族，不准侮辱中国妇女！”接着，中国军人与美、英军人用汽水瓶、水果，互相在放映厅大战起来，电影只好停映。

事件立即反映到总指挥部。总指挥的高级将领马上赶来制止，并用高音喇叭反复宣传：“战友们不能打，我们都是盟军，大家要冷静，不要制造流血事件！”同时，把被打伤的几名美军立即送往医院。后来，查清了肇事原因，双方都未受处分，这场风波不了了之。

在我们训练快结束时，蒋介石开完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回国途中，在加尔各答作短暂停留，并驱车前来兰姆珈检阅我们受训的中国驻印军。他是在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陪同下来检阅的。检阅结束后，蒋介石向我们部队作了短简讲话，大意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结束了，胜利是属于同盟国的。这次在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各个民族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接着，他鼓励在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要虚心学习，好好训练，努力与日作战，一定要打通中印运输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蒋介石的讲话和视察，使大家深受鼓舞。

1944年2月，我们新三十师受训结束，奉命开赴前线。途经加尔各答时，车站站台上站满了华侨，他们打着旗帜，高呼口号，把一袋袋慰问品往车厢里抛，使我们感动不已，有的流下了热泪。车出加尔各答向北行驶，大约过了8天，我们到达了印度的列多。那时，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已在孟拱谷河一带作战。我们新三十师的八八团奉命进驻新背洋、马科，而我八九团作为预备队驻防列多，一面备战，一面学习丛林战术。

三千华军保卫加尔各答

1944年4月，在南线与日军作战的英军失利，美马坡失守，印度首都加尔各答告急。这时，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要求调

我们新三十师前去支援，以缓解加尔各答的紧张局势。但是，总指挥史迪威为了保存实力，不同意当时驻印军新三十师全部去支援，理由是北线作战紧张，兵力太少，一共只有三个师，而新三十师的一个团已在孟拱谷河作战，一个团正在训练，只有一个预备团。于是，支援英军，保卫加尔各答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三十师八九团身上。

接到上级调令后，我们四十九团立即出发。每个班乘一辆军用汽车，快速兼程往南线赶。两天后，我们到达丁木拉卡。在此没有停留，又继续急进，在丁木拉卡前的廿多公里的了树卡下车，遇到了英国军队。我们进入阵地后，立即赶修临时工事。一营、二营的阵地在我们三营的两侧，三营的阵地在公路旁。当时，我在三营的机枪连，全连分四个排，每排配有两挺重机枪。与此同时，英军的炮兵也在我营的后面约二百米处进入了阵地。

下午3时，我们刚把工事修筑完毕，大家进入阵地不久，就在前面千米处发现了敌人。冲在前面的是敌人的三轮摩托车队。这时，机枪手李振华对我说：“要排副！开始打吧！”我说：“不行！战场上要听从上级指挥。”大约敌人距我们二百米左右时，一发红色信号弹升起，枪炮齐鸣，密集的火力把日本鬼子的三轮摩托打翻在地。但是，敌人摩托车队后面是坦克，也向我军疯狂地还击。机枪手李振华不幸中弹身亡，副射手邓发光爬上继续射击。我们连八挺重机枪不停地向敌射击，但敌人依仗其坦克的优势，仍不断地向我阵地推进。眼看敌坦克距我们只几十米远了，忽然只见红光一闪，四枚火箭飞向敌坦克，刹时“轰”的一声，敌坦克被打瘫痪了，加上喷火器也向敌坦克喷去，立即燃烧起来。原来是英军从后面支援了我们。英军的炮兵也猛烈地向敌开炮，敌坦克后的步兵一群群倒下，阵脚大乱，开始向后逃跑。这时，号兵吹响了冲锋

号，步兵趁敌人溃败之势跳出掩体，向敌追击。

我与涂正清立即把射手李振华的尸体用毯子包好，放在掩体里，就扛起重机枪与步兵一道前进。在进到一块森林边缘的高地上，我们把重机枪架好，向敌阵地猛扫。这时，步兵用六〇炮向敌重机枪阵地轰击，随后英军的坦克也赶到，用七五战炮向敌群猛轰。经过一番激战，我们于下午5点多钟，占领了敌人阵地。营长命令我们排的两挺重机枪配属给七连，并立即抢修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第二天凌晨，盟军的十架轰炸机飞越我军阵地上空，以两架编成一组，沿着公路轮番向敌人阵地轰炸、扫射，英军的重炮也轰击敌方一切可疑阵地。随后，步兵开始冲锋，才发现敌人的大部队已经撤退，只留下少量部队进行掩护，于是，我们就勇猛追击。沿着公路，我们一直追赶了三天，把敌人赶出一百多华里。第四天上午，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把追击的任务交给英军，宣布已光荣地完成了支援英军、保卫加尔各答的任务，回到了本拉卡休整。

在本拉卡，我们一方面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休息补充人员。这时，我们看到印度日报，以头条新闻、大号标题报导了“三千华军保卫加尔各答，击退敌人猖狂进攻，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那时，我们的防线拉得很长，一个班分成三个据点，坐吉普车巡防要跑一整天。有次我与营长一道坐车巡防，每遇到一个英国人或印度人，都要向我们伸出大拇指，并连声说：“O K！”表示对中国驻军的友好和钦佩。

参加密支那围攻战

我们新三十师八九团在本拉卡休整了一个多月，人员已

经补齐。当时的团长是王恭略，营长是周凌生，连长邓斯昆，排长是肖静，我仍任排副。1944年5月17日，我们团接到命令，每人只准带一床毛毯及少量换洗衣服，步枪手带60发子弹、冲锋枪手带100发子弹、重机枪手带1000发子弹，另每人带二枚手榴弹。其余的物品全部烧掉或埋掉，准备立即出发。轻装完毕以后，下午来车把我们拉到了木拉卡飞机场，七时起飞，每架飞机坐二十人。大约两个钟头后，飞机降落在一个不知名的机场，大家下飞机在机翼下休息，又等待命令。当时，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只预感到有一场恶仗、硬仗要打。后来，才知道空运我们参加密支那围攻战。

密支那周围多山，中间是一小平原，地形稍有起伏，遍地皆森林(幼年林)，异常荫蔽。城西北两方，都有飞机场，是缅甸战略上的要地。故此，从5月初开始，我新三十师的八八团、五〇师的一五〇团和美军的G字团等部队，已驻到离密支那10多华里处，切断了密孟公路，准备包围全歼守敌。为加速占领计划的实现，总指挥部便密令空运我八九团奇袭敌机场。

5月18日深夜，我们又登上飞机，向密支那方向飞去。天快亮时，飞临密支那机场上空，翻译人员叫我们立即跳伞。着陆后，我们立即选择了跑道旁的一块空地，马上赶筑临时工事，也不知道其它部队降落在什么地方，只好各自为战。这时，天已微微亮，看见有30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南自北向我们走来，相距约五、六十米。我们的哨兵高炳元问是哪个单位的？他们没有回答，立即散开卧倒。我们的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发射。跑道又平坦，敌人无处藏身，当场击毙了20多名敌人。这时，密支那四方八面都是枪声，大家都在各自为战。我们奇袭占领了敌机场后，这里再没有出现敌人。只见我们的运输机向跑道上不断地投下弹药和物品。一会儿，七连连长也来了。营长命令七连防守机场，并把我们的机枪排配属给

他们。布置好防务后，我们就搜索机场四周，一直前进到伊洛瓦底江边。当晚一直无战事。

19日早晨6点多钟，伊洛瓦底江上流漂来10多个竹排，每个排上爬有七、八个敌人，妄图夺回机场。我们一阵密集的枪弹，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把敌人消灭了，大部分敌人掉入江中，随急流冲走。中午时分，八八团来了一个连，接替我们防守机场。我们就移到从机场通往密支那市区的公路上挖好工事，负责团直属部队的外围警戒。只见通信排、迫击炮连、卫生队、运输连挤在一起，乱糟糟的。晚上，天忽然下起大雨，又特别黑，为防敌偷袭，我带着联络下士丁绍云出去查哨。赶到前沿听到有枪声，我问是什么人？前面就打来一枪，我与丁绍云急忙卧倒，敌人的机枪响了，我们阵地上的机枪也予以反击。我与丁绍云往回爬，但方向错了，爬到了迫击炮连的阵地，与他们的哨兵爬在一个散兵坑内。爬了一会，考虑到三人挤在一起作战不方便，我与丁绍云又往旁边的一个树丛里运动，那是八班的阵地。天快亮时，才回到我们排的阵地，看见阵地前躺着十几具敌人的尸体。肖排长对我说，你若不去查哨，可能报销了。我一看我的掩体里落了一发炮弹，背包被炸得稀烂。

20日，营里命令我带一个重机枪班配属给九连，与他们的一个加强排防守通往密支那的一座桥梁。河不大，但水很深。晚上12点，一群日寇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的各种火器猛烈地向敌人反击。双方激战了3个多钟头，拂晓时敌人退去，桥那头留下了30多具敌尸。21日，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我们九连向敌发起反攻。机枪连掩护，很快占领了敌人前沿阵地。以后近一个星期，敌我双方进行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到29日，我们才逐段占领了敌人阵地300多米，但伤亡很大。仅我带的机枪班就牺牲了5个。那天下午，我的左腿被敌人流弹击伤，流血不止，简单救护后，只好坐上担架，被抬到团部绷带

所进行包扎治疗。肖排长一直护送我，并叫我安心养伤，期待我早日归队。

13天后，我的伤口愈合了。6月12日上午，医院给我发了新背包、新衣裤，我就立即赶回前线，到营部报到。

一到营部，营长笑着对我说：“贾维新，你回来得正好。你们机枪连只剩下几个人了，剩下的全部拨到你们排里，归你指挥。”听完营长交待，我立即赶到阵地。同志们见我回来了，十分亲热。询问分别后情景，我就查看各个工事。在此期间，我们在原阵地又坚守了一个多月，接连打了五、六仗，消灭了敌人200多名，守住了阵地。到7月18日，我们的阵地才由五十师一四九团接防。全营清点兵力，不到一个连的人数。由此可见，一个多月来，我们进行的战斗是多么的激烈、残酷，敌人的伤亡十分惨重，而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22日早晨，战斗又开始了。因与敌太近，炮兵无法支援，我们只好采用坑道战术向前拓进，接近敌人掩体，用手榴弹消灭敌人，下午5时才完全占领敌阵地。这时，炊事员苟永万给我们送饭来了。我见敌工事旁的水沟里有两名敌尸，叫他拖上来搜一下死人身上的东西，将来也好作个纪念。他真的去拖，拖上第一具时，搜得一支钢笔，一块手表，还有一些日币。当他再拖第二具时，突然手缩回喊道：“是活的！”我说：“莫讲鬼话”。我这时已吃完饭，想着一看。忽然苟永万大声惊叫起来：“哎呀！真的是活的！”与此同时，这个“死尸”站了起来，端着冲锋枪对准了我，我急忙爬下，只听见涂玉清的枪响了，才把这个装死的残敌消灭了。事后细想起来，要不是叫苟永万去拖敌尸，说不定到了晚上，我们就要遭到不测。23日早晨，我们进攻敌人的指挥部。敌指挥部设在离我们只一百多米处的一栋洋房子里。首先，用大炮轰击，起码打了几百炮，把房子全部摧毁，然后用机枪掩护，兵力再冲上去。冲到敌指挥部

一看，敌人的指挥官连同几十名士兵全被打死。这样，我们便占领了密支那郊区，并着手向市区攻击。

从24至29日，我们天天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有一天只能前进20多米，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这时，师部派了九十团来接我们的防地。清点人数，全营只剩下60多人。

我们撤到了安全地带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接到美军阵地吃紧的消息，日军向他们的阵地突围，战斗异常激烈，美军已伤亡了一个中队，师部要我们团立即去增援。来到美军阵地一看，他们是防守飞机场北面，我们立即填补了他们防空的空隙。8月2日，敌人又开始从这里突围，激战了一天，消灭了二百多名敌人，使其阴谋未得逞。8月3日，只听到一些零星枪声，我们冲过去一看，全部是友军。这样，历时近百天的密支那战斗全部结束了。

密支那战斗结束后，接到日令恢复我少尉排长的职务，并通报表扬。我所在的部队奉命渡过伊洛瓦底江，到离密支那十多公里处的地方驻防，负责监视八莫方向的敌情。几天后，我奉令调到军教导队学习，主要是总结前段时间的战斗经验及教训，研究今后作战的布署与方法。一个月后，学习结业，仍回原部队任职。

八莫截击战和克底克解围

我从军教导队学习结业归队后，所在部队已移防到卡树。这时，部队的人事变动很大。师长已换上唐守志（湖南零陵人），团长曾琦（湖南衡阳人），营长余世仪（安徽人），连长仍是邓斯昆，我连副连长晋升为九连连长，我仍在四排任排长，我们在卡树休息了几个月，大部分伤员都返了队。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决定在雨季过后进攻八莫，10月初部

队陆续向八莫开进。八莫是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此地得失，关系缅北及滇西全局。国内因雪峰山会战开始，新六军空运回国到芷江。故此，只剩下新一军攻打八莫。首先，新三十八师参战，遇到日本军人的顽强抵抗。加之敌阵地坚固，火力猛烈，为吸取攻打密支那的教训，就采取陆空协同、步炮协同，并以战车为掩护，逐点歼敌的方法。这时，日军又从滇西调来二千余人，企图解救八莫之围。指挥部决定新三十师九十团赴克底克打援。双方激战，伤亡惨重，九十团几乎牺牲了一个营的兵力。于是，上级又命令我们八十九团连夜赶去增援，不让滇西之敌向八莫靠拢。

克底克是个大山区。我们日夜行军，迅速到达了山区腹部。给养全由空投供应。我们排的任务是负责防守空投场和警卫美军的炮兵阵地。第二天凌晨，两架日机偷袭空投场，掷下很多炸弹，炸死了一些马匹和人员。我急令各班对空射击，不让敌机低空投弹和扫射。不一会，我们的歼敌机赶到，击落了这两架偷袭的日机。三营接替九十团的任务，攻击前进。因为这里是大山区，林密沟多，几乎全部进行的抵近据点争夺战，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团在克底克战斗了八、九天，歼敌六百多，战斗基本结束。

这时，从国内传来消息，滇西境内整个敌军溃败。美军的G支队三千多人，计划在滇缅公路必经的南巴克布防，进行阻击战，一举歼灭溃逃之敌。但是，出于意料之外，战斗过程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反将美军三千多人分块包围了。为此，新三十八师赶去一个团为美军解围，但也伤亡很大，与美军一道陷入了日军的包围。这样，我们新三十师八九团又奉命去再度解围。接受教训，全团分三路采取迂迴包抄的方法，内外夹攻，以达到解围又歼灭敌人的目的。

我们三营接到命令后，带上三天的给养，运用迂迴战术，

荫蔽接近敌人。在迂迴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沿途都是深山峡谷，穿行在潮湿的森林里，夜晚住宿岩洞或树上，防止毒虫的叮咬。三天的给养吃完了，还未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沿途只好采摘野果充饥。走到第六天，到达了瑞百河西岸，望见了敌人守河的据点。这条河虽不太宽，但河水湍急，深不见底。按照事先的安排，采用橡皮船强渡，每只橡皮船装6人，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对岸冲去。经过一番激战，强渡过去的一个连，终于占领了敌人阵地。接着，全营人马渡过了瑞百河。进入阵地后，我们的侦察机发现了我们，运输机立即飞来给我们空投了大量给养和弹药。经过几天激烈战斗，击溃了日军，把美军和新三十八师的那个团解救了出来。日本鬼子只好分兵缩在各个山头的据点里。在当地土著居民的带领下，我们弄清了日军各个据点的分布情况，就逐个的攻击占领。

一个多星期后，日军只剩下南巴克最高山峰的一个据点。攻打这个据点时，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日军有一个中队的兵力，依靠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拼命的顽抗。后来，我们用重炮轰击，起码倾泻了上千发炮弹，摧毁敌人坚固工事，步兵才冲上去解决战斗。这样，我军全部占领滇缅公路沿线的各制高点，完全控制了滇缅公路。我在这次战斗中，左小腿被敌弹片炸伤，与其他伤员一道，用直升飞机运到密支那后方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伤好归队。连长邓斯昆把口令交给我说，晋升为中尉排长，被调到军里的尉官队受训。

受训结束后，已到了1945年3月，整个印度、缅甸战场的战斗全部结束。不久，中国驻印军奉命全部回国，部队是坐飞机回国的，因我负责全营的骡马押送，带一个排步行回国。

（王赤辉整理）

望 城 沦 陷 时

张 超*

1944年6月6日（甲申年闰四月十六日），日寇陷杨桥、桥头驿；6月7日陷铜官；6月8日陷靖港、乔口、丁字湾、霞凝港；6月9日陷新康；6月10日陷白沙洲、回龙洲；6月11日陷三汊矶、银盆岭。6月13日，敌主力一部西渡湘江，集结白沙洲，经高冲、狮子口、廖家坪、社扶桥，超过长宁公路的枫树铺。6月15日，取道大椿桥、坪山、云盖寺等地向东、向南窜犯，陷岳麓后山西南面大片地区，从西侧形成对岳麓山的弧形包围。6月18日，省垣长沙全部陷落。同日，日军魔爪伸向九江庙、花杂街、白泉、炭塘子等地。

之后，日军主力继续向湘南、湘西侵犯，在占领区内留下小股部队，分驻交通沿线、关津渡口和乡村小镇，残酷地鱼肉当地中国人民。

从1944年6月沦陷，至1945年9月光复，日寇在今望城县境内及邻近的据点共有二十几处，总兵员概数为2000名以上，其中有些是胁从的朝鲜人、东北佬、湖北癞子、汉奸等。以后，

* 张 超，望城县人，该文根据余光烂、金见晃、刘继向、徐智、罗养一、刘瑞祥、余根源等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在敌伪汉奸的操纵下，各地相继设立了维持会，日驻军逐渐减少到1000左右。

湘江以东的据点有：

铜 官：包括铜官街以南、蔡家墩、誓港等处，设警备队和仓库，200多人。

麻石咀：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杨 桥：马鞍山、枳木塘两处，设警备队和仓库，200多人。以后，吊井湾又驻了一个小队。

桥头驿：油铺塘，一个警备队。约100人。

丁字湾：龙潭寺，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道林桥：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霞凝港：谭家巷、黄猫咀两处，设警备队和仓库，约200人。

观音井：驻铁路边，五、六十人。

鹅羊山：甘家咀，约30人。

捞刀河：观音塘，一个警备队，约100人。

湘江以西的据点有：

乔 口：观音阁，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靖 港：螃蟹岭、南岸堤，设警备队和仓库，100多人。

新 康：永丰粮栈，一个分队，20多人。

易家坝：丁家坪曾驻一个分队，20多人。

白沙洲：蓼叶山，一个分队，30多人。

回龙洲：港口河，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许家洲（今名月亮岛）：日军修建临时简易机场，驻守100多人。

乌 山：徐家桥西侧肖家湾，曾驻一个小队，10多人。

望城坡：吕家大屋、箭弓山、庙山塘，设警备队和仓库，200多人，还有一队军马。

楠木坝：屯积粮食的仓库，一个小队，十几人。

桥头铺：约100人。狮王庙为粮食仓库。

白箬铺：涧塘湾、温家塘两处，一个警备队，100多人。

五峰乡：阎家湾，一个分队，二、三十人。

九江庙：陶公岭、邱家港两处，一个警备队，不足100人。

观音港：包公庙。

炭塘子：二圣庙。

油 铺（今白泉中学）：三处共驻100余人，队长田中。

龟头市：总部驻聂家大屋，约二、三百人。

二

望城境域被日寇沦陷以后，从此，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遭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饱尝了国破家亡的痛苦，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进军途中及以后留驻期间，在望城一带，有数以千计的男丁被抓被掳，逼迫他们挑运军火和其他物资，当牛马使用，干苦活重活，更有年老体弱者，忍辱负重，不能支撑，受尽凌辱和摧残，或被杀，或折磨致病致死，横尸道旁，葬身江河。多少白骨，犹是闺中梦影。

6月7日凌晨，大队日军进犯铜官，并向四周地带扩散，顿时，铜官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鬼子所到之处，见男人就抓，其中凡被疑为我中央军或便衣情报人员者，就残酷杀害；见妇女就逼迫强奸和轮奸，并肆意进行侮辱；见猪牛鸡鸭就凌割宰杀；入户见什物器皿就掳掠。数日之内，生灵涂炭，血染山村。

同日，小股日军窜至花果院、苏蓼院，在五杉村大官冲枪杀了陈怀德、胡自华等人；东城村神塘冲胡正水和他的妻子逃

避不及，就躲在屋后竹山中，不料被鬼子发现，这对青年夫妇走投无路，双双投塘自尽。地处湘江中的洪洲，数百村民专靠捕鱼和种菜为生，堪称一片净土。到了6月10日，20多艘汽艇载来数以百计的日兵，于是，七里长洲，尽遭蹂躏。10多名男女老少惨遭杀害和逼迫致死，20多名妇女被奸污，十几口男丁被掳去当苦力，五栋房屋被焚烧，牲畜、粮食所剩无几，重要什物损毁殆尽。

大队日军过境之后，留下小股鬼子驻守下来，沿铜官街以南的制高点至警港一线驻扎，在思量桥东面的马厂坪，还没设哨卡警戒。鬼子驻铜官后，周围十几里以内的住户便不得安宁，今天往这里“打闹”，明天又换个地方，杀人放火，掳伏抓丁，强奸妇女，无恶不作。7月的一天，一队鬼子从太丰村经过，谭锡章的儿媳怀抱小孩，赶紧躲往山中，孩子大哭不已，鬼子闻声赶来逼迫强奸，谭家媳妇抱住孩子不放，奋力反抗，日酋哨起，鬼子恼羞成怒，拔出刺刀将母子俩双双刺死。在此前后不久，又有8个鬼子到花果垅雍家圩子“打闹”，抓住周又清的妻子进行了轮奸。过后，她下身疼痛不已，渐渐浑身浮肿，不出半月就含恨离世。一天早上，三屋村的谭五师公被枪杀在黄花坝三斗丘田里，到中午时分，其妻闻讯嚎啕痛哭，便和内侄陈伯坤前往收尸，结果也被鬼子抓住，将死者谭的妻子剥光衣服扔到水里，逼她光着身子在大路上走，横加侮辱。适盟军飞机飞临上空，鬼子抱头鼠窜地躲避，其侄儿才脱下一条裤子让她穿了，姑侄俩好不容易将谭的尸体抬回家中，草草料理后掩埋。这年8月，丰城村芦塘的谭寿长，被鬼子活刚于警港渡船亭子，其状惨绝人寰。

留驻杨桥的数百鬼子，骚扰特甚，出外“打闹”，常数十百人不等，远及高家坊、福临铺、湘江沿河一带，近邻受害尤深。田坪村荷叶塘王荣湘不满10岁的弟弟王桂香，一日，躲在

屋后树山里，听见鬼子嚎叫着追赶一妇女，女人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他便探出头来张望，恰被另一鬼子瞧见，举枪打穿了他的肚子，肠子顿时流出。从午前到傍晚，呻吟呼唤，家里人求医不得，活活痛死。

驻油铺塘（今望城二中）的鬼子，初来时残暴凶恶已极。马号村庄家塘余六嫂等3个青年妇女，被鬼子追逼得投塘自尽。老屋湾的徐二嫂快临产了，鬼子“打闹”进村，她怀着大肚子也只好躲进山中暂避，因为一阵奔跑，胎儿下地了，身旁又无他人，就艰难地脱下衣服把小孩包裹好。回屋后全身乏乏，面色苍白，久卧不起，染下病来。丁家村麦子冲杨义庭的二嫂、三嫂和冬姐，带着3个孩子被鬼子追上，六个大人和小孩都被逼死在一口水塘里，后来人们为怀念这六位无辜的受害者，就称这口塘为“六个塘”。

7月某日，驻震凝港的鬼子，对抓来的外地民伕有过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几天后，家住今翻身坑桥垅上的文定国，从黄猫咀附近一条巷子中路过，只见两旁的尸体横七竖八，约有20多具，都已腐烂，惨不忍睹。胡家冲子的王六爹，被鬼子活埋于自家屋后的小山中。70多岁的余子騫被掳，要他干重活，无力承受，被踢进夹圳湖石头沟里淹死。一日，鬼子“打闹”至桃花岭，张家冲子袁姓屋里躲了几个妇女，有的涂黑了脸，有的故意弄脏一身，有的躲在床底下，但无一幸免，遭到强奸和轮奸。上冯家塘尾里几个妇女，听说鬼子已经进村，脚都吓软了，慌忙中只好躲在床上放下帐子，并用手捏住帐门。鬼子进房，就用刺刀对着帐子里乱戳，刺得床上鲜血淋漓，传出一声声惨叫。1945年6月上旬的一天，驻丁字湾的鬼子捉了当地保长李赐湘，剥光他的衣服，缠上鞭炮点燃，炸得皮开肉裂，血肉模糊，再在李的头顶和小腹部钉上长钉，就这样将李活活磨死。

1944年8月的一天，霞凝乡荷叶村五里堆60多岁的雷五爹，被鬼子绑在木靠椅上，下面堆放木材点燃，烧得焦头烂额死亡。湘粤村烟坡，一个从四川改嫁来的老妇人，被鬼子推进瓦窑中活活烧死，后来有人取瓦时才发现她已烧焦蜷曲的尸体。

靖港沦陷后，成了铁蹄蹂躏的重灾区。一度比较繁华的水乡古镇，很快萧条下来，商贾多数闭市，入夜行人稀少，笼罩着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泔水南岸堤是鬼子的军火仓库，库区两端各竖一块木牌，上写“不许中国人通行”，凡我同胞未经许可越界就遭枪杀。一年多时间，靖港一带被鬼子杀害30多人，曾君和、侯绍全、杨湘蒲、侯元四等均在被掳的途中遭鬼子杀害。靖港镇运木队工人陈文德，目睹鬼子的残暴罪行，忍无可忍，他几次对别人说：“日本鬼子一天不除掉，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于是，他秘密参加了正义军便衣队，在镇上暗地侦察敌伪情报。他的活动引起汉奸注意，密报了鬼子警备队，1945年5月不幸被捕，鬼子用汽油浇在他的头顶，点火燃烧，皮肉爆裂。这次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有我方军民6人。鬼子“打闹”到源头村，强奸了卞××50多岁的母亲，卞氏悲愤之极投水自尽，虢家湾虢贱嫂遭轮奸后亦自缢身死。挂榜山村鬻塘的宁刘氏躲进茅草丛中，被鬼子发现后逼奸，用刺刀划开了她身上穿的三条裤子，她仍坚决不从，鬼子恼怒，朝她腹部一刀刺去，很长时间才咽气。腹家山侯×娣的女被7个鬼子轮奸后，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沦陷期间，靖港不少房屋被焚烧，仅镇西半边街就烧掉半华里长，居民及店铺数十家。几幢较大的建筑如紫云宫、侯家祠堂都部分被毁败。

日寇陷靖港后，又分兵窜犯宁乡，配合其犯湘之右路军增援宁、益一线。夜间，途经格塘的蔡家管子、万家坝一带弯曲路段，因夜色迷蒙，不辨路径，鬼子便点燃近处的四、五栋草屋照明行军。顿时火光烛天，化作一片灰烬。然而恶有恶报，

翌日，该部敌兵在宁乡城郊的南门外，遭我守军迎头痛击。二、三天后，洑水河里便断断续续漂浮着鬼子的数十具尸体，随波逐流而下，江水为之腥臭。

在乔口，鬼子曾放出军犬将双坪村一刘姓农民咬得皮开肉绽，人们听到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刘终因出血过多而死亡。新康一带，被鬼子直接杀害和逼迫致死的男女老少不下20人，烧毁房屋十多栋。颇称热闹的沱市一条街，也是在1944年秋被鬼子纵火焚烧的，一日之内，一片废墟，当年只有残存的辖神庙，是这桩罪恶历史的见证。

1945年农历四月，鬼子将樟木村农民刘立山、喻金榜等3人抓去，诬为我游击队员，严刑拷打后，凌迟活剐。后来家属去收尸，目睹惨状，死者都是被拦腰一刀，皮肤从上下两头剐割开来。桑梓村吴家染房一次被掳去3人，其中吴四贼子因挑不起担子，被当场打死，其余二人也一去未归，生死不明。

远离湘江和铁路、公路沿线的乌山徐家桥一带，由于在肖家湾驻了一小队鬼子，不过10多人枪，竟使方圆几十里内数以百计的地方武装、各种番号的游击队闻风丧胆，不敢与之交锋，致使这股骄狂的鬼子竟能横行无忌，四出“打闹”。1944年深冬，驻在大垅汤家冲，由王康其、魏石愚统领的联乡大队多达百数人。一日，天刚微亮，遭来自靖港、白沙洲方向的鬼子奇袭，联乡大队人马一击即溃，四散奔逃，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也无防卫措施，一个叫朱铁纯的伙伕被鬼子打死。就在这天，鬼子从邻近的周家山一带疯狂地抓了8个农民，用绳子把他们的手腕捆住连成一串，天黑时牵到一处路旁田边，一个接一个地用刺刀捅死。现住高桥村洪家冲70多岁的尹正坤是拴在最末的一个，眼看前面的七人都倒下去了，挨到他时，身上已被刺好几刀，嘴角划开，血流如注，扑倒在地，但心里依然清楚，自己还没断气，任凭鬼子脚踢，或划亮火柴察看，也不哼

不动，等鬼子离去后，才艰难地爬到一亲戚家，总算活着下来。几十年过去，这血海深仇怎能忘记！

白箬铺，是长宁大道的中点，鬼子在这里驻了一个警备队，与驻龟头市、九江庙、宁乡等地的寇兵配合，常对我卯田抗日基地进行袭扰，多少无辜百姓被他们当成抗日的便衣人员抓去，惨无人道地凌辱与折磨，如用盐水浇在被抓者的肉体上，放马去舔食。1944年底，就有文神保、侯绍全和良滩桥一做长工的曹姓农民等5人，被活埋于白箬村窄塘冲沙窝里。

鬼子第一次犯枫树铺，是在1944年6月13日下午，时值大雨，大队人马驻枫树铺停留两日，在临时吊马的屋里，拿来邻近各家数以百计的被子垫在地上让马踩。驻黄花塘西侧桥头铺的鬼子，“打闹”到真人桥村烂坝子，逼着易细八老信用锄头砸自家的什物器具，鬼子们则站在一旁开心。永安桥刘××的母亲被鬼子轮奸后，还把她的衣裤丢到水里，肆意加以侮辱。

当年，在下望城坡靠理发营生的彭六生的儿子，一日，我游击队便衣人员趁鬼子在他店中理发时，用剃刀割断了一个鬼子的咽喉丧命。不多时间，驻点里的鬼子倾巢出动，扬言如不立即交出杀人者，就要放火烧街，居民惊恐不已。维持会的人出面求保说情，才暂缓动手。后来鬼子抓到彭六生的儿子，施以种种酷刑，将他折磨而死，其时，彭新婚还只一月，就饮恨离开了年轻的妻子。

1944年中秋过后，驻今五峰乡阎家湾的日寇，被我游击队打死了两名士兵。之后，鬼子疯狂报复，在联峰村前塔院烧了一栋房屋，还四处搜捕我抗日战士，胡乱抓人，闹得地方百姓惶恐不安。鬼子进犯至桐木桥一带，派汉奸打听这里的地形和路径，当地民众中一智慧过人的长者，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便将方圆十几里内的丛山峻岭，按地名骆驼咀、桐木桥、石门坎、小洞、大洞、楼梯岭、天上岭各处，巧妙地编成一首民

谣，骑骆驼，到桐桥，过石门，钻小洞，进大洞，搭楼梯，到天上……，鬼子听了，当心这里的地形过于复杂，深恐失利，只好闻而却步，循原路退去。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沦陷期间，据东城、杨桥、新康、白马、桐木、坪塘等乡镇的不完全统计，被鬼子杀死189人，被奸妇女306名，其中因被奸而自杀的76人，抓掳村民上千人，烧毁房屋227栋，抢走和凌割猪牛2000多头。就望城境域而言，包括外地民伕和难民，被杀害者当在1500至2000左右。如此怵目惊心的数字，实属空前的大灾大难，历史将永远记下这桩罪恶！

三

对于日寇的血腥屠杀和蹂躏，必然地引起人们的抵抗，在望城境内各地，我爱国军民群体或单个袭击鬼子的事例累有发生，在当地广泛传诵。人们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这里列举的是除了正面战场以外的几次零星战斗，有属于正规军的散兵游勇，有属于国民党各军事系统下辖的游击队，也有地方武装的行动。

1944年9月22日下午，日寇的一个联队从长沙县北山牌楼向今杨桥湖西村土地坳进发，企图进驻铁路沿线，其先锋刚进入土地坳狭长地带的三分之一时，当地驻扎在梓木洞的国军九十二师一部，从阳山岭向来犯之敌猛烈射击，日寇立即停止前进，抢占两侧山头还击。顷刻间，在黑头坡发生遭遇战，西面尿桶山我守军亦以火力支搭，用机枪和迫击炮攻击黑头坡敌阵，彻夜枪声未断。次日，敌机一架飞临阵地上空，指示寇兵攻击方向，脱离战斗，并从紫竹坡至梓木洞一线十几年垦的狭长地带，大肆烧杀掠夺，残害无辜，然后循进军原路撤退。战

斗结束下来，日寇死伤百余人，我军亦有较大伤亡，外地民伕及当地村民30多人惨死于鬼于刀枪之下。日寇遗体，一部分被其当场焚化，其余都踩入附近烂泥中，算是掩埋了。

驻守卯田的长沙县抗日自卫团，在司令邓如灿率领下，与来犯之敌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战斗，取得了保卫抗日根据地的胜利，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全国光复。第一次是在1944年11月2日，此次为敌所乘，战斗失利。第二次是1945年1月13日，敌集结宁乡、白箬铺、龟头市、九江庙等地驻军，乘大雪天分数路再犯卯田，县自卫团主力抢占山头迎战，另一支队伍埋伏在西面陈家冲的菜塘里（冬干水浅），当敌兵临近时，以塘基为掩护，猛烈扫射，打死打伤许多敌兵。第三次战斗，发生于1945年6月上旬，盘踞在长沙西境的日寇，又集结了上千兵员，分数路直犯卯田，我自卫团英勇抗击，也是卯田抗日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从清晨至午后4时许，激战近10个小时，毙敌警备队长一名，士兵20余名；我警察大队长温填梧不幸被敌生俘，后惨遭杀害；重机枪中队长以下官兵数十人壮烈殉国。

1945年初春二月，我七十三军游击队与正义军别动队协同作战，埋伏在枫树铺张家湾（原）公路两侧，打了一次非常漂亮、利索的速决战。鬼于沿长、宁公路一线多处设防布点，并常有大股队伍穿巡其间，我方摸清了敌人的这一规律，经过精心策划，采用口袋战术，张网以待。一日上午，埋伏在枫树铺彭炳文家屋后山头的我方侦察员，远远瞧见从白箬铺方向有一列队伍走来，待看清是鬼子队伍时，便飞步跑回张家湾阵地报告敌情，准备战斗。鬼子很快接近板桥巷于以南的公路地段，看看大摇大摆走过了张家湾前面的桥洞，这时，部看公路北面张家湾屋前阵地的火力骤响，一阵机枪扫射，鬼子立即滚向公路南侧，依托路基组织还击。殊不知距鬼子身后百多米远的庙山我方阵地，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集中火力猛射，

还有埋伏在南冲塘山头的火力点也一齐打响，数十名鬼子陷入伏击圈内，四面受击，战斗不到一小时，就把躲缩在路基下面一道田坑内的24名鬼子全部击毙，另生俘一名鬼子、一匹军马，缴获所有枪枝弹药。唯有躲在桥洞内的7名鬼子因占据了特殊有利位置，我一战士伏在公路上窥探洞内目标时，刚伸出头部，即被洞内的鬼子举枪击中。因而这几个鬼子等我方打扫战场离去后，得以生还驻地。此次战斗，我方亦牺牲6人。下午，从桥头铺、白箬铺开来的鬼子队伍，将24具尸体抬至白箬铺焚化。我方则在坪山一驻点内召开了庆功祝捷会。

1944年7月26日，在沱市对河的黄花岭、白沙围河堤一侧，进村“打洞”的一群鬼子遭正义军别动队伏击，毙死10余人，正义军牺牲1人。

1944年12月下旬的一天，正义军别动队四纵队二支队三大队的中尉排长顾麟，率部埋伏于新康毛湾，与前来进犯的鬼子40余人枪战斗一个下午，毙敌数人，顾部亦有伤亡。

1944年农历七月初，一个叫赵汉雄的正义军别动组组长，带领6名成员，叫回龙洲港口河青年刘长生带路，在今大湖乡润湖塘一户人家埋伏下来。从窗口向前面的塘基瞭望，当6个鬼子列队走到相距百米远时，别动军中一个麻子忍不住抢先开火，鬼子卧倒还击，麻子冲上去用卡宾枪扫射，击毙其中的1名，其余5名逃脱。

1945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鬼子从驻地观音港包孝肃公祠出来，西向走到三、四里外的白公坝藕塘路边上，逡巡张望一阵之后，刚涌上堤桥桥面，这时，隐蔽在古塘夹巷子、坝头上翁家围子、团山子等地的我七十三军游击队集中火力向鬼子射击，一阵密集的机枪、步枪响过，11名鬼子纷纷应声倒毙。另一名鬼子翻译，也随着一蹦跳下桥去，装死不动。伏击战很快结束，游击队眼见鬼子全部被歼，迅速组织撤离。但有名战

士跑步来到桥下动手拾枪，不意被一个垂死的鬼子小军官用手枪将他打死。约半小时后，装死的日翻译爬回巢去，等到又一股鬼子奔来，突袭者已没了踪影。鬼子把桥下的尸体抬回驻地，田中队长煞有介事地为死者念经超度，合家掩埋了事。然而嗜血成性的鬼子，紧接着又是对当地居民一阵疯狂的报复行动。

1944年农历五月的一个下午，家住今翻身垸桥垸上、30多岁的文定国，正侧着身子坐在屋前抽水烟，冷不防被一个持枪的鬼子从后面靠近一把抓住他，押着往谭家巷子驻地走去。上了皇新桥，鬼子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他的背部，催促快走，到第四个桥墩时，文一个急反身，顺手使劲将鬼子推落桥下。时值初夏，溪水暴涨，水满流急，鬼子沉下去再没出来。但文定国一连好几个晚上都不敢睡在家里。

在丁字湾，船工胡金生为反抗一鬼子的拦路敲诈勒索，不顾一切地与这个鬼子拚死扭打，最后用花岗石块把对手砸得头破血流，脑浆迸裂面死。

刚沦陷不久，在书堂山东面的何家铺子，以吴碧成为首，还有村民夏丙咸、周端章、李年生、周汉兴等人齐心协力，打死两名进村“打闹”的鬼子。

在沦陷的一年多时间里，活动于靖港的正义军别动队，依靠当地民众，共截获和智取敌人长、短枪84支，烧毁气艇一艘，活捉鬼子两名。1944年8月的一天，几个鬼子驶一条小船停靠在浏水河北岸码头，其中一个上岸到卞玉亭的小店里喝酒。这时，潜伏在店中的别动队员罗自强、徐浩元等3人，眼明手快，旋即用长毛巾从后面勒住鬼子颈脖，背了就跑，送到情报组的临时驻地民丰村梁家湾，再押解去别动队总部报功请赏。另一名被捉的鬼子叫清三藏富，是别动队员设下翻套，在酒宴中诱捕的猎物。

1944年6月30日，一小队鬼子从靖港向格塘进犯，经三合村大马塘至浴池樟树园一带“打闹”，青年程广达和程香庭、程智远等合力打死一名鬼子。当晚半夜过后，他们又将鬼子尸体抬到离易家坝半里远的黄婆咀沙洲上掩埋，无人知晓。

1944年9月底，一日，3个鬼子“打闹”到白沙洲玉带庵上边的石咀子。这里有个一生从事中草药医术，且长于武功，名叫杨贵发的人，几个月来他目睹耳闻鬼子的残暴罪行，早怀杀敌之意，今日见鬼子来临，送货上门，真是绝好时机，他决心施展一下手中的功夫。于是，随手拿来一只拉风箱的手柄，从房中走出，瞅准对手的部位，乘其不防，使劲打在鬼子的眉心间，一下一个，都倒地动弹不得。接着，闻讯赶来的村民李至若、杨拐子等人一齐围了上来，把两个鬼子打死，尸体就埋在坝泥里。站在屋外张望的那个鬼子，知道里面出了事，气急败坏地跑回蓼叶山驻地。下午，20多个鬼子前来报复，焚了堤上易大公的三间茅屋。大湖村一个叫周三推匠的中年人，很有些力气，一名鬼子到他家“打闹”，他抡起木棍朝鬼子脑袋雨点般地打去，鬼子无力还击，终被打死，抛尸湖泥中。

光复前不久，时值炎夏，一日，在望城坡西面箭弓山靠近长宁古道边放哨的鬼子兵，下山到何新初母亲开设的小店里弄水喝。正在喝水之时，早已埋伏在里间的两个游击队员冲了出来，用一团烂布塞进鬼子口里，用麻袋从头顶往下罩住全身，然后紧紧捆绑背走了，干得十分干净利索。

1945年临近插秧季节，敌我双方的便衣队在桥头铺对面糖坊岭附近碰上了。我方发出口令，对方答不上来，鬼子拔腿就跑，游击队员紧紧追赶，其中一个鬼子跌落在千弓坝里淹死，当地居民知道鬼子发现后又要找麻烦的，便悄悄地将尸体掩埋它处。但鬼子硬是逼着民伕在坝里捞了四、五天，毫无着落。

到1945年收割中稻时，住温家塘的一个鬼子，换了农民伕

寅生的扮禾衣，戴上蓼叶凉棚，用储币到镇上小店里买饼吃。被我便衣队员与附近的农民侯雪生等瞧见，一齐上去将鬼子刺得遍体鳞伤，正在扮禾的侯建文亲眼看见那个鬼子朝回走去，踏在小街石板上，血顺着脚杆向下流，一步一个血印，刚走到温家塘角上就倒下了。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但穷途末路的侵华鬼子兵，有的仍拒不服罪，继续作恶。在望城坡，两个鬼子到清水塘芦家坡大路边抢劫过往行人的钱财，被我正义军击毙一名。另一鬼子回去报信，随后，几百鬼子便聚到望城坡街上闹事，抢了黄枚生家一床新帐子裹尸掩埋。8月底，驻靖港的鬼子还到终南村一带打闹，杀死了侯海富的胞兄，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此事曾由我方当局向日酋上司提出控告，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驻霞凝港谭家巷的鬼子军营中，有6名鬼子如丧家之犬，默默走到今望胜村当天湖闸口处，用手榴弹集体自杀。随后，一名日军官闻声赶来，每具尸体砍下一个手指带走。在那段时间，鬼子龟缩在驻点里很少外出游荡了，但关于鬼子官兵或剖腹自杀、或投江自沉的事则时有所闻。

凡此侵华鬼子的种种悲哀与自绝之时，正是中国人民结束八年抗战、欢庆伟大胜利的日子。

临湘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机构内幕

姚楚湘*

一、日伪临湘县政府组成情况

1938年11月（农历九月），临湘沦陷，汉奸王旦初（本县长安乡飞跃村古冲人，解放后已镇压），出来组织总维持会，自己充当总会长。会长以下，设有秘书一人，行政委员、治安委员、经济委员各一人。

当时，秘书是曾儒风，长安乡王禾村曾家台人。此人好吟诗绘画，加入维持会后，利用秘书职务的身份，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常常向国民党军队、游击队提供情报。后被甘心卖国、认贼作父的汉奸、伪保安大队长曾得庸察觉，向日军告密，曾儒风被日军活埋。行政委员是姚亚平，又名姚楚南，五里乡伏西村人，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甘延庆的交警总队任出纳，解放战争时，在河北昌黎县被打死。治安委员是卿松甫，上湖南人，现况不明。经济委员是游汉斌，长安乡游家冲人。这个维持会，除个别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外，大多数是充当日军的爪牙，犯下了许多卖国害民的罪行。

1939年12月，为了强化敌伪统治，以总维持会为基础，成

*姚楚湘，临湘人，原在国民党八十二师奇袭一大队四中队当队长，被俘后任伪临湘县政府教育科长。1949年起义。

立了“临湘县政府筹备处”。处长仍是王旦初，秘书曾儒风。下设机构和人员已大大扩充，筹备处内设有民、财、建、教四科，以及秘书、书记、庶务、管卷四室；另外还成立了警察局、保安大队及长安镇公所；并且把全县分为五个区。秘书曾儒风私刻篆字体的“临湘县政府筹备处印”印章一枚，报请伪湖北省政府备案。

1940年6月，“临湘县政府筹备处”改为“临湘县政府”。至此，日军在临湘的伪政府机构，正式组成。新成立的“临湘县政府”除王旦初一人由“筹备处长”换上了“县长”的头衔以外，其余一切与“临湘县政府筹备处”完全相同，人事也无一变动。伪“总维持会”、“临湘县政府筹备处”和“临湘县政府”的所在地，都是在长安北正街原天主堂旧址。兹将我所能记忆的伪县府内部机构之概略，分述如下：

一、伪县长一职，由王旦初以总维持会长的身份继续担任下来，搞了两年。后来日军认为他能力不强、办事不力，到1943年元月，将他免职，以沈峨僧继任。沈又名景崧，源潭乡排碧桥人。他曾假40岁生日“做寿”之名，大开筵席，收受很多礼品，如金章、银盾，为数极多。又在民穷财尽的当时，出售5000元日钞的彩票，既没有公开开彩，又没有一人中奖，5000元日钞，全饱私囊。1944年某月，游击队某部派员与之联系，意欲里应外合；而沈却予以拒绝，并回诗一首，其中两句云：“樱花已属东风管，寄语流莺别处啼。”其出卖民族、国家，甘心认贼作父的汉奸面目由此可见。那时，交通不便，食盐运输困难，以致盐价昂贵，一石稻谷只能换一斤盐，不少贫苦农民经常淡食，而沈则利用亲旧关系，将配给人民的食盐抽出一部分，以高价运往各地出售。他还私贩鸦片烟土，毒害人民，所得暴利，任其挥霍。土改时被镇压。

二、伪民政科，掌管一切政治设施，但只是官样文章，

实际并管不了什么。第一任科长李远谋，长安乡水井村人。他是别动队张祖愚部谍报员，后被王民兴（长安乡张牌村人）派兵痞姚瑞旦刺杀。第二任科长李意德，又名李继白，长安乡杨田村人，是伪县长沈峨僧要日本兵把他捉来，强迫他当科长的，今尚健在。第三任科长李定正，长安乡杨冈村人，已病死。

三、伪财政科，掌管伪县府财政。科长姚亚平，是原来维持会的行政委员，他连任7年，一直没有换人。

四、伪建设科，掌管长安城内建修各机关房屋。第一任科长李甄陶，又名李藩伯，桃林人，现况不明。第二任科长谢迪安，湖北汉阳蔡甸人，是伪湖北省政府派来的。

五、伪教育科，名为掌管全县教育行政，实则各自为政，连长安一所初级小学也管不着。学校人员是伪县长指派的，书籍是“宣抚班”供给的，经费是财政科直接拨的。第一任科长是我。我于1939年8月，到国民党八十二师罗启疆部奇袭第一大队（大队长钟湘灵）第四中队当队长。同年10月某夜，在长安西面五里许的把切塄铁路边，我的左脚背被日兵枪伤，不能行走，被俘，关到敌军卫兵室。伪财政科长姚亚平与我同宗，尽力救援，幸免一死，强迫我当教育科长，但也只是挂了个名。1941年12月某夜，长安“难民区”300多间茅棚失火烧得精光，数百难民向伪县长王旦初请求救济，未得圆请答复。群众愤怒，拥向伪警察局，砸坏门片、窗户，敌军以群众暴动而出兵镇压，始告平息。是晚，数军将我和我妻子李柳英捉去关押，硬说这次难民暴动是我指使，定要枪毙。幸此时伪县长王旦初免职，沈峨僧继任，沈竭力保我，将我撤去教育科长职务，释放出狱。第二任科长雷振乾，南京政大毕业，长安乡水井村人。

六、伪秘书室，第一任秘书曾儒凤。第二任舒家棠，又

名舒华章，汉口人。第三任吴曙东，汉口人。第四任李定正（兼民政科长）。

七、书记室，专负缮写公文之责。负责人杨勃泉，五里乡小源村人。

八、庶务室，管理伙食及其它杂务。负责人游汉斌。

九、管卷室，负责人王宇炳，长安乡陆家畈人。

至于伪县政府的经费，起初既无上级拨款，又无捐税，全靠贩卖食盐剥削人民。到了1943年12月，在县境要道设立关卡，抽收行商税，由伪财政科印发税票。

二、伪县属其它机构情况

一、伪临湘县保安大队。这个机构是成立“临湘县政府筹备处”时成立的。伪县长兼大队长，第一任大队副曾得庸，又名曾佛钦，长安乡王木村曾家台人。这时只有一个中队，兵员60多人，烂枪10余支，配置在长安日军的东、南、西、北四个哨所守哨，枪查出入行人。有时，同日军一起出击打仗。曾得庸这个民族败类，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当他察觉秘书曾儒风是潜伏谍报员后，于1940年9月，向日军密报。日军将曾捉去，严刑拷打，将他身上的血用针抽出注入敌马体内，最后又将他活埋。1941年11月，伪县府以曾得庸出身和尚，不懂军事，免去其大队副职务。第二任大队副苏济民，江苏人。这时，有了两个中队，兵员130多人，步枪60余支，手枪10多支。1942年9月，原驻长安的大部分日军调走，只剩两个班，由伪保安大队留守长安。就在这个月的某夜，游击队大举进攻长安，将伪保安大队部放火烧得精光，伪兵溃散，苏济民被活捉去。后来听说他在岳阳工作，现已病死。第三任大队副李大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营长回乡的，长安乡水井村人。他接任不久，伪县

长换了沈峨僧，沈的旧部刘廷富（河南人，原是国民党军排长）率枪兵60多人，轻机枪1挺，投向沈峨僧，编入保安大队，因此，伪保安大队扩编成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驻守桃林，队长王成玉（河南人）；第二中队驻守长安，队长方毅然（又名方官保，五里乡新球人）；第三中队分驻羊楼司、托坝等据点，队长刘廷富。1943年底，李大谋因出售电器零件被日军关押撤职。第四任大队副邓凤藻（又名邓文甫，湖北蒲圻人）。他到差后，举办过一期保安大队军士训练班。日本投降后，这个伪保安大队编入游击队第十一挺进支队。

二、伪警察局。设局长、秘书、巡官各一人。下设行政、警务、庶务三课，有警士40多人。开始，所有警士集中在火车站装卸货物，与搬运苦力一样。后来，他们站岗、守哨、检查行人。有位别动队员名叫白元，云南人，他携枪投向伪警察局。以后常领警士陈国庆、李顺生等以侦查国民党和游击队情况为名，四出活动，将敌人情况向游击队报告。敌人出击，有时命令警士带路，警士佯为带路，而事先就向游击队通报了。第一任局长卿松甫，上湖南人，原国民党军连长。第二任局长宋鸿轩，湖北汉阳蔡甸人。第三任局长陈汉文，湖北黄陂人。第四任沈纯康，又名沈英，本县源潭乡排碧桥人。

三、伪临湘县合作社。1939年底，由伪县府职员集股，每股日钞10元，共集1500元，经营日杂生意。初则按月按股分红，后来按年分红，招牌是“长安公卖处”。嗣后，本钱扩大，经营范围极广，各种货物都卖，就改名为“临湘县合作社”。社长由伪县长兼任，副社长由日籍人担任，掌握实权。其他职工，都是本地人。后来大量收购粮食、牲猪以及铜、铁、铅、锌等金属物资，全数运走，去支援日军的侵华战争。有个日籍副社长名叫中崎万治，任职三年多，搞了很多钱。他私人在五里牌设了一家“中崎洋行”。日本投降后其财产被其助手

杜先权（长安乡七庄村人）全部搬回家中。土改时，才如数交还人民，杜先权也伏法了。

四、各区伪政权组织。全县共分五个区：第一区聂市，先后担任伪区长的有舒家荣（汉口人）、李定正（长安乡杨田村人）、李大谋（长安乡水井村人）；第二区云溪，先后担任伪区长的有卢复初（云溪人）、甘福全（路口四房甘家人，土改时被镇压）；第三区是桃林，伪区长谈近善（桃林人）；第四区忠防，伪区长李家伯（忠防人）；第五区羊楼司，伪区长方鸿勋（羊楼司油铺人）。

三、日军直接派驻县内的机构人员情况

一、日军汉口特务部派驻伪临湘县政府的官员：其官衔“嘱托”，以后改称“联络官”，是实际的县长，伪县府的一切，事无大小，都要过问，就是例行公文，也要查阅盖章。第一任是“嘱托”石割荣，他在临湘一年多，最贪女色，与保安队长王成玉的女儿通奸，还生了个混血儿。他调走时，要学校和伪县府赶造1500元的体育器材、文具纸张及其它办公费用的预算表，他照表上数字从金库将全部款项私人拿走了。第二任是“联络官”松永作太郎，还有“联络员”长井俊雄和石原光男两人。长井管保安队，石原管警察局。松永这个人很狡猾，曾请长安峡山人李正善去联络当时游击队路北办事处主任陈伯勋，企图收买他，但未成功。

二、宣抚班。宣抚班实质上是收买民心，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机构。设宣抚官一人，辅佐上等兵三至四人，翻译一人。该班负责调解日军与老百姓之间的小矛盾，如哨兵拿了百姓的菜，报告了宣抚班，可以派兵去替百姓拿回未。第一个宣抚班长伊藤西美中尉，第二个伊东亲美中尉，第三个秦中尉，

第四个矾贝秀夫少尉。通译赖阿万，台湾人，如果当地群众有事找他，他总是尽力帮忙。他在长安时，与长安游家冲的王金桂姑娘结了婚，光复后带往台湾去了。

三、密 缉 队。这些人虽不是日本籍，但都是认贼作父、甘心卖国、狼心狗肺、地地道道的汉奸，他们隶属于日军司令部。全队50人左右，都是招收临湘、蒲圻两县的无赖之徒。大队长姚海燕，五里乡楠木村人。敌人出击，他们常当尖兵，化装四出，探听地方军情，常埋伏要道，抢劫财物，枪杀人民。

密缉队大队长姚海燕在桃林时，附近有个李某，新婚只有两夜，姚见那女人漂亮，就派人将她捉来，供其奸淫，做他的老婆。以后回到长安，见他部属罗瑞耀的养女兰英，容貌可人，又起歹心，接罗兰英做老婆，把桃林的那个姑娘丢了。

密缉队这帮家伙，豺狼成性，不独老百姓望而生畏，就是日伪县府各机关的职员们，也常胆颤心惊。如果他们加你一个所谓“通倭”的罪名，随时就有被抓去毒打、灌水、丧生的危险。日军投降时，姚海燕一伙，被游击队枪杀了。

四、伪湖北省保安第二总队。1942年6月，伪湖北省保安第二总队开来临湘驻扎。这个总队，枪兵千余人，直属伪湖北省保安处。总队长马耀奎，湖北人。总队部驻扎在五里牌大屋王家，除所属第二大队（大队长童自新，湖北人）进驻聂市外，其余部队自云潭到羊楼司沿铁路线驻扎，担任保护做路任务。这支汉奸武装，军纪军风极坏。马耀奎本人，视赌如命，有一次与沈峨僧等人赌博，将自卫的战刀，也作价200元输给沈了。

1943年8月，敌人为了缩短航空距离，以便破坏我抗战的后方，在陆城的八里湖（现在的新设村）修建飞机场，责令伪县政府负责督修。当时曾成立了伪“临湖县政府陆城办事处”，以姚亚平为主任，大派民工，劳民伤财极巨。

我当维持会长的回忆

张修运*

1943年的古历四月初四，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第一次踏进了美丽富饶的洞庭之滨——安乡县。一时间，乌云笼罩，人心惶惶，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那时驻防在县城的扫寇部队是44军的一个营，由于该军与73军（又称卫国部队）调防没有衔接好，给日寇以可乘之机，他们轻而易举地从津市经澧县望风而来。卫国部队的一个连在县境的礼阳垸防守，不战自溃，弃械逃遁。以至老百姓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遭受了鬼子洗劫和蹂躏。

当时我家住在永丰乡第一保（现为安裕乡安庆村），屋旁有一条营路直通恙口，北至礼阳垸与澧县官垸相连，与县城相距仅10华里。日寇犯境时，老百姓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鬼子烧杀掳抢，奸淫妇女。大部份群众都到外地躲鬼子去了，以致田地荒芜，屋宇空荡。剩下的群众都是一些不怕死而又舍不得家财的“犟人”。他们希望有一个组织出而维持一下地方上的秩序，免遭日寇的骚扰和破坏。加之县里成立了维持会，为日本鬼子收粮筹款，拉伕派女人，以求敌人放下屠刀。要求各地也成立维持会。于是，我所在的永丰乡第一保保长向东林，见我胆子大会办事，就推举我当了保里的维持会长，还配了一

*张修运，现年74岁，安乡人，曾任保一级的维持会长。

个助手叫马日生，他主要搞些文字工作。

这年的四月，正是插秧季节，我家种了150亩田地，除我们弟兄参加劳动外，还雇请了6个长工，插秧扮谷还要请些临时工。尽管日本鬼子在城里为非作歹，气焰十分嚣张，我觉得这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我还是不违农时的安排好插秧事宜。我是弟兄中的老二，由我当家作主，有时也参加一些劳动。

一天，保长向东林、马日生和我3人约好，到县城去找县维持会长李华斌接头，但去县城的渡口已被鬼子封锁了，不能过河。我便借了本地农民郭锡之的一条小船（能载1000多斤），由我驾着，还带了群众中收集来的一百多斤鸡蛋。船行至县城附近的大鯨港码头时，见老百姓都跑光了，只有团总李连生的家里有两头肥猪在栏里嗷嗷待食。我们3人一齐动手把两头猪拖赶到船上，想一并带去交给县维持会。便驾着小船绕道朱家洲，正当横过河到县城时被鬼子发现了，他们朝我们这边乱打枪。我们怕被打死，也顾不得小船和装的东西了，便弃船跑了回来。回到家里只几天的时间，鬼子突然进村了，群众象挨了一闷棍，只得临时躲藏起来。原来，鬼子是从礼阳垸而来。沿途有电话线杆子作标记，敌人可以不用问路便可以长驱直入。鬼子的突然袭击，就连保长向东林也梦寐不知，他的全家也未躲得及。慌乱之中他躲在自己的阁楼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鬼子强奸，他连大气也不敢出。我这个维持会长的妻子也未保住，我的妻子是躲在一片蚕豆地里的，被敌人发觉后有12个鬼子将她进行了轮奸。她受到凌辱和摧残后，人事不醒，后来被群众发觉才从蚕豆地里抬了出来。

鬼子是一路行进一路骚扰。见了男壮劳力就抓去挑东西，见了青年妇女就强行奸污，为所欲为。好在鬼子没有在保上驻扎，仅是路过才没有造成更大损失。后来统计：这次被鬼子拉去的伙子有11人，郭学文的家里一次就拉去了3个，除郭学

文、他内弟马少云等先后回来外，他父亲郭兴堂一直未归，不知死在何方。这次被鬼子强奸轮奸的妇女有7人。我们保里一个叫姚腊英的青年妇女，因被鬼子追赶慌了，就爬在一棵树上躲着，鬼子发觉后要她下来，她坚决不从，鬼子就用刺刀挑穿了她的一个奶子，当即血流不止，以后诊了好久才愈。由此可见，日本鬼子是凶狠残暴的，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完全是一群丧尽了人性的畜牲！尤其可恨的是，他们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抢掠财产，烧毁房屋后还作歌谣以戏之。说什么，“吃的剥皮鸡，睡的美貌妻。烧的背时屋，杀的蠢东西”。真是无耻已极！

以后的两次沦陷我就再也不搞维持会了。鬼子来了，我就和大家一起同他“捉迷藏”，你来我走，你走我回。那时逃难还要“难民证”，我觉得这都是愚民政策。我就把白衬衣脱下来撕成条状，用墨笔写上“难民”二字，戴在手臂上过关出境。但我也被鬼子抓了3次，每次我都趁鬼子不注意时逃跑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县里的军政要人从逃亡中班师回朝，一片庆幸之余，我也为之高兴。但我借的郭锡之的一条小船和三人拉的李连生的两头肥猪都由我赔了款，共赔了一百多保谷。这是我本着“穷不忘本，富要饶人”的道理办事的，以后也没有人找我的麻烦了。

（郭志兰整理）

赵恒惕的军政生涯

凌霄九*

赵恒惕，字夷午（初字炎午），幼号瑛郎，湖南衡山县人。1880年12月25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衡山县白果赵家湾（现属白果镇棠兴村）。1971年11月23日，死于台湾省台北市荣民医院，终年91岁。

青少年时期

赵恒惕，祖籍浙江衢州。其远祖北宋赵清献公（讳扑，人称铁面御史）来游南岳时，爱其景色壮丽，因留幼子赵棠定居衡山，是为赵氏迁祖。赵棠之子赵方，赵方次子范、三子葵，均面支持南宋危局有功，得谥忠肃、忠宪、忠靖（忠靖配享南岳庙）。因此，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赵氏所办族学，命名为三忠中学（现改为衡山四中）。

赵恒惕的祖父赵裕章，务农。父赵璧庸，为前清邑庠生，曾创办白山学堂，在岳北颇有名望。兄赵恒愚，闲居乡里。弟赵君迈，毕业于美国陆军大学，旋入美面威斯康辛大学土木系，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税警团团团长、衡阳市长、长春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中华武术

*凌霄九，与赵恒惕均系衡山岳北人。抗战时期，在长沙、南岳、耒阳等地与赵接触频繁，赵多次向凌进及有关经历。

协会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其妻童锡翰，湖南周南女校毕业，系宁乡童锡梁中将之妹。君迈于1988年7月13日病逝于北京。

赵恒惕6岁启蒙，姿性不甚聪颖，读书常难于记诵。年10岁，丧母。父甚钟爱，使就外傅。两次应童子试，均不得售。旋以国子监生赴乡闈，亦未中试，乃发誓不再入科场。

两湖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方言学堂。1902年，赵恒惕应考被录。其三伯赵仲楠、伯母周氏，资助四百两银子，方就读湖北（赵仲楠即蒋经国旧部、原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得方言学堂监督程颂万赏识，选送日本留学。

赵恒惕于1903年赴日。原学师范，以国事危迫，乃改习陆军，初入日本振武学校攻读。1904年，在东京与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潜，云南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河南曾昭文等，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期同学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1907年，黄兴从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中，选择坚贞可靠的骨干281人组织铁血丈夫团。当时加入的有赵恒惕、程潜、黄郛、李烈钧、程子楷等。1908年，赵恒惕在士官学校毕业，留任日本见习士官。

辛亥革命前后

1909年，赵恒惕由日回国，应陆军部甄试及格。时广西巡抚张鸣岐，招致留日学生，赵亦赴桂，在广西兵备处工作。蔡松坡此时亦在桂，任广西讲武堂监督，旋主持兵备处与学兵营。张鸣岐离桂后，蔡亦去职。

1911年春，赵恒惕升任广西干部学堂监督，并接管学兵营。

旋任广西混成协协统。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反清。广西巡抚沈秉堃响应，宣布独立，就任广西都督。赵恒惕率学兵营与招编的混成协，进入省城，维持秩序。不久，赵率所部，随沈秉堃组援鄂北伐军，离桂经湘，开赴湖北孝感作战。黎元洪以援军既至，乃整齐编制，任赵恒惕、李烈钧为左、右翼军司令，与北军对抗。旋南北议和，两军停战。

赵恒惕因南北和议成立，奉令率部开往南京。当时因军饷欠缺，在部队开拔前，向黎元洪借款5万银元。抵达南京后，随即将款寄还，黎以在战乱时，军官能借款归还，事不多见，对赵颇为器重。

赵恒惕至南京时，正值整编军队，所部和后来陈裕率领的桂军合编为第8师，赵任该师第16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当时，黄兴极力想使第8师成为革命军队中一个中心堡垒，因而热心扶植。

湖南光复之初，都督焦达峰，尽量招募军队，扩充实力，故部队极为庞杂，即正规军亦拥有六师之众。湖南一省，无力担负如此巨额的军费。而袁世凯复深以南方兵力雄厚为虑，坚令裁减，谭延闿督湘，亟谋缩编部队，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又恐军心离散，变生肘腋。时黄兴留守南京，以裁军自任，对于桑梓之地自更关切。1912年冬，乃命赵恒惕在第8师中，提出精兵一团，以桂军取道湖南返桂名义，返回长沙坐镇，协助湖南整编部队。结果尚称圆满。

1913年讨袁，湖南响应。谭延闿派赵恒惕、程子楷赴岳州布防。赵率部进攻湖北蒲圻的鄂军。后因赣、宁兵败，粤、皖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芑铭领兵入湘，赵恒惕、陈复初当被扣押（陈系统领地方巡防营）。袁因赵力主独立，电汤将赵就地正法。幸有伍赓祥旅长以应依军法审办，不可随便处决的理由

力争，赵得以不死，械送北京。

当赵解经武昌时，黎元洪电询袁世凯对赵等如何处理，袁答复解送北京军警执法处。其时该处是全国闻名的杀人机关，犯人解入，即无生还。黎再要求袁世凯将赵改送陆军部执法处讯办。袁允其请。

黎元洪自1912年赵归还借款后，对赵颇为器重，故能仗义援助，以后也对赵始终成全关怀。赵在京系狱年余，1915年夏，由于黎的竭力营救和黎与黎锬的力保，赵乃得特赦出狱，寓居北京。赵以后每言及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受累，若非黎的鼎力照拂，当时必难幸免，故赵终身对黎感德难忘。

护国、护法战争

北洋军阀汤芑铭督湘，作威作福，滥行捕杀，湘人恨入骨髓，称之为“汤屠夫”。

1915年，袁世凯阴谋篡位称帝，蔡锷趁机离京赴滇。赵恒惕平时与蔡锷常有往来，亦受军警监视。是年冬，赵潜赴天津，寓日租界同乡刘揆一家。刘主办《中华日报》，专反帝制。赵常为文鼓吹。后赵浮海南还，由津至沪。谭延闿为赵向汤芑铭之兄汤化龙关说，因而化龙致函其弟，对赵先容。

1916年2月，赵恒惕持汤化龙函札，乃得由沪潜回湖南。时有曾继梧、陈复初、刘建藩同行，共商策动汤芑铭独立。由于谭延闿曾函达芑铭，不得再滥杀湘人，并劝勿再为袁氏效命，再加上各方正进行讨袁，声势盛大，故赵等返湘，芑铭颇以礼相待。

其时驻防长沙部队，为李右文所辖巡防营六个营。右文与赵恒惕素称友好，所属官兵又多为赵的旧部，赵因以李部为基础，助汤响应讨袁。在国内形势紧迫之际，汤芑铭于1916年5

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自任都督。同时编组湖南第1军，曾继梧任军长，陈复初、赵恒惕分任第1师、第2师师长，李右文任赵部旅长。

当时护国军陆荣廷部已抵衡阳，受滇军委派、归程潜统率的军队亦入湘潭。汤芑铭暗令陈策部偷袭程军，赵恒惕得知，派员先告程潜，程得预为准备，在中途发动攻击，陈策大败。汤芑铭闻讯，于7月4日离长夜遁。赵恒惕等共推与湘、桂军人均有旧谊的刘人熙出任督军。不久刘去，湘人重请谭延闿回省主持。

此时湘军有4个师：第1师陈复初，第2师赵恒惕、第3师陶忠询，第4师程潜。谭延闿接任督军后，着手缩编为两个师：1、3两师编并，归陈复初指挥（第3师旅长朱泽黄，为陈同学）；2、4师编并，归赵恒惕指挥（因程潜与赵友好）。而以赵恒惕为新编第1师师长，陈复初为新编第2师师长。赵师第1旅旅长为李右文，第2旅旅长为林修梅（程潜部属），陈师第3旅旅长为陈嘉佑，第4旅旅长为朱泽黄。

谭延闿履新三月，其母病逝上海，仓卒奔丧，命赵恒惕以第一师师长暂代督军，授陆军中将军衔。谭于翌年（1917年）春间，才返湖南。

1917年，段祺瑞为了以武力平定西南护法势力，命令傅良佐督湘，统率大军南下，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谭自知力弱难敌，且第2师师长陈复初早怀携贰，乃即离湘赴上海。

是年7月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赵恒惕派驻衡阳的第2旅旅长林修海联名通电，率领湘西24县宣布独立护法。时赵恒惕因奔父丧，闾归衡山原籍，但迫于时势，乃权出督师。赵与刘建藩在衡山耒阳河一带列阵御敌，与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等军，对敌达40余日。终以黄钹司令率敢死队百余人，抄袭敌后，致使敌阵动摇而取得胜利。尔后，湘军乘胜节节反攻，直

抵长沙。傅良佐已先遁逃。商震一旅在湘潭、宝庆间，未及撤退，尽被湘军缴械。湘军进至汨罗时，遇吴光新部，作战甚激烈。驱敌至羊楼司，又作战一次。自是尽逐北军于湘省之外，是年冬，赵恒惕率部屯驻岳州。

1918年春，冯国璋委曹锟为四省经略使，遣吴佩孚、张怀芝、张敬尧三路攻湘。吴率五个旅直取岳州，张敬尧经平江袭长沙，张怀芝自江西侧击醴陵。时谭浩明率桂军来援。赵恒惕与刘建藩分别在羊楼司、平江御敌。战斗甚烈，终以众寡悬殊，自岳州南撤，谭浩明坐镇长沙，尚未及部署防务。张敬尧抄平江捷径猝至长沙，省城被北军抢掠一空。

是时，湘军步步南撤，北军跟踪至衡阳一带，其目的是在进窥两广。赵恒惕与刘建藩决计拚死反攻，先合兵攻取攸县，继克醴陵，痛歼北军张怀芝部。不料张敬尧派援军腰截。湘军连月转战，甚为疲劳，仓惶退据山地应战。刘建藩失足落水而死，军心涣散，赵恒惕独立撑持，约近一月。至是年5月间，以兵无斗志，撤退布防于耒阳、永兴一带。赵支撑湘南一隅，直到1920年5月，吴佩孚北撤为止。两军长期对峙的原因是冯国璋应皖系之求，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佩孚甚为不满，故顿兵衡阳徘徊观望，不再进兵。继以直皖两系冲突日甚，吴也无意与湘人为敌，所以出现此种局面。

当时湖南南部属于西南势力范围，有两个互不相下的统帅，一个是驻于郴州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属于国民党），另一个是1918年冬取道广西入湘，驻在永州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后台为桂系军阀）。延闿久想排斥程潜，自己得为湘军唯一统帅。适驻耒阳的桂军马济部，扣留北方派来的政客陆鸿逵，截获北方与程潜密函（陆被马济以敌探罪枪决）。程被认为通敌有据，时论哗然。程部将领通电，声明与之脱离关系。弄得程潜众叛亲离，被迫出走。此案也有说是直、桂两系为了排除异

己，设下来的圈套。程既赴粤，谭便统一了湖南，由永州进驻郴州。

1920年1月，吴佩孚坚决请求由衡阳撤防北归。南方护法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吴军开拔费毫洋60万元，此款由国会议员钟才宏解送衡阳。吴与南方约定，直军退出一处，湘军立刻接防一处，避免战斗。于是直军从5月20日开始北撤（吴佩孚事前也电请张敬尧派员接防）。27日，直军由水路经长沙转武汉。湘军兼程推进，5月28日，占领衡阳，6月6日，继续占领湘乡、宝庆、衡山，随即迎头痛击张敬尧部于湘潭，张军失利，长沙形势紧张，张敬尧遂于6月11日晚逃走。6月12日下午，湘军顺利收复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以后又在岳州接战一次，约在8月间收复岳州。此时赵恒惕自请解除总指挥兼职。湖南护法战争，至此结束。

驱张后的斗争

南北两方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谭延闿主张用联省自治的方法，来谋求南北的统一。湘军将领赵恒惕等跟着通电表明，湘省实行自治，不受任何方面干涉。省议会也通电主张联省自治，拒绝客军假道，并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凡此种种，都不是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它将使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受到阻碍，这是国内总的局势。至于湖南局势，自驱逐张敬尧后，湖南内部更番发生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军人的斗争。首先是程的旧部，力谋迎程返湘主持省政。驻扎醴陵的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是程旧部，图谋驱谭尤急，竟发动兵变，劫杀谭的亲信零陵镇守使肖昌炽于平江，使谭不安于位。再则，谭曾表示自己不长于军事，一俟驱张以后，当以

总司令一职让予师长赵恒惕；省长一职让予湘南民政处长林支宇。后来，湘军发动驱张，实际指挥作战的是赵恒惕。但驱张成功后，谭仍死死抓住督军、省长、总司令，不肯放手。湘军各将领认为湖南的“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督军无功，希望谭实现诺言，让赵升迁一级，大家都可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

1920年11月中旬，湘军内部发生变乱，迫谭下野。谭于23日，召集军政公团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谭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不走。但赵、鲁默无一言。谭见形势不利，无人挽留，乃表示愿意引退，即命赵恒惕代理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代理湖南省长，分管军政、民政。赵在25日，就代总司令职。同日，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11月29日，国民党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授陆军上将，林支宇为湖南省长。

程潜部属李仲麟等，以拥程的计谋未售，工作进行日急。其时第2旅旅长廖家栋，亦为程旧部，参与拥程密谋，想里应外合，攻取长沙。谭延闿的亲信部属乃趁李仲麟来省参加12月24日的军事会议之机，矫赵恒惕军令将仲麟处决。当时赵的部属亦系谭的部属，杀害仲麟赵虽非主动，但事后不得不承担责任，遂宣布李以拥兵自恣，蓄意倡乱等罪。此案表面上为赵主持，其实仍为谭、程两派相争的结果。以后，谭赵两派斗争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未得安定。

1921年春，谭派军人张辉瓒想推倒林支宇省长职位，迎接谭回来先做省长，再逼赵下台。林知道站脚不住，于3月5日秘密离长出走。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一致认为临时省长一席，应由赵总司令兼任。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湖南省临时省长。

1921年冬，粤军入桂，孙中山亦抵桂林，计划北伐，曾派

胡毅生来湘，与赵恒惕密商北伐事宜。当时商定粤湘盐米互换，以裕饷源，并谈及双方兵力的配置和进一步配合。赵特派李汉丞赴桂林迎接孙中山来湘，且预定以省长公署为孙行辕。孙答以长函，后因事未来。不久，孙中山又派参军吕超来湘，办理赵恒惕、宋鹤庚等入国民党事宜，并携带《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颁赐赵恒惕。赵率文职厅长以上、武职旅长以上，在省长公署同时宣誓入党。赵并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列为必修学科，军队亦不例外。

“援鄂战争”失败

赵恒惕利用“自治”这块大招牌，向外宣布保境息民，一面与川、滇、黔、粤四省军阀，组成了“联省自治”阵线，一面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鄂、赣两省，建立联防条约。直系头目吴佩孚，是主张“南征”，反对湖南“自治”的。但他当时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军阀，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局势，对他暂时有利，对湘军仍保持往日友好的态度。

鄂督王占元，日事聚敛，祸鄂虐民，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鄂人乃图驱王自治，而苦无兵力。1921年春，公推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孔庚等，乞援于湘。赵恒惕以湖南既倡导“联省自治”于先，与鄂又是唇齿相依，慨允出兵，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派宋鹤庚为总指挥。赵采取先礼后兵，劝王顺应自治潮流，自行引退。王也虚伪地谢赵关怀，许俟辞职获准，当即解甲。

湘军于1921年7月下旬进兵。因赵恒惕曾派郭豪赴洛阳，征求吴佩孚意见，吴没有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以此一再推迟行动，使王占元取得充分时间，调兵布防，湘军在战场上

失去速战速决的有利时机。但湘军士气猛锐，连克要隘。赵恒惕亲赴前线视师督战。从7月29日至8月5日，在羊楼司双方鏖战了8昼夜，战斗异常激烈，北军连败，8月6日退走。王占元终被免职。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肖耀南为湖北督军，统率大军来援。吴8月16日到武汉，忙于调兵遣将，命令前方各军固守，不得向前进攻。

其时湘军士气旺盛，如能乘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住。因此，吴佩孚用缓兵计，授意肖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议和建议。另一战将张福来，也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好。赵下了停止进攻命令，并自动放弃汀泗桥和几个突出据点，以免发生冲突，希望与直系成立和平协定。吴佩孚因此取得喘息时间，从容部署部队，并调海军来威胁湘军后方。

从8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状态。吴佩孚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绪，立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赵得知大惊。8月19日，赵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22日又下达攻击命令。湘直两军展开了汀泗桥的争夺战，尸横遍野，血肉横飞，战斗十分激烈。24日，汀泗桥重入湘军之手。25日，直军反攻，湘军右翼易震东独立旅倒戈（葛豪原为吴的副官，后由吴介绍留任湖南铁道警备司令，该旅由葛的警备部队改编，易震东是葛的表兄）。湘军右翼向通城撤退。吴佩孚又令海军在金口决堤，水淹湘军，于是左翼也难立足。赵26日赶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不准再退。并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才稍得稳定。当时中外报章认为：“中国历年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只打了三天结束，从没有象这次湘直战争，打得这么久而又激烈的。”

8月28日，海军军舰7艘，运载北军4个混成旅，尾随日军舰向岳州上驶，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海军炮轰岳州城，

岳州守城湘军仅两连，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乘轿落荒而走（火车被海军破坏不通）。前线湘军大败，战斗意志瓦解。

赵恒惕自岳州绕道平江，于30日抵长沙。当时长沙很为混乱，湘军官兵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他们早已登黄鹤楼，上晴川阁，何致有今日的一败涂地！

湘军溃败，兵心涣散，军纪也无法维持。如直军追攻，则长沙也难固守。适英国领事愿为湘直双方“调人”，劝赵赴岳州与吴当面进行和谈。9月1日，赵和英领事乘英舰前往，访吴于停泊岳州的军舰上。吴赵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赵终于被迫接受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停战条约九款。

湘鄂战争，充分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了个人权力地位，勇于内战的丑恶面目，湘军空做了一场向外扩张的美梦。

湘军“援鄂”，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3政府路线成功的重要关键。赵恒惕在湘军发动前，派有代表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预计攻下武汉以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3省当局一致同意。只有孙中山反对组织第3政府。湖南代表还到过浙江、陕西、江西进行商洽，皖系卢永祥（浙江）、陈树藩（陕西）也一致表示同意。那个卢永祥早在湘军“援鄂”以前，即6月4日，曾建议召开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取得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会议，赵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敢出面主持。到了湘军驱王占元后，8月11日，赵以为时机已熟，通电全国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

赵恒惕曾幻想吴佩孚同意联治，组织第3政府。但赵的建议与吴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不能相容。赵派遣的代表携带方案前往洛阳，吴竟拒不接见。及至湘军“援鄂”失败以后，因形势大为转变，于是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无人敢召集，也召集

不起来了。

赵恒惕在“援鄂”战争失败后，全力抚辑伤亡，整顿军队。唯苦于饷源短缺，欠饷已不少，而又届临年节，如再不发饷，则前线防军有溃散之虞。此时主要财源为湖南铜元铸造局。一日，据该局局长报告，有中学生黄爱、庞人铨图谋煽动铜元局工人罢工，如政府不予处理，则无法维持。1922年1月17日，赵恒惕下令将黄、庞逮捕，17日凌晨将其惨杀于长沙。黄爱、庞人铨为湖南劳工会领导人，劳工会亦被封闭，激起了湖南各界的愤怒声讨。

当选“民选”省长

湖南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南、湘西三路，推举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11人为省宪起草委员。自1921年3月开始起草，至4月完成。8月下旬，由省宪审查会审查完毕。11月复经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1922年1月1日，湖南省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省宪的实施，分三个步骤：一为成立省议会；二为选举省长；三为改组省政府。8月至9月，谭延闿、赵恒惕两人竞选省长的场面，非常热烈紧张。10月7日，赵恒惕以多数票当选。此后，赵就放弃湖南总司令职务，以“民选”湖南省长，主持军民两政。

湖南公布省宪后，省议会通电立宪自治主张。分别派员向直系交涉交还岳州；向孙中山交涉，请勿假道湖南北伐。赵恒惕也向孙中山解释，湖南并不反对北伐，只因直军近在岳州，长沙非可守之地，如果北伐军假道湖南，恐怕北伐军未到衡阳，而直军已先占长沙。劝请改道江西北伐，湖南对北伐军决

不采取敌对行为。

赵恒惕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和权位，筹制湖南省宪，实行湘省自治，积极以联省自治相号召，并请孙中山勿假道湖南北伐。其实赵氏不过是阳假自治之名，阴行割据之实。

谭 赵 之 战

1923年初，谭延闿到广东后，曾派岳森来湘，劝赵恒惕出兵帮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赵与陈因同属“联省自治派”，不愿接受这个意见。赵指使省议会借口湘省自治，对于省外战争，严守中立。

谭延闿3月6日，在广东就任内政部长。6月1日谭致湘军将领一电，闻赵恒惕请求吴佩孚援助，准备派兵消灭蔡锷猷、陈渠珍，深望打消此举。“否则吊民伐罪，海内岂无健者？”13日赵恒惕回答一电，竭力解释：“断不至丧心病狂，引外兵以糜烂桑梓。”这两个电报，一见而知是谭赵破裂的先声。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如唐生智、贺耀组等是，旧派如吴剑学、鲁涤平、蔡锷猷、谢国光等是。湘西镇守使蔡锷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均为谭的旧部，是附谭的。

1923年7月，孙中山发表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8月谭延闿到衡阳就职，并发布命令，升任宋鹤庚（原第1师师长）、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为第1、第2、第3、第4军军长。其时谢国光、吴剑学公开接受谭的任命，宋鹤庚、鲁涤平保持中立（宋在8月下旬，经长沙赴汉口，鲁最后附谭）。

赵恒惕藉口谭延闿破坏省宪，自任护宪军总指挥讨谭。8月中旬，谭赵两军在株洲、醴陵一带相持。8月22日战争开始。赵派叶开鑫旅进占湘潭。26日攻占衡山。31日，赵军蒋钺欧团攻下衡阳。谭延闿、谢国光退往耒阳。

这次作战，赵军贺耀组、唐生智两旅，正在湘西，长沙兵力薄弱。叶旅朱耀华团，受其舅父张辉瓒（谭派下台军人）的策动，先由湘潭开往湘乡，加入中立军。9月1日，突然取道宁乡，袭取长沙。赵恒惕无兵抵御，退走醴陵。方鼎英以代理第1军军长名义进驻长沙（谭委宋鹤庚为第1军军长，宋未就职，方是穴的参谋长），一再电请鲁涤平来长沙主持。鲁因赵并未战败，不肯放弃中立。

当谭军袭取长沙时，赵部贺旅由安化、益阳，唐旅由桃源、常德驰往湘阴集合，反攻长沙。9月6日，叶旅也由衡阳经醴陵，开往长沙。9月7日，谭延闿、谢国光由耒阳回到衡阳。13日，赵军三个旅会师长沙，方鼎英、朱耀华渡江向宁乡退却。

赵军虽夺回了长沙，但谭军谢国光部乘虚占领醴陵，附谭的蔡鉅猷部也抵达湘江西岸，长沙陷于东西夹攻中。从9月17日起，赵军叶旅与谭军谢部，在株洲进行激战，赵军终于夺回了株洲、醴陵。赵恒惕于23日回到了长沙。

时鲁涤平一再建议双方停战，以湘潭姜畲为议和地点。鲁有戴岳、袁植等三个团的兵力，在战争中立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谭、赵双方被迫接受建议。互派代表于9月22日至10月13日商谈，双方条件距离很远，无法谈好。

10月18日，赵军强渡渌江，进攻谭军谢、方两部，这是双方又一次主力战，战斗非常激烈。以后谭军渐渐失势。同时，广州因陈炯明叛变，形势危急，孙中山电令谭延闿率部兼程赴粤解危。因此，谭军急速退走。11月3日以后数天之内，赵军

先后占领湘潭、湘乡、衡阳，13日占领郴州。谭赵之战，告一段落。

谭军退出湖南后，吴佩孚一再催促赵恒惕乘胜追击入粤，并取消自治，答应赵可取得湖南省长、督理湖南军务、两湖巡阅副使兼援粤总司令等要职。同时可得到军火和军饷的充分接济。赵恒惕因这些与他“联省自治”、“阻南拒北”的一贯政策不合，故仍婉词拒绝。

谭赵之战结束后，赵将湘军改编为四个师：第1师师长贺耀组，第2师师长刘钊，第3师师长叶开鑫，第4师师长唐生智。

1923年11月，赵恒惕指使赵桂芬、赵恒愚摧毁了他的家乡湖南第一个农会组织——岳北农工会。

赵恒惕主湘时，在“援鄂”战争之前，鄂督王占元，曾劝赵接受北廷任命，谓有何要求，当为代请，担保能达到目的。赵深恶其愚昧，不予理睬。以后1925年，吴佩孚曾以现款二百万银元、步枪五万支诱赵，劝受北廷任命，赵亦严词拒绝。

赵恒惕曾认为他在湖南省长任内，未发一张纸币，未借外债，也未加赋税，更未如其他省份的预征田赋。遵守省宪规定，顾念民力，兢兢自持。对于地方建设，虽自愧未能多所建树，但在军费浩繁，极力撙节之余，仍设立湘中、湘西、湘南三公路筹建会，规定按期修筑公路。并建立湖南大学，完成湖南纺织厂，拓宽省城街道，资助湘雅医学院，开办几所学校，这些都是事实。

辞 职 下 台

前面说过，湖南政局为南北问题的重要关键。由于赵恒惕在湖南“立宪自治”、“阻南拒北”，多年以来，一直是广州国

民政府出师北伐的重大阻力。1926年春，国民政府先后荡平了广东内部反革命军阀势力，安定了两广全局，并成立国民革命军七个军。此时，北方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军阀，已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联合出击，企图进一步对南方革命势力发动全面进攻。广州国民政府认定必须先发制人，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而湖南内部正起变化，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湖南内部军政、财政，从未统一，湘西、湖南，省政府无权过问。赵恒惕为改变这一形势，准备大举裁兵理财。这样引起了赵与湘军将领间的深刻矛盾。随后第2师第3旅旅长叶琪，以回桂省亲为名，秘密参加了梧州会议，会后又随蒋介石到了广州。他此行是代表唐生智与广州进行联系的（叶是唐的保定同学）。这消息一经透露，长沙满城风雨，传说湖南政局将大有变动。

1926年春，风闻唐生智军已从郴、永一带调回衡阳，并在衡山设立防线。唐父唐承绪（实业司司长）举家回东安原籍，第四师驻省人员也都撤走。因此，赵乃先后派张雄舆、贺耀组、钟才宏到衡阳，向唐生智表示他绝无竞选下届省长之意。不久，叶琪来到长沙，向赵建议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司长。（根据“湖南省宪法”规定，省长任期未满，而因故离职时，得委省务院长代行职权，而省务院长由省务员兼任，内务司长为首席省务员。）这样，赵恒惕陷于绝境，只有在提前下台或发动战争两个办法中，选择其一。

当时赵恒惕认为，省长任期将满，改选在即，且闻广东正在准备北伐，湖南人民积极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再想割据湖南，已不可能。且革命巨大威力，更势不可挡。因此，乃在3月8日，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代行省长职权，派张雄舆携带任命状到衡阳，迎接唐生智来省就职，并于

3月12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和推荐唐生智代理省长的咨文，即于是日离湘经汉赴沪。

赵离湘后，叶开鑫、贺耀组、刘 钊等，都有电报表示拥唐。唐于3月16日到长沙，并不宣布就职，仍倡言迎赵回湘复职，并电邀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湘局问题。25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才接任代理湖南省长。

5月2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7月上旬，两广北伐军到达湖南。从此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即将到来。

在省议会期间

赵恒惕隐居上海11年，闭门学佛诵经。至1937年4月，因中日关系紧张，赵由上海遄返湖南，参加抗日活动。7月，抗战爆发，赵曾以长函致蒋介石，建议长期抗战。

1937年11月，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奉命成立湖南省军事参议会，由省政府聘请赵恒惕任议长，仇鳌任副议长。对湖南军政设施，曾有所献替。

1939年8月，湖南省临时参议会成立，赵恒惕为议长，副议长先为陈润霖，后为陈嘉会。赵主持的省参议会，对于发挥地方自卫力量，安定地方秩序，协助政府抗战御敌，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做好全省各方面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4年，日军大举南进，湖南形势紧张。当湖南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将由耒阳迁往蓝山以前，日本人以汪精卫伪政权号召力不大，想利用赵恒惕在武汉另组伪政府。密遣在上海开设酒家的赵某潜来湖南，探求赵恒惕意见。恒惕闻之大怒，斥其无耻，要捆送政府严办。赵某哀求得免，乃潜由广西经越南返沪。

1946年，湖南省临时参议会改组为正式参议会。各县、市普选参议员，再由参议员选举议长，赵恒惕以多数票当选。此时抗战名为胜利，实则满目疮痍，对于善后工作、复员建设，在赵主持下的省参议会尚能有所建议。

1946年，赵恒惕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初冬，蒋介石召开全国粮政会议，电召湖南省主席程潜、赵恒惕赴南京参加。赵抵宁后，即患尿闭症甚剧，就医于中央医院。

1948年11月，赵恒惕赴台湾疗养，程潜与省参议会，均屡电促其返湘，但赵知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坚请辞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职务。

1952年，赵恒惕在台湾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赵在台湾20多年，居常焚香诵经，研究佛理，过着居士生活，直至逝世。

回 忆 贺 耀 组

周 干 贞*

关于贺耀组（贵严）先生的生平事迹，我曾写过《贺耀组传略》一文，当时因仓卒，还不够全面。后来我读到好几位同志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贺耀组的文章，文中还就耀组的夫人倪斐君怎样影响他在思想上发生的巨大转变等方面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那些文章材料较为翔实，但其中稍有出入之处。我在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初，在重庆和上海的贺耀组家里，过了4年“寓公”生活，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得多。贺耀组卸去重庆市长之后，移居在上海，以经营商业为名，行策反起义之实。是时不离左右的，只我一人，因而我的思想受耀组的夫人倪斐君的影响很深。特将记忆所及作如下补充。

贺耀组1889年5月生于宁乡贺石桥附近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贺穆生是秀才出身，授徒乡里。耀组幼时丧母，由大姊抚养，随父就读旧书五六年，14岁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后入陆军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九期毕业生。回国后，在湘军中当见习，后任过团长，参加过护法讨袁诸役，屡立战功，后隶赵恒惕部，升至湘军第一师师长，师部驻益阳。当时，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朱世民和谷正伦分别任该师副师长和参谋长（后来谷正伦当过宪兵司令、省主席），

*周干贞，宁乡人，于抗战后期至解放初，在贺耀组家生活了4年。

毛炳文、龚宪、陶峙岳、李益滋分任团、营长。汤恩伯也当过该师见习官，贺耀组很器重他，终为陈仪以同乡关系调走。贺又保荐胞兄贺艾年为益阳县长，以充实自己力量，并成立湘军第一师“资宁军官讲习所”，以培植干部，其中有的出任过营、团长和师长。贺耀组对部下态度诚恳，重感情，量材使用，鼓励提拔，使之向上；老弱无特长的，都妥为安置；有困难的则随时接济。所以部属和学生都很拥护他，乐为其用。赵恒惕督湘末期，共有四个师，除贺耀组任一师师长外，刘钊、叶开鑫、唐生智分别任二、三、四师长，实力雄厚。赵恒惕对叶开鑫较为亲信，还派他当湘西禁烟督办，这是一个弄钱的肥差事，后来他成了巨富；刘钊在二师建树少，不久落职；唐生智富于才干，又具有雄心远略，博得赵恒惕的青睐，军需弹械，优先供应，还委他的父亲唐承绪为财政司长，藉以拉拢他。迨至广东北伐军兴，湖南首当其冲，大军压境，逼得赵恒惕仓皇逃走。1926年，唐生智接受国民革命军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他率所部打垮了叶开鑫的第三师，乘胜前进，直捣武汉、下江南。当时，贺耀组的第一师退驻湘西，经国民革命军总部派谢觉哉、胡耀（良翰）两人以同乡和旧谊关系，说服贺耀组接受改编部队，调出湖南，追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贺旋由鄂赣进军京、沪，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深为蒋介石倚重。

1928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济南，贺耀组率四十军给日军以猛烈还击，初得胜利。后因日本增兵，演成“五三”惨案，日军死亡固多，我军亦损失惨重，师长龚宪阵亡，我外交官蔡公时亦被惨杀，震惊中外。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委曲求和，日本以“惩办肇事首脑”为和谈前提，蒋介石遂将贺耀组撤职以求媚于日人，接受日方提出的极苛刻的辱国条件，派方鼎英接充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被夺去了兵权。他经过这次

屈辱，痛愤万分。离职的那天，住在济南的一所旅社里，化名叫“胡不归”，纵酒漫骂。事隔数十年后，贺耀组谈及此事，犹有余愤。现在济南岱庙内，“五三”惨案纪念碑还存在，碑文记载了贺耀组英勇抗日的事迹。

贺耀组为什么在以后一段很长时间得到蒋介石信任呢？这是一个为许多人难于理解的问题。

我过去和周震麟（道腴）先生闲谈，他说：“蒋介石有‘三大法宝’，即‘黄、陆、浙一’，所谓一者，你如果是黄埔军校学生，陆军大学生，或者是浙江同乡人，三者有一，他就最相信而且重用。”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贺耀组生长湖南，出身日本士官学校，“黄、陆、浙”无一有他的份。他之所以一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主要是他赋性忠诚老实，端正庄严，又能好学深思，力求进步，对于社会科学亦能精探其要，抱着一种虚心态度，深藏而不露，从不夸夸其谈，凡是与他相处日久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当国民党宁汉分裂以后，蒋介石曾一度下野去日本，其后由日回国和宋美龄结婚，重登政治舞台。那时他的所谓嫡系部队，都已调动驻地，南京周围时有骚扰，贺耀组手握重兵，又兼京沪卫戍司令，声势煊赫，蒋介石常到贺耀组的司令部歇宿，藉资保护。1929年元旦，蒋介石偕宋美龄清晨到南京市成贤街贺耀组家拜年，以示对他亲热和器重。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贺耀组任国府参军长，吴鼎昌任国府文官长，俨然是“左臣右相”。军事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兼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负实际责任的是参谋次长贺耀组。这个重要职务，发展了他的抱负，有“智囊”之称，时蒋介石对贺，真是言听计从。贺耀组因此开始注重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向蒋介石建议，成立边务研究所，培训边务人才，分派边疆地区工作。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内蒙古野心，他建议迎接成吉思汗灵柩南移，以边务学

生庸井然为护灵专使，道经之处，受到隆重礼遇。同时他又建议充实蒙藏委员会组织，加强少数民族的团结。这些措施都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后来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蒋介石派贺耀组为驻土耳其公使。这是一个新的任命，有外交家何凤山、卜道其、李铁铮等分任使馆武官、参赞等职，阵容一新，有所建树，中土两国感情日趋融洽。以百战将军而持万里使节，折冲尊俎之间，始终应付裕如，在腐朽的国民党执政时代，如此人才，实难多得。贺耀组卸任土耳其公使后，接任甘肃省主席，兼天水行辕主任。中共中央以谢觉哉与贺耀组有同乡旧谊，派他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当时，表面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其实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兰州和延安接壤，情况特殊复杂，有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军政部门关押，或发生其他事故。经过谢觉哉和贺耀组从中斡旋，两党间的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贺耀组亲自观看解放区一切新兴气象，自然钦服，因而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着初步了解，思想上渐渐地发生变化。记得一件有趣的故事：贺耀组当上甘肃省主席后，他的一些旧部和学生闻讯，纷纷来到兰州见他，要求给以工作。贺耀组安顿他们的住宿和餐厅席次，并发给零用钱，当面安慰他们静候机会分派工作，万一不能久等，可资送回家云云。甘肃地处边陲，地瘦人贫，除选拔堪任行政业务的少数人外，对其余那些曾在部队当下级干部、文化低、没有其它技能者，难于使用。久而久之，这些人不耐烦了，于是一再联合向贺耀组请愿。贺耀组最后出来委婉地向他们说：“你们跟我很久了，我当然关心你们。不过，你们过去都是干军事工作的，对于行政工作缺少经验。甘肃地方又是地瘦人贫，行政机构少，一时很难替你们作出安排，希望你们既来之则安之，再等一个时候，莫过于急躁。”话刚说完，一位姓邱的旧部站起

来，代表请愿人员说：“主席本是军官学堂出身，是学军事的，我们不是不知道。主席在济南交卸兵权后，当过土耳其的大使，也未在‘大使学校’毕业，现在你又当上了甘肃省主席，也并没有在什么‘主席学校’毕业。我们都是你老人家举办的‘资宁军官讲习所’毕业的，为什么偏偏不能干行政工作呢？对不起，老长官、老所长，请替我们想一想。”这些话颇不礼貌，贺耀组无词以对，悻悻然回到公馆去了，但他并不计较。其后分别作出妥善处理，对其中的老、弱、病、残者给以路费、安家费，派专车送回湖南，其宽怀厚道，确是如此。

朱绍良（浙江人）接任贺耀组甘肃省主席职，一反贺耀组之所为，他极端反共，极为蒋介石所信任。因此，对八路军事事刁难，做了很多危害人民的事。朱后来被调充战区司令长官。贺耀组离开甘肃后，蒋介石对他仍是器重，先后当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等要职，不离蒋介石左右，秉承蒋介石意旨，处理各战区的作战事宜，各项主要文电及签具意见多经他核办，还要随时准备应接召唤。这些日常工作非常繁重，虽是“近水楼台”，又可“伴云得雨”，却很不自在，难于发抒抱负。其间，耀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派往苏联接洽有关协同抗日的重要问题，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取得了协议。蒋介石为着战时需要，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庞大机构，派贺耀组为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以各院部的首长任委员，又网罗一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到该“会议”任职，声势浩大，聚会特多，蒋介石常来训话，贺耀组虽能胜任，但时感棘手。随着机构改革，1942年12月，贺耀组核调任为重庆市长。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是特别市，与各省政府、各部平行，又兼任防空司令，范围超越了市的原定区域并附设了许多机构。而中央机关集中在此，且各国使馆林立，非有相当才干和威望的人，不能膺此重任。贺耀组一生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已

如上述，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重庆市长是他最后的职务，也干过三年。陪都重庆，首府潭潭，中外观瞻所属，耀组德才兼备，声望弥高，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应付着非常局面，取得了大的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他在重庆市长任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很知道他的一片苦心。

他和蒋介石的关系，由亲信而渐渐疏远，以至意见分歧，直到打入“冷宫”，终于决裂。我可大胆地断定，他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转变，是和他爱人倪斐君的影响分不开的。

倪斐君，浙江镇海县人，1932年在南京康济医院任护士长时和贺耀组结婚，随耀组出使土耳其，游历欧亚许多国家。后在甘肃结识了谢觉哉，倾听过谢的革命理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担任甘肃省抗战后援会主席，创办妇女月刊。在贺耀组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期间，倪斐君以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参加重庆市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她结识了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冯玉祥、陶行知等。任重庆市难民服务团团团长时，协助宋庆龄从事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并与陶行知创办国际难童学校。抗战胜利后，她和贺耀组迁往上海施高塔二九〇号定居。其间除料理家务外，还要安顿六个儿女，迎养老母，并考入东南医学院，作为四年级插班生完成了她的学业。倪的性格豪爽，坚毅好学，作风特别朴素，经常着一件兰布长衫，跋涉不坐汽车，不施脂粉，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她的交游广，朋友多，平时又敢于说人家所不敢说的话，遂为蒋介石所忌，因此问题也就发生了。倪斐君担任过这样多工作，每每遇到窒碍难行或经费支绌时，辄经过贺耀组设法解决。如“中外文化联络社”申请注册，是由她转请贺耀组批准的；夏衍等组织的“中国业余剧社”申请免收娱乐税，也是由她经贺耀组批准的。凡是倪斐君的革命朋友来她家里，或者掩护驻留的，贺耀组都热情款

待。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廖承志等也常来贺耀组家里。他家爱客，来往朋友多，后虽落职闲居，宾客仍络绎不绝。我在贺耀组家里（上海施高塔路范庄）居住既久，深知贺耀组、倪斐君夫妇为人，他们的来宾，我都见过，并与之同餐席，以我区区布衣参措其间，我的思想转变，固为党的统战政策所感召，但也和他们夫妇的政治影响是分不开的。

1945年12月30日，贺耀组辞去重庆市长职，马上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辞职报告是我代写的。那天，贺耀组很诚恳地和我商量同时摆脱国民党反动政府，我即毅然写上书面报告辞卸重庆市政府荐任三级专员职，将行李打点，移住他的家里作客。1946年3月，贺耀组同倪斐君由重庆至上海安排迁居事宜，我就在重庆市聚兴村七号程潜家里作客，住了一个多月。应贺耀组电邀，乘轮船启程到达上海贺家。当时，我作《满江红》词一阙（词附后）以纪其事。

上海施高塔路二九〇号贺家，是一所三层的大房子，余坪占地三分之二强，树林蓊蓊，宅舍华美，设备齐全，是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接收日本人的财产，并以之转赠贺耀组的。因贺曾经在益阳当湘军一师师长时，汤当过见习官，感知遇之恩，故将这座大房子表示酬报。房子大，住人少，倪斐君到医学院上学，朝去暮回，六个小孩入小学或托儿所，岳母倪老夫人和几个佣人料理家务，我和贺老对影闲谈，清冷已极，时有客来，则觥筹交错，相与畅论古今，酒酣耳热，意气洒然。我也利用这个清闲机会，抓紧学习，看了不少书，对于古典文学的研摩，颇有心得。自学之余，为贺耀组办理的私人文件，每天也不少。那时寓居上海的大官僚多，其中有的思想进步，如章士钊、邵毓麟、雷霆、方鼎英、张维、徐逸樵、罗贡华、李铁铮等。这些人往来贺宅，往往谈至深夜。贺耀组于1946年下期提倡兴办实业，集股开设“太乙公司”，计划很大，结果虎头蛇

尾，待到股款收齐，法币贬值，由大化小，仅能安置数人。继而筹组《亚东协会》办文化事业，又以不景气告终。

上列两个组织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掩护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发生关系，利用国民党政权恶化、腐化益趋激烈之际，专心致志地从事反蒋起义活动。贺耀组、程潜、唐生智、章士钊、刘斐等，早有相机起义的密约，他们都在上海、南京两地的湖南同乡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两地同乡会又信息相通，行动一致。蒋介石对湖南人一贯轻视，疑虑重重，随着局势急剧变化，两个同乡会酝酿着强烈的反蒋之声势，于是两地同乡会中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省参议等，起而和之，汇成一股反蒋怒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抑。在那紧急关头，国民党中委在上海的负责人如谷正纲、陈果夫、汤恩伯等，对进步人士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暗杀、逮捕，环境愈加恶化，几至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贺耀组和何应钦的私交很深，他俩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同学，何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时间较久，贺常与他往来。记得1947年初夏，何应钦在上海医院养病，贺耀组偕我一起去看他，何与贺絮絮而谈。何说：“我乐得在这里久住一下，少些麻烦，我在部里，老蒋（指蒋介石）大小事情都要我负责，连伤兵闹事也找到我头上来。反过来，又什么事都不能作主，调派部里一个小小职员，也要经过他批准，否则就要挨官腔，比做小媳妇差不多……”。言下不胜愤慨，以此可知蒋介石的“独裁”特性了。倪斐君曾向我说过，何应钦亲自劝她加入国民党的事。倪说：“我在重庆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及一些社会活动，干得很起劲，不怕任何艰难。因此，国民党大官员怀疑我一定被共产党利用，吸收为共产党员了。有一天，何应钦特地找我谈话，他自以为一片好意，把旁人怀疑我的话详细告诉我，并且说：‘人言可畏！我是贵严的

战友，我为你担忧，劝你加入国民党，将来当上中央委员也无问题。”我听了骇然不乐，马上很坚决而爽直地作出回答：

“首先请你放心，我不是共产党，我如果要加入共产党，必须先与贵严离婚，我现在干的工作是抗日救亡，自己应该平民化，不怕任何艰险，份所应为。你劝我加入国民党，我对国民党党章、党纲、三民主义，没有认识，当然就谈不上信仰。既无信仰又怎能盲目申请入党呢？据你说，我若入了党，可被选为中央委员。唉！贵党的中央委员，好容易这样到手吗？我看一些老国民党员辛苦一辈子而今齿豁头童，连吃饭也成问题，还谈到能当上党官吗？那么，对这些你又怎样理解？”

当国共和谈时期，邵力子、张治中常来上海贺耀组家，共同研究有关和谈条件和怎样应付现实、作出急剧转变、弃暗投明的问题，每谈至夜分，秘而不宣。章士钊、李宗澧、李俊龙也来过多次。唐生智自湖南东安应蒋介石邀请来到南京时，也常来沪和贺耀组密谈如何应变。有一次贺耀组邀请唐生智、程潜、章士钊、刘斐、余范传到他家宴集，一叙离情，实在为着时局紧张，共商如何应变，迎接解放的问题。还记得东北将领何柱国（时任某集团军司令，眼睛戴墨镜）、傅作义、刘斐三人来访贺耀组。席间，何柱国发议论，谈蒋介石迫于日暮途穷时请客，以共谋挽救危局，惜已太晚，于是他们三人对时局如何行动，也取得了默契。1949年春初，李宗仁代总统时，决定如派于右任、贺耀组、居正三人为国共和谈代表。贺耀组得到这个消息，匆忙中要倪斐君和我急速准备一同去北平，约定在南京等候。我当时的心情是庆幸马上可以脱离羁绊，走上新生，不料蒋介石名为下野，仍然蹲在杭州，遥控一切，拒绝了李宗仁所提意见，并扬言贺耀组政治上不可靠，北行竟成了泡影。

早在1945年9月，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有一次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到贺耀组家拜访，贺即回拜，并报经蒋介石批准，定

期在他家里欢宴毛主席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一行，并邀请吴铁城、孙科、于右任、张治中、左舜生、曾琦、莫德惠等作陪。贺耀组为避嫌疑，不要倪斐君出面参加宴会，贺的旧属和市政府官员无一人参加。我于室外听到他们谈笑风生，绝未谈及国事。由此证明，贺耀组在蒋介石面前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而倪斐君之政治面貌见疑于人，并非偶然的事了。

关于1949年4月22日晚上，贺耀组偕我将重要文件、证件和历次所授勋章、奖状并我的任职证件清查出来，一同烧毁，24日同坐飞机由上海到广州，转赴长沙，在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解放的详细经过，我在所作《贺耀组传略》一文中，已记载清楚，兹不赘述。不过事过境迁，恐人健忘，应该郑重说明的是贺耀组偕我由上海回到湖南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及其是贺耀组和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为起义迎解开过密会，定过谋划，起过特别大的作用。在白崇禧、李品仙等来长沙之前，原定的计划是派贺耀组偕我去香港和旅港的黄绍竑、龙云、杨杰、胡庶华高级民主人士等联络，扩大反蒋起义影响，程潜拿出银币200元交给贺耀组，已经送行李过磅，买好飞机票定期启行。适白崇禧等率部来长沙，对程、唐、贺等施加压力，逼得我们改变计划，退了去香港的飞机票。贺耀组遂化装成商人，秘密循粤汉路赴港，我由程潜发给省政府专员聘书一纸，回原籍宁乡灰汤待命。贺耀组在香港通电起义，和我常以书信往还，加深联络。迄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我已参加革命，任湖南省供销合作社干部。

贺耀组已于1961年病逝，倪斐君于1975年迫害致死。往事萦回，旧情难却，我对于他们的相继作古，深为悼惜。

略记先父何际元

何 衡 生*

先父何际元，又名印三，1908年2月18日出生于宁乡县流沙河区果蠡乡（现为草冲乡）莲花村花萼山庄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11月16日死于长沙，终年42岁。先父在短短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渡过的，曾任少将，后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成为起义将领。

先父出生时，家贫穷。祖遗少数田产，至我祖父时均已典当还债，靠租何云阁、何仕鹤之田维持一家生计。祖父何萼先，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担任了本县同文镇农民协会副会长，“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迫害，幽居病死，堂伯父何力前惨遭杀害。自此家庭日困，迄至1945年前后，才陆续将欠账还清，并购买了田土。1948年前后，才分别在老家和长沙建造了新房。故在数十年内，家甚贫穷。

先父自幼天资敏慧好学，小时入私塾就读，深受塾师喜爱，塾师劝我祖父母说送印三多读几年书。“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宁乡籍的留日学生和师范学堂毕业生回到宁乡兴办新学。

*何衡生，又名何志辉，系何际元长子，曾在新疆工作，后回湖南。

离流沙河不远的云山学校是进步人士王凌波等人所主办。他们废除旧式教育，传播新思想，教授新知识。1921年，先父考进这所学校，受到了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熏陶。

1924年，先父从云山高小第21班毕业后，考进了设在宁乡县城的宁乡甲种师范学校第4班。“宁乡甲师”是宁乡当时最高学府，也是宁乡的革命摇篮。教师中的谢觉哉、梅冶成、陈章甫、许抱凡等，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讲坛上宣传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也宣传劳工神圣与国民革命。中共宁乡第一个支部、共青团第一个支部及国共合作的第一个国民党支部，都是1925年在这所学校开始建立的。学生自治会会长胡辉是“甲师”第一个入党的学生，他和先父是小同乡，常邀其到“甲师书刊贩卖部”和“宁乡文化书社”阅读进步书刊，故先父的思想日益进步。

1925年冬，先父从“宁乡甲师”毕业后，经谢觉哉、何叔衡介绍，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此时他年仅17岁。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正积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故他在军校学习期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报国为民。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清党”时，因我叔父何萼先、堂伯父何力前搞过农民运动，加之我大姑母何桂南、二姑母何政文均系共产党员（后脱党），故先父被遭嫌而受到拘禁审查，后查无关联，才允许在黄埔军校毕业。

1927年9月，先父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即在国民革命军第22师见习，后任排长、连长。一直到1932年离开22师，到南京高等教育班，受德国军事训练3个月。1933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组织）。起初在武汉禁烟督察处当科员，至1937年任粤汉铁路防空护路大队队长。1939年到福建刘建绪部第十集团军当高参。不久到重庆中

央训练团办的党政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调湘鄂赣边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充教官。1940年任忠义救国军指挥部参谋长及团长。1941年7月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调查室少将主任。1942年6月起，调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正义军）工作。开始任别动军益阳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同年10月任别动军第四纵队少将指挥。1943春，先父率四纵队驻防滨湖一带。常德会战后，于1943年底从津市开赴南岳。1944年春，在南岳枫木桥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先父任特训班总队长。1944年5月，特训班结业，四纵队全部换上了美式武器。1944年6月，四纵队司令部驻防宁乡，3个支队分布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活动（四纵队的详细情况见《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张季任撰《何际元与别动军第四纵队》）。

自1942年至1945年之间，正是日寇连续进攻湖南之际，先父表现出高度的爱国卫乡之精神。他说：“湖南的一寸土，即国家民族的一寸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我乃一中国军人，不独要尽匹夫之责，还要尽军人之职。寸土必争，寸土必守，耿耿此心，尽其报国守土之职责。有我多一日之驻守，即使日寇迟一日之攻陷。”先父率部与日寇英勇战斗，据他自己回忆：“三年之久，大小千余战役，除毙伤口寇不计外，生俘日寇亦有一千二百二十余名，计解送重庆二百余名，解交六、九两战区及四方面军共九百余名。”

先父积极抗日，确有较大贡献。曾获“杜鲁门”、“胜利”、“云麾”、“忠勋”、“干城”、“光华”等6枚勋章。同时，他又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暗中支持他们的活动。1944年，他与同乡同学、地下党员汤翔中合作，在宁乡草冲创办了宗一复兴联合中学，其校舍和经费皆由先父提供。何际元任学校董事长，汤翔中任校长，还聘请了地下党员王野渔、周太暄等到校任教，并成了地下党活动的据点。1945年6月，王震等率部

南下抗日，途经长沙、宁乡、湘潭等地，这一带正是四纵队的活动范围。先父经汤菊中劝说，欣然同意为之让路，当即命令所部撤退50华里，使王震部顺利通过。并在某些方面予以配合，共同打击日寇。正如先父所说：“我率部驻守长沙等县时，曾与新四军所属王震将军部，时取联络，并肩对日作战，均有事实可查。”四纵队虽属军统系统，但部队里容有共产党员任职。先父还果敢地释放了即将被杀的彭立人、李振康、汤绍铭等6名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先父多处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遭到国民党军统的猜忌。有人将以上事实告之戴笠，戴笠曾气急败坏地要杀先父，赖别动军司令周伟龙与先父交谊甚深，从中极力周全，1946年3月戴笠摔死，遂得以脱险。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父即脱离了军统。

二

1946年8月，先父任国防部二厅少将专员。9月，任交警总局十三总队少将总队长。1947年6月，在东北任交警总队改编的新六军169师（军统外围组织）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

1948年2月，调任非嫡系部队79军47师少将师长，驻扎辽宁铁岭。此时，东北局势严重，蒋介石调集4个兵团共14个军44个师的兵力，布置在锦州、沈阳、长春一线，企图一举歼灭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先父此时对前途很不乐观，觉得内战不应该打。眼见解放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很强，如与解放军决战，前途不堪设想。1948年5月，他的嫖娼写信到铁岭，要求到他部下谋事。他亲笔回信说：“部队不能来，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年轻人要学文化、学本领，以后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他不仅拒绝亲属去东北，而且自己作好了脱离东北的准备。

1948年7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文告，他读后深受启

发，看清了前途，准备南归，“策划响应解放”。不久，经多方活动，假借母病请假回家省亲，从沈阳乘飞机到南京，脱离了东北，并向军事委员会辞去了79师师长之职。南京则以71军副军长兼88师师长或新七军军长等职由他挑选。此时他已心灰意懒，不愿再替蒋家王朝卖命，拒未接受。他征得贺耀组之同意，为策划交警南调，响应和谈，即应交警总局总局长周伟龙之邀约，暂去苏州办员警干部训练班，就在7月内到职，任训练班副主任。

在东北期间，他除参加了一次四平街外围作战外，再没有与解放军打过仗。1948年10月，他又请假从苏州回宁乡老家省亲。因他离开79师以后，师长之职由49军副军长陈宏兼任，9月辽沈战役开始，防守锦州的范汉杰所部8个师10余万人全部被歼，陈宏的79师从沈阳驰援，结果全师覆灭。先父在老家得知这一消息，庆幸自己逃脱了厄运，恰逢新居落成，自己又满40周岁，于是大摆酒席，广宴宾客，大肆庆祝了一番。这次在老家住了一个月才赴苏州，是年底员警训练班结束，便回到了长沙。长沙绥靖公署以湖南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或粤汉铁路护路司令职征求他的意见，同时湘鄂川边绥靖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亦以军长之职引诱，他都毅然拒绝。此时他一心策划起义，投向人民。

先父于1948年冬回湘后，相继在宁乡老家和长沙新宅住了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与地下党员汤炳中往来密切。不久，通过汤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取得了联系。自此，先父在地下党领导下，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的。他“积极活动，各方策划，纠集同志，集议举议”。如暗中支持姜亚勋及张先正之起义，策反88师及湘、赣、粤交警部队，支持唐生智、仇鳌、席楚霖等湘省自救反白（崇禧）运动等。先父在抗战期间，储存很多美式武器在长沙西长街建华米厂，抗战胜利后没有上交。

米厂经理文武原是四纵队军需，发了财办了米厂，原由文武管理的武器一直由他保管在米厂。这些武器不仅武装了宁乡刘汉臣部，而且在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1948年11月，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周伟龙令毛羽芳（交警九总队三大队上校大队长）率领1个大队的干部和1个大队的武器、装备到长沙接替交警总局驻长沙招募处处长劳建白的职务，开展招兵工作。1949年2月，毛羽芳的招募处已在衡阳、醴陵、汉寿、华容等地招募了新兵1500余名。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处长尚望多次电促毛羽芳将兵员集中待命，欲调往广州补充交警十四总队。这时，恰巧交警第九总队少将总队长喻勋衡被撤职回到长沙。喻是毛羽芳的老上司，友谊较深，先父通过喻勋衡做好了毛羽芳的工作，表示愿随先父一道起义。

毛羽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先正。张先正与毛是华容同乡，又是黄埔同学，关系密切。张先正说，他也与汤弼中、何际元取得了联系。张先正当时任交警教导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驻衡阳茶市。1949年3月，张先正向程潜建议，把湖南的交通警察部队改编为湖南保安队。程潜采纳了张的意见，并委任张先正为湖南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下辖3个团。这时，张获悉醴陵火车站停有交警总局装载美械军火的列车即将外运，张取得地下党的同意，率部阻截军火列车，而被捕入狱。国民党国防部以张是军事要犯，向程潜发来电报，要将张提去法办。程潜借口张的问题严重复杂，要把内幕查清再作处理，以此搪塞。

汤弼中与先父等共同努力，还策动了驻在湘潭中路铺边界的谭衡自卫支队长陶凯、驻在长宁县界的警察局长陈兴苗。大家枕戈以待。起义之前必须把能集中的部队集中起来。先父要毛羽芳将各处招募的兵员在二三天内开至长沙集中待命。两天后，衡阳、醴陵、汉寿三处所招兵员已开到长沙，驻扎在松桂园，唯有华容招募队员未到。于是先父令毛羽芳连夜赶赴华容探

察，方悉国民党宋希濂部232师和华容县长余子述为吃掉、收编这支装备有美式武器的300余人的小部队，已饬令招募支队长毛维凤不得开往长沙，不准向上级请示，要接受他们的指挥，并以武力相威胁。在此情况下，毛羽芳当机立断，雇用民船10余艘，深夜将该部偷偷撤走。逃脱232师控制范围后，于晚上在岳阳江畔登岸，改乘火车奔回长沙待命。

三

原订阴历4月20日起义，但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即先父之胞弟（我叔父）何一平，惨遭国民党314师杀害。何一平（又名笃祐）在宁乡办了一个警察集训大队，全是美式装备，武器精良，共有300余人，是先父起义的基本骨干队伍，内定为起义部队的直属支队。不料军机不密，被驻宁乡的314师获悉，将何一平部全部缴械，并于阴历4月13日将何一平、何盛元（先父之亲侄，任何一平部军械员）杀害于宁乡县城。随而密派48人由宁乡赶赴长沙捕杀先父，并将我家洗掠一空。白崇禧还发出通缉令，捉拿先父。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先父与汤菊中等商量，决定提前起义。

汤菊中经请示省工委同意，决定将集中于长沙市区的交警招募队兵员，渡过湘江，开往河西宁乡，争取早日起义。可是，当时大小船只均被省水上保安总队控制，凡属部队过江必须持有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否则不准通行。先父等即派上尉副官钱文杰持交警总局公牒与湘江航运公司接洽，以运送大批军用物资去衡阳为由，请调派运输轮一艘。答复说：“有船无油，无法启航。”于是另向汽车运输公司购得柴油一桶，商请航运公司将运输轮开到猴子石码头。通过领航员的协助，偷偷将所部全部转移到了长沙河西。然后开赴宁乡道林，原驻扎

在湘潭县中路铺的陶凯所部也在当天赶来了。由于当时地下党已事先做好了大量宣传工作，故受到当地人民的夹道欢迎。部队在烧汤河大桥旁的一个广场举行起义仪式。先父在会上宣读了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的统治，一切行动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汤菊中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宣布：接受起义部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会后，部队分驻大电营、九江庙、龟头市一带。这天，是1949年阳历5月1日。

1949年5月4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式下文，明令该部队番号为“湖南人民自救军湘中纵队”，委任何际元为纵队司令员、汤菊中为政委、杨一舜为参谋长，毛羽芳为第一支队长，陶凯为第二支队长，下设几个团。并指示即日在驻地宣誓就职，整军备战。喻勋衡在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200多人来归后，晋升为纵队副司令员。张先正被程潜释放后，省工委加派张出任纵队副司令员，张即设法将原交警教导第一总队流散在长沙河西的所有人枪召集拢来，编为第一支队第二团，扩充了部队。

通电起义后，广为张贴标语、传单，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大好形势，发动群众起来与国民党作斗争。当时，司令部设在烧汤河，一支队进入湘潭、宁乡、益阳三角地带，二支队驻在宁乡、湘潭交界地带。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破坏敌军的公路运输线，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收缴乡公所武器，袭击白匪军，打乱白崇禧在湖南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的作战部署，促进湖南早日和平解放。

白崇禧得知宁乡姜亚勋部日益强大，何际元又率部起义，更加恼怒，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围剿。湘中纵队没有被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所吓倒，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一次，正在敌军刚进逼宁乡时，毛羽芳支队从山涧绕道撤至长沙河西，抢到敌军背后，消灭散人一个中队，然后又绕回烧汤河。他们就是这样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湘中纵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相继来归。原交警八总队许多官兵在浙江、江西起义失败后亦投奔湘中纵队。一次，在开欢迎大会时，不料敌190师从三面包抄袭来，而司令部当时只有少数警卫部队防卫，只好拼力突围。先父率司令部警卫营特务队转移至湘潭县三仙坳。忽又被敌兵包围，先父在指挥部队撤退时被冲散，身边仅剩副官何振球一人，且先父肋下连中2弹，幸好只中身披军氈，未伤要害。在敌人的追捕下，先父与何振球藏坳中一农舍牛棚顶上，才幸免于难。先父借农舍的豆油灯光，久久审视军氈弹痕，内心感慨异常。何振球轻声问题：“司令后悔吗？”先父沉默不语，许久才抬头反问：“你是指高官不做，还是指今日危难？”然后长吁一声说：“国仇家仇何以为悔！我抗日尽忠，起义守信，也是遂我多年心愿，即有不测，也无愧于去见先父。”湘中纵队虽然受挫，但斗志始终不衰。

在战斗中，黄威韩、曾庆吾、黄杰、李佑民等正副团长英勇牺牲。其中黄威韩被挖眼砍足，惨不忍睹。有个担负掩护任务的战士周子敏被敌人活捉，敌人用火钳烧红烫颈逼供，将其活活烙死。情报联络员周正彪、周俊等2人，亦在途中被捕牺牲。连长何卓等亦阵亡。共计阵亡指战员达30余人，被俘、被杀、被伤达70余人。在敌军不断“围剿”下，湘中纵队日夜奔驰，伤病员日益增多，医药给养十分缺乏，部队的艰难困苦不可言喻。为了有效的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纵队司令部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汤湘中与先父随陶凯的二支队仍在宁乡花明楼、凤山一带活动；毛羽芳率一支队毛维凤部转战华容东南二山一带（后该团一营长廖经纬率一个中队返宁乡杨林桥大屯营一带）；一支队二团在长沙河西走廊活动；李金波部回汉寿县活动；喻勋衡部回宁乡县家乡坚持游击战；张先正率一部分人马去益阳八字哨活动，策动当地驻军夏识时（张的内弟）、

夏先坤两个营和周柏林部武装起义。

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汤健民、郭云城两同志送来指示，指出长沙河西在战略上的地位，嘱咐要湘中纵队保存好实力，联系友军，打有效的游击战争。于是，汤湘中政委即去友军姜亚勋部，一起研究以后部队如何进一步配合作战的问题。汤湘中归队途中，适遇桂系第七军，一度陷入险境，由于战士拼命掩护才得以脱险。湘中纵队与姜亚勋部紧密配合作战，共同打击敌人，拖住了敌人，配合解放军胜利向南推进。

四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湘中纵队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曙光。8月26日，奉中共湖南省工委令，先父与汤湘中率湘中纵队1300余官兵，浩浩荡荡由宁乡开赴长沙市二里牌。9月3日，正式将全部人枪点交第一兵团（陈明仁为兵团司令）第二军第四师。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仍为兵团司令）。先父任兵团少将高参，陈兴苗任团长、陶凯任营长。毛羽芳的一支队在华容未归，由过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2兵团收编，后划归益阳军分区管辖，张先正部亦就地编入益阳军分区。

9月初，先父与汤湘中约谈一次。汤劝先父去湘西策反杨永清、罗文杰等部。先父说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恐难完成任务。汤说他可以写信给杨永清，并且通过组织后再去，或者参加慰劳团同志去湘南。先父说：“我们是原有约定的，我只干到天亮了便要解甲归田。”先父还告诉汤：“国民党要暗杀我。”因此，汤湘中同意先父回宁乡老家，并愿写信给县委，通知区政府加以保护。先父离长前，又留一封信给汤湘中，内容是“我到家后，如无兄命，决不擅离一步”等语。

9月上旬，先父回到宁乡老家后，参加了一次保务征粮代表大会，是以开明士绅资格参加的，并讲了话。他劝导大家积极征粮支前，并首先将自家派征之谷提前交清，以起倡导带头作用。他还宣传党的政策，并劝导、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及旧属，去投考革大、军大，将来为人民服务。

10月，当地的政府设在我家，为着房屋和家具的使用问题，先父与区政府同志发生争执，被区政府捆绑解县转省，关押达一年之久，审讯数十次。先被关押在省公安厅，后移送省人民法院。1950年9月25日，省人民法院以（50）特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以“匪特”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先父死刑。先父在长沙监狱于10月5日接到判决书后，当即表示不服。并于10月11日写了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上诉状》；陈述冤屈，摆清事实。先父在《上诉状》中申辩说，“伏查原判的主文、事实及理由各部份，或与实际事实不符，或者全无事实根据，均不能成立被告之罪行。……所有原判不顾事实，徒托空言，臆判死刑，情难甘服。”《上诉状》交给省法院后，既没有转呈上级法院，更没有改判。11月16日，先父终被错杀于长沙。在狱中，先父遗诗一首：“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点任浮沉。爱乡爱国终成幻，留与他生再作因。”

1984年1月3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84）刑再字第37号刑事判决书指出：“何际元在湖南未解放前，接受我地下党的指示，率部起义。起义后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对敌斗争中，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1949年8月长沙地区和平解放后，何际元的部队编入我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何任少将高参。以后何际元虽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原判属于错判，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50）特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二、恢复何际元的起义人员名誉。至此，先父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彭德才整理）

湖南省宪时期的选举戏法

赵 恒*

赵恒惕搞的湖南省宪法，不过是利用它作为南对两广、北对北京的一块挡箭牌，以延长自己统治湖南的寿命。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却很热心从事以促其成者，因十年混战，南去北来，不遑宁处，希望藉此可以使湖南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故省宪的起草委员、审查委员尚能慎重将事，不稍倦怠。迨宪法公布，开宗明义，便是遑举。一时铜臭弥天，豪夺巧取，丑态百出，有识之士就一切绝望，冷却一身了。我是筹备委员会和选举事务所的参事，又是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知道一些内情，兹就选举方面尚能忆及者述之如下：

省 议 员 选 举

根据“湖南省宪法”规定，省长、各司司长、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察厅长、审计院长等都由省议会产生，省议会还有质问、弹劾省长和各司司长之权。所以当时竞选省议员的人大多数认为，当议员是发财升官的绝妙机会，权力无边，可以监督政府，任何机关可以横冲直撞、说项荐人，选举司、厅、院长，可以大索贿赂，且可交换有利条件，不愿充当议员时，又可择肥而

*赵 恒，系当时宪法审查委员会委员、选举事务所参事。

噬，博得一官。故不惜倾家荡产，势迫利诱，全力以赴。其方法有买通全区选民不投他人专投个人者，谓之包票；有预先写好足额的选票，买通管票员塞入匭内者，谓之筑票；有明知自己票数相差尚多，写成足额之票，换出他人同额之票者，谓之换票；有明知不能当选，临开票时，纠集多人，到场假借名义，扰乱秩序，抢出票匭，偷偷加入己票者，谓之抢票。真是怪状百出。

当选以后，走马晋升，俨然新贵，开场便是租公馆、买包车、制新衣、接家眷、结政社、搞小组。其公馆中眷属少而食客多，都是有关选举的人，或系出力奔走预约代谋差事的，或系垫借或代借竞选经费来省索债兼谋差事的，小舅房亲，亦多从龙相庆，一派新贵气象，难以形容尽致。

司长、厅长、院长选举

省宪规定各司司长、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察厅长、审计院长等，都由省议会选出。这是议员们第一宗发财荐人的大好买卖。当时中、西、南三路互相竞争，每缺竞选者都有数人，票价无定额，除有特殊密切关系者声称不要报酬外，普通一百元，多数两百元。当功亏一簣的紧急关头，普通亦需三百元。尤可丑者，选举之日，袖藏多金，对尚无把握的议员在入门签到时，以袖接袖，补送一、二百元，口称请其帮忙，受者笑而纳之，报以“何必客气”四字。每一竞选人都给议员送上名片一张，嘱其注意姓名笔画，免成废票。议员们投起票来，却一点不受拘束，除因派系、金钱及个人利害关系预定必选者外，有故错写姓名，或者投非竞选之人，如梅兰芳也曾得了一票。竞选人除买票以外，酒席费亦为数不少，每请一次，总是十几二十桌，车饭费都在二百元以上。除宴请全体议员外，

个别的酒席及在大旅馆开房间的招待，则不计其数。其中由政府预定的竞选人，大部分由政府支出，自费竞选之人望当选后再来取偿。在当时已罗掘俱穷，人格丧尽。经过这样一番金钱的角逐，被选举出来的七司司长是：内务司长吴景鸿、财政司长袁华远、教育司长李剑农、实业司长胡学坤、司法司长徐钟卫、交通司长杨宣诚、军务司长李佑文及高等审判厅长李发，高等检察厅长萧度，审计院长陈强。当选者花天酒地，落选者则垂头涕泣，如丧考妣，匿不见人，且惹得终身债累。

省 长 选 举

宪法规定第一届省长由省议会选出4人，交由各县县议会决选，以得票多数者为当选。其实竞选的只有谭延闿、赵恒惕二人。当时谭延闿在各县还有几分威信，因他的姓名震耀湘人心目中者达10年之久，而各县县议员又多中年以上的资产阶级，对谭有旧情，故赵派人把谭当做老虎去打。包办选举的，是选举事务所所长彭允彝和赵的亲信本家黑铅炼厂厂长赵心筠，一面宣传谭延闿滥发票币的罪状，并搜集废票，编成马伞，游街示众；一面选派各县较有声誉面认识县议员较多的人，到其本县疏通监视，此举收效不小。最后侦知衡山、邵阳两县议会有倾向谭的趋势，于是连夜派周安汉乘汽船到衡山挽回局面，其结果谭、赵票数大致相等。至邵阳则弄巧反拙，票数谭多赵少。赵心筠每日到选举事务所和彭允彝密商各县选举事宜，每见了我去，便静默不语。后来同事者告诉我，说我多识谭派人物，疑心我是拥谭的，故不愿我与闻机密。

当时全省县议员2760名，出席决选的县议员是2593名，赵恒惕得1581票，谭延闿得885票。赵当选为湖南省第一届“民选”省长。

湖南援鄂之役

方鼎英*

1921年春，我由北京政府派送正在日本留学，专攻炮科。不久，湖南陆军士官同学唐义彬、邹序彬、宋鹤庚诸人来电，邀请我回湘，先到湖南陆军第一师任师部参谋长，以后再作适当安排。我犹迟疑未决，石陶钧力劝我从命，我这才最后痛下决心，动身回国。

返湘后，默察湖南各带兵官，个个都是新起之秀，意气昂扬，精神奋发，如不及时向外发展，终非了局。常以此向赵恒惕进言，众深以为然。适湖北省督军王占元部数月之间兵变三次，大失人心。这时赵恒惕在湖南因初膺省政，倡办自治，创立省宪，可谓朝气蓬勃、励精图治。鄂省蒋作宾、孔寅、何成浚等以留日陆军士官同学的关系，常对湖南军人敢作敢为、壮志凌霄的气概交相称赞。因此用种种办法来劝已经自治的湖南应该提倡联省自治，去援助邻省鄂人去自治。此外，已失势的安福系不满直系统治，也对湘军援鄂表示支持。曾毓隤等派遣陆军士官第八期同学路孝忱提带巨款前来游说。如湖南肯出兵援鄂，愿赠80万元做援鄂的临时军费。经过一段时期的权衡考虑，赵恒惕决定出兵援鄂。

是年夏，赵恒惕组织援鄂军，自任总司令，任宋鹤庚为湖

*方鼎英，当时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参加了援鄂之役。

南援鄂军总指挥，誓师援鄂。以叶开鑫混成旅三个团（缺一团）及桂军一部约一团为右纵队，叶开鑫为右纵队司令，从平江、通城、崇阳向武昌方面进攻；以第一师贺耀组旅及省府警卫蒋钺欧团为左纵队，贺耀组为左纵队司令，从岳州、临湘过江向汉阳方面进攻，此路到临湘后未过江即沿江右岸嘉鱼方面前进向武汉进攻；以第一师（缺贺耀组旅）、第二师及谢国光混成旅（缺一团）、吴剑学混成旅（缺一团）为中路纵队，鲁涤平为中路纵队司令，沿长武路向武昌方向进攻；陈嘉佑混成旅、蔡钜猷混成旅（缺一团）、鄂军夏斗寅团为总预备队。

1921年7月28日，湘鄂战争正式开始，湘军分别从三路不同方向向鄂军发起进攻。当主力军中路先头部队从岳州开到羊楼司、赵李桥一带时，与孙传芳部发生接触，展开激战。孙传芳以机关枪扼守火车站卡子，组成了一道十字火力防线，堵截我部进攻。双方伤亡惨重，湘军第二师叶棋团死伤千余。双方在羊楼司、赵李桥一带相持了8天。最后湘军左纵队组织特遣队，乘黑夜摸小路迂回抄至敌后进行猛扑奇袭，敌始狼狈溃退。这时鄂军也派来了援军，于是湘军左路特遣队与鄂军右路援军发生冲突，湘军特遣队夜袭轻装，出其不意，打退了鄂军的援兵。这样，敌方主将孙传芳才脱阵撤退。我部追过蒲圻，至汀泗桥，又遇到了新来的敌军靳云鹗部，我部一样的追击，才弄清楚是吴系，又把靳云鹗顶回桥那边去了。因时已天黑，敌凭河防阻，我部也就在桥的这边选择阵地掩护开进。这时孙传芳已全部溃退，离开鄂境向赣闽方向逃跑。王占元主力已败，大势已去，被迫辞去湖北督军。

按理说驱王的目的已达，应搞鄂人自治了，赵恒惕的援鄂自治也告一段落。但吴佩孚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后，统率直军开至汉口与湘军对峙。当时一般湘人对吴佩孚仍存有幻想，念念不忘驱张敬尧时，吴佩孚助湘驱张之恩，竟以朋友

之礼相待。赵恒惕下令湘军停止向直军进攻，想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谁知直、湘两军关系已非昔日。过去的吴佩孚援助湘军是因湘军驱张于他自己有利，故助之。今日湘军占鄂又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利益，觊觎了他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决不能袖手旁观了。他首先借湘军之力驱逐了王占元，以自己的亲信靳云鹗、肖耀南等部自然地接替孙传芳，然后与湘军在汀泗桥一带展开激战，自己还亲临指挥，从左右翼及正面三次向援鄂湘军猛攻，均遭湘军反击而败退，吴自己也随军退至武昌。因天黑，我追击部队暂时扼守汀泗桥头，未及时尾随追击，且各忙于争取战利品。我曾警告敌未追垮，猛追要紧，战利品总部保证会分配，今既扼守桥头，不怕敌来夜袭吗？此时尤其要各自警惕。次晨果有吴部某连率队来降，其官长是保定军官学生，伪言“吴佩孚这小子斥责我们败退要杀头，你们这边保定军及同学不少，我们见面一谈就会知道的，请姑念同学之情，收容我们吧。”适我部守桥的官长中保定军官学生很多，就喊令过来缴枪，这样收容了约一连。不久又有同样情况之敌，也约一连人，携带特别装备前来投降。但他们过来后即马上用手提机枪向我守桥部队猛射。敌后续部队一致扼上，两头夹攻，湘军顿时一片混乱，该桥头堡就这样轻易失守于敌。我守桥部队被打过去后，敌又继续向我左翼阵地冲击，营救其被我包围之敌约四个团。这样一未，就牵及我阵地全线动摇，纷纷后退。吴得知喜报，立即坐兵舰溯江面上，至岳州与赵恒惕谈判，迫使赵恒惕向吴佩孚作城下之盟，将岳州变为直军防地。

就这样，被鄂战争的胜利果实被吴佩孚葬送得干干净净，吴佩孚称心如意地做了湖南的太上皇。从此，赵恒惕甘为北洋军阀的走卒，一返湖南革命传统作风，仇视革命，直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湖南，才结束他在湖南的统治。

北伐前夕国民政府派员联唐侧记

张季任*

1926年春，湖南民众运动，汹涌澎湃，全省驱逐省长赵恒惕的浪潮，大有席卷三湘四水之势。赵恒惕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他的四个师长中，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势力最大（有5万人枪左右），与赵恒惕的矛盾最深，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是赵的死党外，其余一师师长贺耀组、二师师长刘钊，摇摆不定，并无主见。唐生智审时度势于3月15日率部攻占长沙，赶走了赵恒惕，随即代理省长，并与叶开鑫部展开激战，叶部向北节节败退。3月20日，唐部攻克岳州。赵、叶投靠吴佩孚，恳求援助。吴佩孚调遣大军布防鄂南，摆开援叶架势。并委叶为“讨贼联军”总司令，另调余荫森师交叶节制，还令赣军唐福山师及驻赣粤军谢久炳师，从萍乡向湘境进逼。叶开鑫纠集赵恒惕残部举行反攻，4月3日岳州被叶攻陷，这时唐生智已处于不利地位。

唐生智虽早已和广东国民政府有所往来，但没有正式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未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政府又因兵力不够充实，准备也未就绪，一时难以出师，而各方面函电交驰，要求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伐。于是派遣第七军参谋长兼一师师长白崇禧、第四军十一师师长陈铭枢为全权代表，来湘与唐生智

*张季任，宁乡人，当时参加了在教育会召开的欢迎大会。

进行联系，商谈编制及北伐等重大问题。白崇禧足智多谋，能说会道；陈铭枢乃唐生智在湖北陆军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与唐交谊较深。白、陈两人使湘，实为最适当人选。

长沙人民早就向往广东，尤其盼望早日北伐。这次白崇禧、陈铭枢到达长沙后，长沙人民革命热情顿时高涨，在教育会坪开了个空前热烈的欢迎大会。上午8时许，各机关、各学校、各工会、妇女联合会……等，打着大红旗纷纷进入会场，主席台上总指挥、著名体育教师（号称喇叭司令）李惠迪，拿着特大的白铁喇叭，指挥各单位整好队伍、排完位置，当时没有扩音设备，但李惠迪声音嘹亮，精力充沛，全场几万人都能听清他的声音，接受他的指挥，全场秩序井然。

顷刻，湖南党、群领导人夏曦、郭亮、易礼容、熊亨翰、陈章甫等，陪同白崇禧、陈铭枢以及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进入会场，登上主席台，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随后，由李惠迪司仪，宣布开会。首先由夏曦致欢迎词，他代表当时湖南三千万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两位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巩固革命政权，发展壮大革命军队，扶植工农运动等的英明措施，表示坚决拥护。接着揭露赵恒惕统治、压迫、剥削、摧残湖南人民和革命活动的种种罪行，介绍湖南群众运动日益发展的概况。并恳切要求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统治，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保证湖南人民从各方面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白崇禧、陈铭枢相继讲话，他们感谢湖南人民的盛情欢迎，介绍国民政府建设革命根据地情况，发展革命武装的措施，阐明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并负责转达湖南人民迫切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要求……等，说得恳切透澈，通俗易懂，激起台下一阵阵的掌声。

会场上有几件事，使我印象深刻，也可说是会场花絮：其

一、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西装革履，个儿高大，没有说多少话，他把手掌向胸脯上几拍说：“如果唐生智不革命，杀我刘文岛的头。”其二、白、陈的一名警卫士兵，肩背步枪，腰胯龟纹铁壳手榴弹，上台讲了话，干脆利索，表示革命战士勇往直前的决心，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在军阀统治时期，师长在上，一个士兵只能俯首贴耳，哪里会有说话余地，他把新型军队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作风，呈现在湖南人民的面前，引起很大震动。其三、一个农民代表在讲话前，把台上横放的一张大长桌（可有一二百斤），用手搬直，向前一推，趴到桌上发言，更显得他的一种英雄气概。他表示北伐军过境时，一定发动农协会员，并肩作战，当向导、探敌情、运输军粮、弹药，供应柴草、茶水等，讲得有声有色。

大会临近结束，夏曦代表湖南人民向两位代表赠送了直式长方形锦旗，向国民政府赠送了横幅，都是用上等缎料精制的，上书“共同奋斗”四个大字，两边用小字落款。两位代表接受锦旗和横幅后，白崇禧还致了答词，他善于词令，讲得很得体。

大会结束后，还举行了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赵恒惕”、“打倒叶开鑫”、“打倒北洋军阀”、“请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战争胜利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长沙城里、一片沸腾。

白、陈两位代表，在长几天，和唐生智会谈的具体内容，事关军事秘密，报纸上也未公布，证之以后事实，这次会谈是很成功的。他们离长返穗后，虽然在4月24日唐生智退出了长沙，叶开鑫率部进驻，继续向南窜扰，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随即作出了出师北伐的决议。国于政府很快于5月21日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誓就职，开始北伐。

我所认识的几位长沙市长

易 甲 瀛*

长沙在抗日战争前就设有市政府，1938年“文夕大火”时市长为席楚霖。省政府迁耒阳，市政府奉命撤销，市政归长沙县政府管辖。至1942年又恢复成立了长沙市政府。

我自1942年1月长沙市政府恢复起，至1949年8月和平解放止（1944年6月至1945年8日长沙市沦陷时期除外），历任长沙市政府地政科长、湖南省第一地籍整理处处长、市政府参事、省地政局科长、市地政局长等职。曾先后与王力航、梁霖、王秉丞、李毓九、汪浩、蒋琨、陈迪光、任建鹏和吴博夫等九个市长有联系。本文系本人对这些市长的一些回忆写成，虽不全面，但愿读者从这一鳞半爪的资料中，能了解国民党政府官场的复杂情况。

王 力 航

王力航，别号揆一，湖南耒阳人，湖南大学毕业，自1942年1月起至1943年5月止任长沙市长。

1941年，我在耒阳工作，闻长沙将恢复成立市政府。心想：长沙市经过一次大火，已成废墟，将来规划重建，正是配

* 易甲瀛，自1942年1月至解放，历任长沙市科长、参事、局长。

合进行城市土地改革的理想时期，我希望能学以致用，出任长沙市政府地政科长。恰逢长沙市政筹备处长王力航来耒阳，我请其弟代为引见，表达愿望，蒙表态同意，告知待市政府正式成立时，再电约到差。

王力航返长不久，即1941年底，日军进犯长沙，在市郊激战，市区已紧急疏散。1942年元旦，王力航于炮火声中，在长沙市郊区宣告成立市政府，宣誓就任长沙市长。不久日军撤退，我遵电召赴长沙市政府任地政科长。当时市政府在中山堂，后迁省民政厅旧址。

王力航待部属和气，容易接近，部属对他也尊敬。他常办公至深夜，闲时也来询问工作情况，指示工作。他制定计划，口述囑我笔录，一气呵成定稿，不需涂改。我初离学校，渐晓公务，受其启蒙不小。地政科在他领导下，成立清丈队，清理土地经界，并绘地籍原图附本，另行保存，以防敌机轰炸。成立市荒废土地垦植委员会，贷放经济作物种籽，如蓖麻、马铃薯、芋草和蓝靛等，市民可以自由择定荒废土地，请领临时垦植执照，政府保障其收获。基地业主在其种植期内，不得刁难或破坏生产，还将新河飞机场辟为稻田，租予农民种植。这些措施，能使地尽其利，对战时国计民生有益，曾获上级表扬。

王力航能重用青年，虽萍水相逢，常破格提拔。当时我和军事科长简洁，警察中队长易重光，区长徐浩、张平东等，都年未滿30，朝气蓬勃。但他也收罗了一些世故较深的老年亲戚、同乡、故旧，安插在财经工作岗位。

他善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如我曾请假回乡为父祝寿，他囑出纳赠我法币貳百元，相当我一月工资。我虽再三婉谢未受，但内心对此实有好感。他曾向职工大谈福利设想，谓拟筹措资金营利，将其收入建筑职工住宅大院，开办集体食堂，发给双倍薪资，部分职工闻之欣然。

长沙市食盐历来靠滨海省份供应，战时交通阻塞，盐价昂贵，一担谷仅能换购食盐二、三斤。王力航成立食盐统销处，集资采购，限量配销，委其亲戚罗某主办，由其第三夫人赵惠芝任出纳；又成立敌伪产清理处，委另一亲戚罗某主办，亦由赵惠芝兼任出纳。他将其中部分收入，转化为私有。

长沙市郊有许多义冢山和荒地，产权多属祠堂、庙宇、同乡会馆，或其他慈善团体，亦有无主的荒山荒地。市区建设规划向外扩张，郊区地价上升，致有土地投机者伪造契证，冒名侵占，盗卖盗买公地，甚至有合伙侵占公地者。各伪造契纸一份，作为纠纷双方，诉请法院裁决或调解。以法院判决或调解为凭，向政府登记产权。恶霸柳森严曾持其族谱谓其族祖葬潘家坪某公山，任意指界，向市政府申请登记所有权。事属渺茫，无从核对，实难视之为产权凭证，未允许确定土地产权归其所有。柳森严竟与王力航密商，由其族众出笔将此所谓祖坟地基明卖暗赠予王力航，用其第三夫人赵惠芝名义接买。王力航指使其亲信鄧力行邀约地政科和土地清丈队职员参加买卖土地写契宴会，分给中费，请他们各在契纸署名为中证入。并在中证入姓名上标明职务名称。然后持此契纸来地政科申请登记产权，这事是鄧力行瞒着我做的。因原始产权存疑，且按当时法令规定：“凡祠堂、庙宇、公益事业、私立学校、慈善机关，以及其它社团集体房产的出卖，事前必须报经当地政府批准。”赵惠芝接买柳姓公山，未具备合法手续，未便贸然同意登记产权。王力航曾派市府一女职员代表前来申请登记，后赵惠芝又亲来联系，我均依法解释，延搁未作处理。至1943年3月市政府地政科裁撤，我调离市政府，始由王力航本人商由市民政科地政股办稿批复，同意柳族变卖祖山予赵惠芝。文稿是王力航授意拟写的，由王力航本人审稿签发的，完成了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法定手续。类此侵吞公产的情况尚有，不一一列述。

王力航胆大多诈。他常说：“上智无法，中智立法，下愚守法。”观其平生政治生涯，时起时伏，有时显耀于一时，有时身败名裂。其营私舞弊，损公肥私，确足证明他是一个目无法纪的所谓“上智”者。

王力航年轻时，曾在北伐军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结识一些两广新军阀，后又转入广西新闻界。长沙“马日事变”后，他为《广西日报》派驻长沙市特派员，同时又受聘兼任湖南省感化院讲师，宣讲中国国民党党史。

抗日初期，桂系军人黄绍竑任江苏省主席，王力航在其下任江苏省第十行政区专员。因潜赴上海沦陷区，有通敌嫌疑，被黄绍竑逮捕拘留审查年余。据他解释，因他管区江苏无锡等县盛产蚕丝，战时滞销，他私往上海，企图疏通运输渠道，因事前未请示汇报，被人诬告，致受通缉。他自行投案接受审查，终获无罪释放。

王力航自江苏释放回湘，又投靠广东军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薛岳派他任长沙建设规划委员会秘书，代行薛岳本人所兼主任委员职务。以后薛岳决定恢复设置长沙市政府，又任王力航为市政筹备处长，旋即正式任命为长沙市长。

1943年4月，王力航因战备需要，成立了长沙市干部训练所，集训保长和军训干事，训练期为一个月。市长兼所长，市国民兵团团长兼副所长，军事科长兼教育长，重点是军事训练，下设军训股和训育股。训育股掌握受训人员的思想教育。国民党市党部和三青团市团部争相推荐股长人选，当时我任湖南省第一地籍整理处长，拟培训一批地籍整理基层人员。王力航同意我在市干训所内附设地籍整理专业培训班，欲我以班主任兼该所训育股长职。我实未过问训育股事，另有训育股员多人，均系三青团骨干。三青团在受训人员中活动较多。

王力航长于演讲，曾向受训人员讲演“明数理”。谓“数”是权衡轻重多寡强弱之分，“理”是事物存在和倾向，“理”存于“数”中。为政者必须掌握“数理”，不能一鼓作气凭主观办事，遇事要胸有成竹，克敌制胜。他援引民间传说诸葛亮能神机妙算的事例说，并不是他通晓阴阳五行八卦，而是能明“数理”。

长沙地邻前线，四方杂处，社会情况复杂。王力航呈准成立调查研究室，监视汉奸潜伏活动，可能还寓有防共的任务。兼调查室主任简洁，陆军大学将校班毕业，常自夸擅长侦察术，谓当时长沙市情况既有汉奸活动，也有共党活动，不可掉以轻心。简洁在王力航交卸市长前已辞职去东北某军总部任少将政工处长。调查室副主任鄧力行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鄧悌的亲侄，鄧力行是鄧悌亲信随从，解放后镇反开始，被人民政府逮捕，在狱中畏罪自杀。

1943年5月，薛岳调王力航任第四行政区专员，派梁霖继任市长，各方均为王力航惜别，赠纪念物。我也曾出自内心的情谊，送他一幅湘绣，上绣“赢得去后思”，以示怀念。

专员与市长平级，迁调事属平凡，无甚可喜，但附势者以荣迁阿之，高级职员及其亲信多表态愿同进退。王力航曾希望我同去滨湖开垦湖田，创办农场，我以非国家正式编制机构，不能铨叙官阶为虑。王开导我，谓有志之士应从施展抱负着眼，不必计较官阶的有无。

王力航未料及调职时，公私事务一时难于了清，不能即时办理移交。新任市长梁霖携带随从多人，急欲接事，并商量预借经费开支，王力航未通融，致新旧两任失和。

梁霖接任后，迅速检出一些案卷向薛岳控告王力航任职期间有重大贪污。薛岳头脑简单，喜怒无常，任性杀人，过去曾因禁赌发现湘潭县长王伦打麻将牌，竟将其枪决以树威。他接

梁霖控告，即下手令着梁霖逮捕王力航押送第九战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审判。多数士绅及故旧均同情王力航，议论纷纷，谓系梁霖挟嫌诬害，设法营救。湖南大学在长校友易祖洛等曾有援助王力航的组织。王力航被拘禁于城南区白沙书舍，亲友部属中，间有往探监并送酒食营养品者。1944年4月，日军倾巢进犯长沙，市区紧急疏散，王力航获交保释放。

王力航出狱后，回耒阳原籍组织游击队，自称司令。薛岳视为非法，派兵进剿。王力航暗中与剿军联系，互通声气，通知进剿日期，先行逃避。最后仍由进剿的军长代向薛岳疏通，谓王力航并非土匪，可以利用。乃改剿为抚，给以衡耒攸地区游击司令官衔。

1945年，抗日胜利，全省游击武装奉令解散。其后，王力航在长沙市中山西路开设中原实业公司，曾在公司内设宴约旧时在长部属聚餐，不论职位高低，嘱相互口头通知赴宴。席间，王力航畅谈被捕前后情况，略谓调职后，私事待了，未赶常德接任第四区行政专员职位。因前任专员病故，悬缺已久，薛岳数次电话催往接事，未遵命即行，疑是心怀不满，抗不遵命，恰逢梁霖诬言陷害，遂遭逮捕，冤狱一年，终获昭雪。后在耒阳组织游击抗日，薛岳进剿，日寇在前，薛军在后，腹背受敌，部下兵士心慌，他无畏惧，深知薛岳个性，如自行投案，俯首就擒，定杀无赦，唯有硬拼，反被视为人才，能获重用。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伪称实施宪政，选举省市县议员成立各级参议会。并由全民普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通过立法委员会议，制颁国民政府宪法；通过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以加强其统治。各级参议会候选人由各地国民党联合青年党、民社党协商圈定。各地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候选人，则由中央成立五人领导小组，按照三党协商分配名额圈定。

各地官僚、军阀、豪绅、地主恶霸以及各类特权人物均纷纷活动，企图被圈定为候选人。王力航初期表现对竞选无大兴趣，各方也以为他政誉欠佳，未予重视。耒阳县参议会成立，有关方面已圈定两名候选人，任由县参议会选举一人为省参议员，但几次开会选举结果，票数难于集中。王力航在耒阳颇有声望，特设宴邀约全体议员聚餐，建议试行预选，如众望归于一人，或偏重于一人，则来日正式选举，可按此日预选结果投票，以免浪费时日。试行预选结果，竟出人意外，一致选举王力航为省参议员，王力航当即表态当仁不让。翌日选举，王力航竟以非圈定候选人当选为省参议员。持反对意见者，谓系非法被选，控诉于湖南省选举事务所。经湖南省选举事务所批复：“虽非圈定候选人，但经全体参议员选举产生，依法应属有效。”

当时当选省参议员者，又有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或监察委员的人，均纷纷赴京活动圈定。王力航公开表示无意再行竞选，竞选者亦咸谓其有自知之明。于是，王力航佯称赴沪为其中原实业公司接洽商务，实际潜往南京，通过桂系集团，由白崇禧出面宴请五人小组领导成员，当面推荐圈定为立法委员候选人，最后被普选为立法委员。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程潜、陈明仁酝酿起义。国民党中央派黄杰来湘，在邵阳另行成立坚持反共立场的湖南省政府。王力放出任该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以备战应变为借口，拍卖安江纱厂大量棉纱，中饱私囊，携其三位夫人逃往香港。三夫人赵惠芝与之分离，径回大陆浙江原籍。王力航最后逃往台湾。

按照国民党宪法规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等职务，均不得兼任行政官职。王力航曾任昙花一现的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去台后，已失去其立法委员资格。

传闻王力航曾赴南美巴西经营农场，资金亏损大半，晚景不佳。

梁 霖

梁霖，别号伯揆，继王力航后任长沙市长，任期自1943年6月至同年12月底止。他是长沙县人，父亲为绸缎商店店员，兄弟二人，青少年时均无赖，亲友咸鄙视之。

论才识气魄，梁霖远不及王力航。梁霖初与王力航接触，王颇藐视之，语多侮慢，竟此生嫌惹祸，以致王卸任后，竟为梁陷害。

梁霖青年时，曾在上海法商洋行任练习生，学会几句商业常用法语。闲时不钻业务，却模拟法商老板签字，居然能鱼目混珠，竟敢胆大妄为，冒名窃收外商预付巨额定货款数千法郎。后恐其事被发觉，难于免祸，遂求助于他过去参加过的上海青红帮，将所窃巨款孝敬青红帮最大头目，托其代为设计潜逃。并以其窃款中一部分法郎送其赴法留学，以避风险。梁霖在法混了些时日，待其窃案风波平息后，仍然回国。从此他自称是法国留学生，在法攻读市政学。

抗日战争时期，梁霖逃难至四川重庆经商。初开设寄卖商店，后营国际餐厅，颇获盈利，利用借赠金钱手腕，结识国民党中央委员覃某。

覃某有大小夫人，分居两处，各掌握覃某私章一顆，分领覃某本兼各职俸薪及津贴。故覃某虽位尊俸丰，手中并无余资可供挥霍，而他性好牌赌酒色，每于逢场作戏时，常捉襟见肘。梁霖所设国际餐厅，系覃某常来作客之地。覃某如手中不便，梁霖便自动供助，不计偿还。因此覃某对梁霖另眼相看。

1942年底，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为筹备召

开全省行政扩大会议，亲赴重庆向中央汇报请示，请求蒋介石指派大员出席指导，以示隆重。因薛岳为人专横拔扈，在湖南所作所为不孚众望，舆论欠佳，旅居重庆的湖南军政要人，对之甚为恶感，提出要求“湘人治湘”的呼声。这对薛岳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不利。薛岳企图在渝稍事停留，加强与湖南军政要人联系，以消除成见。梁霖乘此时机，借用覃某名义，发起组织湖南旅渝同乡欢迎“三战三捷”将军薛伯陵联谊会，印发柬帖，邀约在渝湖南籍军政要人参加。在联谊会上，薛岳施展外交手腕，以晚辈自居，态度极为谦恭，诚敬地迎接和送别在渝的湖南巨头，自称才疏德薄，任重道远，尚祈多赐教诲。参加联谊会的诸权贵亦受宠若惊，报之以歌功颂德，宾主感情融洽，隔阂消除。薛岳甚为欢喜，对负责筹办联谊会的梁霖大有好感。在与梁霖对话时，曾询问梁霖资历与专长，问其是否有意服务桑梓。梁霖答以曾留学法国专攻市政，加有机会，愿在司令长官属下效劳。薛岳含笑未置可否。

薛岳返湘后，湖南省行政扩大会议如期召开，蒋介石派中央委员覃某代表出席指导。梁霖乘此机会，极欲与覃某同乘飞机返湘，以便请覃某面向薛岳推荐，安插优缺。但梁霖并非机关公职人员，无公文证明，不能以覃某随员名义乘坐飞机同行。当时航空交通并非面向群众，私人很难购乘飞机票。覃某平日受梁霖实惠最多，在梁霖再三要求下，无法推脱，只得出示名片，在名片上盖章证明梁霖系本人私人秘书，因工作需要，请准购买飞机票同行，交梁霖自往航空公司联系。航空公司见覃某是中央要人，又是因公赴湘，遂临时推迟某军长飞行日期，腾让座位与梁霖乘坐。

回湘后，梁霖居然印刻名片，刊衔中央委员覃某私人秘书，招摇于交际场中，覃某不能约制。但私人秘书，并非官职，又无薪给，仅只虚名而已。

覃某到达耒阳，薛岳隆重招待，视同天使，推崇备至。覃某感其情重，在湖南省扩大行政会议上，大肆吹嘘薛岳在湖南的战功和政绩，并谓蒋介石对薛岳非常器重。如此吹捧，大大提高了薛岳在湖南的威信。薛岳与覃某互相利用，相得益彰。梁霖乘机恳请覃某向薛岳推荐安置官职。薛岳答复覃某，深知此人确有干才，拟以行政专员任用。覃某闻之大为吃惊，默思梁霖系商人，并无实际从政经历，专员要职，实非所宜，他私意认为只须予以县长职位即可。却又不便明言，只得含糊其词地说：“既承司令长官破格提拔，但他资历较浅，又无实际从政经验，希望长官给他一个可资锻炼的实际工作可也。”薛岳误以为嫌专员无实权，梁霖又自称曾在法国专攻市政，遂决定调王力航任专员，派梁霖接任长沙市长。

梁霖获悉内定为长沙市长消息后，即匆匆来长，得意宣扬。一些求官谋职的亲友，多来趋侍。待正式命令下达后，即携带随从多人至市政府接事。

梁霖以一小市民一步登天，沐猴而冠。言行颇多独特，有关他的笑料流传甚广，不免有失堂堂市长的观瞻。

梁未接任市长前，住教育西街德邻公寓，官派十足。他的住房楼上寓有某军长，梁霖初来不知。军长偕客自外归，马靴沉重，楼板响声大，梁霖因未能即日接事心正烦恼，随从又多，开支颇大，不觉恼怒，大声喊叫茶房：“楼上住的什么人，叫他们脚步放轻些。”茶房悄声告知系某军长接待宾客。梁霖闻之，即退回房内，哑然失声。

梁霖希望能早接任，但卸任市长告知清点编册移交需时半个月。梁霖商借公款，王力航答称无此规定，接事后可以任其动支。梁霖恼怒，先向薛岳控诉王力航故意拖延时日，不即办交移，其中必有弊端。接任后即检具若干案卷视为贪污凭证，呈报薛岳。内有一凭证，确是梁霖神经过敏，薛岳鲁莽草

率所造成，支持王力航者，作为笑柄宣传。事因王力航任内，曾有总务科长梁人伯，于王力航卸任前，辞职就任省田粮处科长，经管公款存湖南省银行。按银行规定，往来户银行存款月终结算，须填发结存余额通知单。梁人伯原寄住在市政府宿舍，结算单按经受人通信地址填送市政府。梁霖别号梁伯揆，与梁人伯姓名有两字相同，新来传达误将此银行结算单送交梁霖。梁霖不明真象，疑是王力航移交后，心中有鬼，用他姓名存巨款于银行进行贿赂；又故弄玄虚，将姓名略为写错。梁即迅将此银行往来帐结算单面呈薛岳，谓卸任市长确有严重贪污，畏被揭发，通过银行存款手法赠送金钱，冀获隐瞒包庇。薛岳不辨真伪，即下手令逮捕王力航送第九战区军事法庭审讯。

梁霖逮捕王力航后，有意丑化和侮辱王力航，以炫耀自己。他雇人力车载乘，并派枪兵押送，游行闹市，令其走卒跟车高声喊叫：“这是王力航，前任市长，因贪脏枉法，经现任市长检举上告，已奉令逮捕押送第九战区军法处审讯判罪。”行人停步，路侧呆看。王力航坐人力车上，汗颜不已，伪装阅读书报，以书报遮面。

梁霖为进一步查证王任贪污，对王任职工中曾经手物资钱财的人都派人侦查，虽是最低级职员负责不大的，也在所不免。市荒地垦植委员会干事田守敬，曾经手贷放经济作物种籽，并率领少数临时工人垦植少量荒土。此人为人老实，性情愚拙，有人向梁霖反映他曾接受新河飞机场佃农礼物。这并非大事，梁霖竟小题大作，将其拘押，亲自审讯，拍案呼叫威胁。田守敬羞愤，遂从二楼市长办公室前面阳台跳下自杀，楼下系麻石路面和阶基，顿时昏死，血肉模糊，群众哗然。梁霖亦手足慌乱，经急送医院抢救，幸得免死，但已成残疾。田父控诉于长沙地方法院，因是自杀，未予受理，案情不了了之。

梁霖自以为法国留学生，呼朋引类，延揽所谓法国留学生三人参加市政府领导：尚其熙任主任秘书，曹师昂任参事，郭其瑞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接任市长之日，市政府内外彩旗飘扬。梁霖向报界宣称要将战时的长沙，建成法国巴黎式的城市。尚其熙曾任长沙市重建规划委员会委员，有一定的城市建设才识。但曹师昂与郭其瑞两人，均是脓包，与梁霖言行荒谬类似，诸事一窍不通，却又狂妄自大。他们写中国文字不能成形，拟稿办文达二十字以上，即难通顺，令人费解。平时处事独断独行，不向梁霖请示汇报。“一国三公”，梁亦难于约束。有人对梁、曹、郭三君合赠对联一副：“市政府三妖作怪；长沙市一塌糊涂。”

当时行政机关规定：每周星期一晨，须举行“朝会”，名曰纪念周，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功绩。“朝会”须集合全体员工于一堂，由机关长官率领向总理遗像（即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带头背诵总理遗嘱，然后静默三分钟。梁霖在背诵总理遗嘱，竟不能熟记全文，常背了上段，忘了中间一段，只得口中念念有辞，含糊不清，最后大声读出遗嘱的末尾句，匆匆结束，至此员工多相顾而笑，心照不宣。

梁霖虽身为市长，但言行轻浮浅薄，不甚注意影响，广大市民群众茶余酒后流传市长笑话甚多。

某日梁霖步行闹市，伸脚给街边擦皮鞋油为业的儿童令擦鞋油。童索值一角，梁霖仅给资五分，儿童不肯，言语哆嗦。梁霖心不耐烦，发怒大声叱之曰：“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长沙市长。”儿童虽不知道市长的官阶有多大，但明白遇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官，只得自认晦气走了。

又一日，梁偶然坐于某大商店内与其父辈戚友闲谈，陪坐者如众星捧月，奉承甚恭，忽见当地保长持簿前来收费，梁霖询问是收什么费的。答称：“挨户摊费雇买壮丁。”梁霖闻之

勃然大怒，持手杖痛击保长，并亲自揪送市政府直属警察中队，闲人追随观望。梁霖大声疾呼曰：“大家看，这个保长违法摊费，买卖壮丁，我市长亲自逮捕他法办。”观者窃笑，暗中同情保长无辜，因国民党政府征兵法规规定：凡全保年龄合格的男丁，每年均应参加抽签，除独子、公务人员、学生外，中签者均须入伍当兵。而那时流行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谣。因为当兵受长官虐待剥削，衣不蔽寒，食不果腹，疾病不予治疗，夜行露宿，九死一生。故达到合格年龄的男丁，都害怕中签，想方设法逃避，因此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幌子下，各保都不正式举行抽签，改变办法，挨户摊派费用，集资收买无法营生的人或兵油子去顶替。

梁霖日常公务甚多，接待宾客往来不绝，但对日常生活小事，却吹毛求疵，如一次发现书案上一厅大炮台香烟短少两支，不觉奇怪，大声呼唤工丁，质询是谁拿了。工丁报告适才尚主任秘书和曹参事来了，坐候片刻，各吸一支烟才走。梁霖呵了一声笑道：“原来是这两个鬼。”

由于梁霖言语浅薄，行为庸俗，所罗致属员又多滥竽充数，甚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上级所下达任务，多不能完成。省属各厅处局主管下来视察，询问情况，含糊对答不清，有时答非所问，各方皆有责言，渐为薛岳察觉不满，厌恶日深。每逢谒见或召问，必对之严加指责，声色俱厉。此时梁霖最怕见薛岳。必须谒见时，则搔首垂头拍额叹曰：“糟糕，今天又该挨骂了！”因其无能，薛岳让梁霖仅只当满六个月市长，就明令免除他的职务，未再给他官做。

闻梁霖卸任长沙市长后，曾在湘潭逗留，与众聚赌，发生口角。某赌伴颇轻视其赌品，骂他是什么东西！梁霖竟趾高气扬拍胸自报身份说：“我是长沙市长。”反问赌伴“你是什么东西？”赌伴讽刺说：“你是长沙市长，只能在长沙市神气，

不要来到我们湘潭市称角色。”

梁霖离开湖南后，又去重庆谋事。约一年之后，曾见湖南报刊载新闻，谓国民政府国防部后勤司令部少将后勤员梁霖，在云南边界处，破坏盟军汽油输送管道，盗窃汽油，被美国盟军破获，移送我国政府法办，已经军事法庭审判“以破坏抗日战争罪，在昆明执行枪决”。

王 秉 丞

王秉丞继梁霖后任长沙市长，任期自1944年1月至同年5月止。自1944年6月至1945年7月长沙市沦陷的一段时间，市政府已撤离长沙市区，成为流亡市政府，王秉丞实际未履行长沙市长职务。同时长沙市内另有日伪市长唐令欧所成立的傀儡长沙市政府，王秉丞所领导的长沙市政府，名存实亡。

王秉丞，湘潭人，曾任小学教师。1938年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时，曾设有县政人员训练班，王秉丞参加受训，因中文成绩较好，毕业成绩尚优，从此参加县政工作，任过几届县长。未任长沙市长前，任益阳县长。

薛岳发现梁霖实不堪胜任长沙市长职务后，决心另行物色一名富有朝气、办事干练的能员接替，计划从现任各县县长中挑选提升。1943年秋季，薛岳在耒阳亲自主持湖南省运动会开幕仪式，并在主席台观看体育健儿竞赛。王秉丞年龄已过40，仍争取自列为球队队员，目的是想让薛岳看到他身为县长，能体会长官提倡体育的宏旨图其赏识。而薛岳当时在主席台上看到益阳县长带头参加体育运动，在场上顽强抢球，大为欣赏，并用传话筒在主席台上大声呼喊：“益阳县王县长加油。”这不啻是对王秉丞的莫大精神鼓舞。他受宠若惊，浑身是劲，更加倍努力奔跑。不幸天不作美，突然下大雨，但球赛并未因此中

止。王秉丞在大雨倾盆之小，毫不气馁，反更精神抖擞。薛岳是军人，欣赏这种精神，认为他朝气蓬勃，大有可为。因此运动会结束不久，于1943年底，下令调王秉丞继任长沙市长。

王秉丞身材不高，面目可憎，对属员或可由其指挥的人，态度比较严肃生硬，语言简单，使人难于接近；而对上级则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待地方士绅或与之同级人员，一般尚能随和；但对有权有势之豪绅，如自称辛亥革命老同仁的彭石钩，则畏之如虎，不敢得罪。他忠实推行蒋介石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又能按薛岳提出的“生、养、管、教、卫、用”六大政策和体育救国的精神行事，这就是他能获得上级青睐的原因。他平时衣着朴素，对饮食则较讲究，酒宴常开，每晚必服荔枝桂圆冲蛋一碗。喜搓麻将，出巡不乘轿，不坐人力车，脚穿草鞋，骑一匹黄色的土产马。

王秉丞聘请一位前清秀才柳敏泉（湘阴人）为主任秘书，其人年近古稀，写一笔好字，能吟诗作对。王尊之如师，年节加倍馈赠，平时嘘寒问暖。柳敏泉的主要工作，是替王秉丞写应酬八行书、对联、喜庆哀悼和歌功颂德的诗文。王秉丞任益阳县长时曾有提倡打篮球，发动老百姓扫街、保持城市环境整洁和禁止妇女烫发、维持风化的“三大政绩”。他接任长沙市长后，仍然如此照办。每日上班前，他就督促职工打扫市政府办公室和庭院的卫生，然后骑马带领职工肩荷扫把上街挨户检查是否户户有人打扫室内外和街道清洁。如发现某户无人出门扫街，或见街前门口不够清洁，就捶门喊人训话申斥。有一次他乘马带队至某僻静巷道，见一老翁在门前扫街，动作马虎，形似敷衍，他不觉怒起，大声呵斥。不料老翁索性抛掉扫把，气愤愤地面向王秉丞说：“我见你是市长，算是敷衍你的面子，出来应付打扫清洁。你竟不讲礼，摆架子，打官腔。你不要以为你是市长，了不起。我的儿子也在重庆国防部任少将军

官。”王秉丞见这位老翁说自己是少将的父亲，就默不作声，骑上马到别处检查去了。

王秉丞率领职工检查扫街后，其次要的日常工作是安排职工练习篮球，规定市民众教育馆职员应积极参加并按时发给篮球，练毕收回。市民众教育馆长陶英因不愿以练篮球为主要业务，又厌恶管那些发球、收球的琐屑工作，自请辞去馆长职，走了。

王秉丞认为妇女烫发有违习俗，不符“新生活”要求，非常厌恶。他任益阳县长时，曾严格制止。到长沙市后，见妇女流行烫发，很看不惯，就嘱主任秘书柳敏泉拟文布告禁止。布告是四六骈体韵文写的，既通俗又典雅，文内列举了禁止烫发的理由。大意是：妇女头发具有自然美姿。古有美人张丽华，发光可鉴，传为艳谈。头发可以梳装成多种美观发型，古时妇女有堆叠青丝如云的，有将发卷成凤鸟朝阳的，更增风韵。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不仅损毁自然秀色，而且蓬头散发，招摇过市，有伤风化。并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从今起，严格禁止，凡操理发业的，应即销毁烫发工具，明知故犯的，决不宽恕，将予罚款或令停止其营业。妇女亦不得违禁烫发。并备文下达所属区以下单位，嘱广为宣传，使家喻户晓，共同监督执行。王秉丞本人则经常骑马上街巡视各理发店，检查禁令执行情况。小理发店和一般小市民都害怕犯禁，不敢烫发。但有一次，当他巡视到一大理发店时，见一华服妇人，居然仍在烫发。他走入理发间，大声斥责理发师竟敢藐视禁令。不料华服妇人不待理发师回答，却怒容满面地向着王秉丞站立起来说：“是我叫他烫的。你既是市长，有许多事可以去管，为什么正经事不管，竟管到我们妇女理发整容的事上来了，真是笑话！”理发师从旁低声补充说：“来理发的是×军长太太，是小店的经常主顾。

今天来店烫发，小店已申明最近市政府有命令禁止烫发，不敢违令，她执意要烫，说如有问题，由她负责。小店不敢违拗，只好烫了。”王秉丞听说是军长夫人，庭外停有人力车，还有两个穿便衣的彪形大汉，默然的向庭内观望，觉得僵持下去，不好收场，只得暂不宣布罚款或禁止营业，悻悻然走了。

1944年5月，日军由湘北向南进军，谋打通粤汉铁路。长沙市紧急疏散，市政府奉令撤离市区。王秉丞派夫将市政府全部档案、图册、物资及尚未交市库的税款若干麻袋，装载民船，调市府直属警察中队枪兵押运至宁乡大屯营，选择一祠堂僻室，将档案图籍安置于内，外面砌砖封闭粉饰，表面很难发现，留档案保管员柳克勤寄居民家负责看守。他害怕土匪劫取市政府大印或有其它意外，诡称铜印沿途不慎失落水中，雇人多次打捞无获，另仿刻木印一颗备用。他还密令少数亲信暗中携带财物疏散回湘潭原籍，自己当众故意生气说，这些人在危难时节各自一走了事，辜负他的好意，使他受累。然后他让剩下的大部分职工自动离散，不给任何遣散费，由其自谋生活，只留下得力职员和亲信，带领直属警察中队枪兵，退回到长沙县麻田地区停留月余。在此期间，他派人到谷山食盐供应管理机构，伪称长沙市难民集中麻田，食盐困难，骗领食盐十余石。当时盐价昂贵，一担盐可换数十石粮食，这枪盐全部为其占有。

1944年7月，衡阳市沦陷后，日军长驱直入，攻占湖南境内粤汉铁路沿线，长沙市已无收复可能。王秉丞率其少数亲信及市政府全体警察中队枪兵退至新化，仍以流亡长沙市政府名义，驻扎于某矿主大宅。任其士兵四出骚扰，自己则深居简出，终日以酒肴麻将自娱。他由麻田撤退时，曾枪毙一名卷带公款潜逃的亲信。逃跑者原已逃离了王秉丞势力范围，后为国民党驻兵所获，疑是汉奸，逃跑者说明是流亡市政府属员，驻

兵乃送王秉丞处理。王深恨之，就他危及全体职员和士兵的生活，决定枪毙。虽经多数士绅及当地要人为之讨保，请免死刑，均无效。执行枪毙前，备有酒肉供犯人刑前饮食，犯人嚎啕痛哭，捶胸跺足，深悔不该卷款潜逃而落此下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王秉丞率逃亡人员又回到麻田，召集疏散职工，派人至宁乡大屯营启封密室档案图籍，取出市政府铜印，匆忙赶回长沙市，计划仍旧履行市长职务，接管日伪市政府政权及物资。但第九战区已奉令撤销。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已调离湖南，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吴奇伟为湖南省主席。吴奇伟已在重庆任李毓九为长沙市长。王秉丞所保存的长沙市政府铜印因中央铸印局已另铸制，只能截角缴销。他所保存的档案、图籍，也只好移交新任市长。

李 毓 九

李毓九是抗日战争胜利，长沙市光复后出任市长的。任期自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止，为期共计9个月。他是宁远人，西欧留学生，曾在安徽省立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后投身政界，被聘为三青团顾问。

李毓九以前并未在湖南工作过，他是抗日胜利后依靠三青团政治背景在重庆活动回湘任长沙市长的。当时长沙市因受战争的破坏，正是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百弊待除之际，有许多市政需要从头做起。全市人民引领相望，希望有一位精明干练的市长主持市政。李毓九自视为名流学者，不同凡俗。当时币值未继续膨胀，解放战争尚未爆发，人民渴望和平建设，在他任期内，如有作为，是可能做出一些成绩的。但李毓九任职9个月内，竟未颁布一项有关城市建设的重要政策和法令，未办

一项可观的城市建设工程。战后，长沙市机关增多，房屋缺乏，他租赁韭菜园一栋私房办公，竟不规划自建市政府办公房屋。

李毓九单人匹马从重庆来长任市长，他早已内定的各局局长尚未从各方面到齐，所有职员都是他到长沙市后由各方推荐，或自请投效而来。他心目中的市政府组织很大，用人需多，一般都能录用，并无德才考核的标准。但对局长人选，则甚注意资历，以留学生为选择对象。他未待沦陷前的市长移交，就正式以政府名义向外行文或发号施令，他和他的主要助手都认为沦陷前的市政府已不存在，已经领用国家铸印局新铸的长沙市政府铜印，就可以发号施令了。

新市长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市政府机构，恢复和平时期的正常秩序。人民从各方面归来，纷纷兴建房屋，机关也需要扩建和重建，如何配合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安排城市重建的规划，是新市长的主要课题。但李毓九似对城市建设规划不甚重视，对这方面毫无行动计划；对新的市政府组织，则认为规模尽可能大些，以显示他这一届市长与众不同。他仿照国内外各新型城市政权机构的组织概况，组成一个包括有秘书处、会计处、统计处、参事室及民政、工务、财政、教育、卫生、粮食、地政、军事等局的市政府，机构比历届长沙市政府都大，这与当时长沙市仅只30余万人口，无现代化工业基础，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他所任命的留学生局长中，有的虽确有真才实学，但由于李毓九只着意于做官，无心于事业，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更何况其中有些人徒有虚名而已。

抗日胜利，湖南省政府由湘南迁回长沙。胜利前我在省政府洪江行署任地政督导，胜利后由洪江乘舟返回长沙，将赴省地政局报到。途经沅陵，适逢李毓九由渝来湘，亦在沅陵逗留。我与李毓九原不相识，冒昧往见，希望有机会重返长沙市

政府主管地政。承他允诺委以市地政局筹备员名义随他到任。我在其领导下工作三月，接管并筹备成立了市地政局。后他派钟某任市地政局长，改派我为参事。我遂辞职仍回湖南省地政局任第三科科长，他并未挽留。不久，他曾来省地政局查询有关业务政策，与我相遇。我系主办，负责招待解释，我对他很尊敬，他态度诚恳地向我表示了歉意。

李毓九性情平和，言行稳重，较易接近。在他任内组织了长沙市临时参议会，这是战后长沙市的首届所谓民主机构。他亲自出马联系协商邀请各方人士。他是三青团方面的人，在坚持贯彻三青团应占有的席位后，完满的应付了各方面的关系，未暴露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的矛盾。他有一定的政治外交手腕。

1946年湖南省政府改组，主席吴奇伟另有任命，王东原继任。王东原是依靠陈诚发迹的，陈诚是三青团的核心领导人物，李毓九又以三青团政治背景于1946年5月爬上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职位，以往建设厅长大多是工程技术专家，惟李毓九例外。

1948年程潜回湘任主席，王东原调离湖南，李毓九随同王东原离开湖南去台湾。传闻李曾任台湾农林公司董事长，五十年代殁于台湾。

汪 浩

汪浩，别号一苇，澧县人，继李毓九后任长沙市长，任期自1946年5月至1947年12月，共任职一年零八个月。汪曾留学苏联，加入共产党组织，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于浙江被捕，叛变投敌，致使地下组织暴露，损失惨重。从此他投靠国民党，加入CC，安置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任研究

员。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是培植国民党政府中级土地行政官吏的，招收大学毕业生。攻读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毕业后，派往全国各地担任土地行政工作。地政系的教授或研究员则按资历轮流出任中央地政署长、地政司长、各省地政局长，以及其它有关执行国民党土地政策的高级领导职务。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系主任肖铮，是国民党CC集团分工抓土地问题的头目和土地政策决策人，汪浩以后从政的主要靠山即是肖铮。凡属他领导下主管地政业务人选，均须秉肖铮旨意任用地政系同学，这是他们地政系教授或研究员出任要职时的守则。

汪浩曾由地政系出任浙江省平湖地政实验县县长，湖北省地政局局长，抗日初期任江苏省第一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42年恢复成立湖南省地政局，汪浩任局长。

1946年王东原主湘，汪浩企图依靠CC集团力量活动以省政府委员身份并任省地政局长。王东原与CC集团关系一般，未同意汪浩任省政府委员，却认为汪浩是地政专家，城市建设与地政关系较多，遂任汪浩为长沙市长。市长较省地政局更有实权，汪浩热衷权利，宁愿放弃省地政局职位甘当长沙市长。

汪浩以地政专家身份出任市长。上台初，确想做出些成绩，以示不同于一般，借以向肖铮表现才能，谋于将来获更高位置。

他接任后，将李毓九所订制的市政府编制予以紧缩，除保留工务、地政两局外，将原设各处、局一律改为科、室，人员亦有紧缩，使市政机构符合中等城市水平。

他组织人力，将市区内战时堆积的垃圾和瓦砾运往郊区填塞洼地，使城市清洁卫生有了改观，对预防疾病的感染有好

处。

他多次召开市区建设规划会议，邀约有关专家参看战时所拟订的新市区建设规划草案，座谈有无补充修改意见和探讨实施方案。虽近乎空谈，但显出他对这方面的重视。

他劳而无功地浪费了不少人力，在地籍图上按照城市道路扩建规划标示红线，统计全市按规划修筑道路所需征用土地面积及新的道路筑成后，两侧不适宜使用的畸零残地，以便提供研究处理方案。

他对市区地价进行了调查，按城市土地位置条件，划成若干等级，估定每等标准地价，开征城市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虽然后来法币急剧贬值，但地价等级和标准地价确定后，税收是可以按物价增涨比率调整征收的。

长沙市的公私土地在中日战前和战时都陆续办了产权登记，仅只政府有案可查，私人未发产权凭证。至汪浩任内，始雇有临时工作人员，缮写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状，载明公私土地坐落位置、经界、图形、面积，所有者姓名或名称，保护了当时的土地所有制度。

他还命市财政科筹拨公款，联系市商会招募私股，筹备成立了市银行。市银行代理国库，经营银行信贷储汇业务，活跃市场金融，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

汪浩任期中最有利的条件是拥有大量美援救济物资，但掌握运用大多不当。其中运用较适当者，是在市区范围内择定北区杜家山龙洞坡，南区扫把塘打靶场和西区岳麓山湖南大学附近地区，兴建了数百间平民住宅。除将湖南大学附近所建平民住宅拨交湖南大学解决教职工复员住宅需要外，其余龙洞坡和打靶场两处平民住宅，是事先公告由需房人申请承租，按申请人姓名编号公开抽签决定租户的。这解决了一部分复员归来的无房户的住房问题。

他还分配救济物资，补助各公私小学校建筑校舍和添置教学课桌经费。

他曾计划以工代赈，拨付大量救济物资，兴修沿江大道。当时沿江岸一带并无正式建筑物，唯有许多逃灾荒的或由农村流入城市谋生的苦力搭的临时棚屋。开始修路时，已配合军警和修路工人，强行拆除了一部分，并破土兴工。但沿江水陆联运吞吐量不大，一般是用肩挑、背负，或使用土车推送，汽车运输极少。修筑沿江宽敞大道，在当时尚非迫切急需。筑成后管理上也感困难，在国民经济临近崩溃时期，灾民和赤贫苦力在沿江搭棚屋暂时栖身者无处迁徙。因此形成今日拆，明天又搭；这边拆，迁往那边搭；白天拆了，晚上又搭起。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无处安身。市内荒地虽有，均有主权，守卫甚严，不许随意占用，因此只能沿江搭棚，拆棚时他们并不聚众闹事，只是苦苦哀求。因此在修筑沿江大道时，棚屋无法扫清，以致开始筑路时，兴师动众，强行拆除棚屋，出布告、登报刊、摄照片，大吹大擂。以后则时而动工，时而停工，最后无形中止，悄悄收兵，不了了之。

汪浩曾应允新闻界要求，考虑分配一定数量救济物资面粉，以补助报社建筑房屋。这却引起一些报人群起要求，甚至有人借题要挟。汪浩害怕他们揭发问题，影响官誉和官位，只好听由他们新闻记者联合会自行造册，自己拟定分配数额，不加审核批准，送请救济署照发。结果不管是官办或民办报纸，不论是大报或小报，不查证是否有名无实的通讯社组织，都分别发给面粉一吨至数吨不等。其中除少数公营报社有财会监督制度，能将面粉确实用于修建房屋外，其余大部分报社或通讯社，名义上是修建了报社或通讯社的房屋，实际上是修建了私人房屋。有的在自己私房门上，挂上一块报社或通讯社招牌，以供救济署查验；甚至有的根本未建房，将救济物资落入私人

腰包。如报痞宋十回即以通讯社名义，领到了面粉，在文星桥修建了一栋私房。他的通讯社只他一人，他一人代表了通讯社。解放后，才知宋十回是藏在新闻界的特务分子，已被镇压，房屋产权已判处没收归公。

1947年，全面普选所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督委员，汪浩指定市政府主任秘书周自曾代表他本人主持选举事务。市政府从各科室内抽调得力职员，组成选举事务所，主办普选工作。各区相应的成立了选举站，设置选民集中投票箱。选举前一天，凡具有选举权的人，都发给一张选举票，动员选民届时前往选举站集中投票。投票箱当众密封，加盖大印封条。各选举场都有人维持秩序，监督和指导选民投票，防止意外。选举场附近，有各候选人的支持者，在游说拉票，竟有一些不是圈定的候选人，也在痴心徒劳地活动拉票。投票后，翌日，由党、团、行政及各有关公法团体各派代表监督启封票箱，验票、唱票、计算选举结果，然后由到场代表盖章证明选举结果予以公布，并在报上刊登公告。表面上是慎重、认真、严肃的，事实上却暗中做了手脚：各圈定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是由选举事务所在投票前预先派个“忠实可靠”的人，躲藏在密室内填好，于开票前，暗中塞入票箱内。这在当时大多数市民并不关心选举结果，许多人根本未参加选举投票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做到瞒天过海的。选举事务所的负责人和参加监选的党、团、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明白此中秘密。

汪浩本人也想竞选立法委员，曾派亲信回澧县原籍试行游说串联，并向其中央靠山肖铮写信，请他支援，由CC集团出面推荐，圈定他为候选人。因他原籍竞选对象的政治背景较他强，未获成功。

汪浩在市政府任内有贪污，但手段比较隐蔽。他在任省地政局长时，害怕部下攻击他的财政不公开，便采取变相收买办

法，允许科室主管的夫人在所属单位挂名吃缺。汪手下管财经要害部门的，都是同乡亲戚，其中以至亲刘姓居多，也最居重要。财政科长韩某，是他同乡，又是他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为人精明，善于心计。汪浩很器重他，许多重大私事，包括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都和他密商，汪浩至亲刘氏叔侄都服从他的指挥。他发表的意见，基本上是汪浩的原旨，外界想和汪浩联系和商量问题，可以先和他接触，初步获得要领。他忠于汪浩，主动为汪浩注意财源。

汪浩本人经常和黄登、韩中石、罗德钰等人往来，他们都是CC在湖南地区的主要人物，在长沙市有权有势。他们之间，常相聚谈，既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勾当，在经济上，也有互相阴谋合作舞弊的活动。汪浩在营盘街购置了两栋西式公馆。前一栋是他任省地政局长时与他堂弟汪盛苞合伙购置的，规模较小。后购一栋，建筑质量更好，是栋具有宽敞庭院的别墅。这栋房屋他说是黄登廉价买进，原价转让给他的。真实来源不可得知。黄登后来当上了市银行行长，得力于汪浩的支持。

1947年12月，湖南省政府免除汪浩长沙市长职务，派蒋琨继任。汪浩免职后去南京任肖铮所创办的私立建国法政学院教务长，南京解放后回长沙赋闲。

蒋 琨

蒋琨，别号静逸，继汪浩后任长沙市长，任期自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止，共15个月。蒋琨，邵阳人，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大学四年，研究院攻读经济博士学位二年。出国前，已娶妻，但在法国又娶法女，育有一子，其法籍的妻和子均未携归。解放后，其法籍儿子与蒋琨有书信联系，思回中

国，1967年蒋琨去世后，再无来信。

蒋琨回国，曾任国民党政府军需学校教官，与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一些官僚关系较好。王东原任湖南省主席时，蒋琨任省田粮处处长。省田粮处业务直属中央管辖，处长由中央直接任免。蒋琨曾随王东原赴台湾考察，行前未请示中央，遂因擅离职守，被免去职务。但蒋琨去台湾系王东原命其随行，因此，王东原调他任长沙市长，以弥补他的损失。

汪浩被免除市长职务，未能迅即办理移交，但蒋琨通情达理，告知汪浩，如移交有困难，决不留难。并同意接任后拨付一笔经费，留供汪浩作移交后清理未了事宜之用。

蒋琨办事果断有魄力，善于团结利用地方势力，并能察言观色，揣摩上级意图，投其所好，以巩固其职位。

当时长沙市以参议长周翰为首，纠集各方有实力、有地位的人物，换贴拜把，结为盟兄弟，相互依靠，相互利用，意图将来操纵全市选举，捧周翰竞选省参议员，争取省参议长席位，大家也可以夤缘封官任职。这些人中，包括有国民党市党部副书记，省会警察局督察长，市参议会参议员以及市政府个别科长、视察和督学等人。这种结盟组织，蒋琨是了解和支持的，并曾授意和鼓励其个别科长和视察参加，借以通过他们结盟兄弟的团体力量，支持其政治措施。这些盟兄弟中的个人要求和集体活动，如需蒋琨资助时，蒋琨也尽力予以热情支授。

1947年，程潜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落选后，回湘任省主席，力求施泽于民。蒋琨与程潜关系不深，唯恐位置难保，希望能做出显著成绩，以巩固职位。因此，在程潜的指示和支持下，具体负责扩建黄兴北路和蔡锷北路两条干线，一年内完成了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此成就，确是不易。特别是先锋厅至黄兴南路一段，中经八角亭、司门口，是全市商业繁荣中

心区，关系商贾利益，阻力较大，群众都以为难于办通。其实当时修辟此干线，也还是有些有利条件的。程潜在湘，声望较高，令出必行，无人敢逆其意行事。当时商界确曾有人联名请求缓修黄兴北路，受到程潜的批驳，以后无人敢再提异议了。而且八角亭一带的土地，大部属于福建同乡会公产，原有商店多是高价租地建房，拆让马路时所占用的土地，对他们并无损失，反可因路面扩宽，对商业经营更为有利。当时筑路，实际并未支付土地补偿费，而是筑成路后，对沿马路两侧土地，临街深浅程度，按不同比例征收土地受益费，将所收受益费，用以补偿征用土地地价，受益费总额，略高于地价补充总额。

黄兴北路和蔡锷北路修筑完成后，蒋琨又迎合程潜迷信心理，在蔡锷北路与中山马路交界处，建一四柱红漆牌坊（解放后，因不利交通，已拆除）。同时在蔡锷路北端与留芳里交界地，修建一座玄帝宫。根据程潜阴阳五行玄学观测，长沙市地理，南高北低，蔡锷路干线位于市区中心，贵通南北，火气正旺（南方丙丁火），此所以招致“文夕大火”和中日战争的灾难，干道中修建牌坊和北端建立玄帝宫，是以镇压刀兵火灾的。

他又秉承程潜意旨，派人满城寻找已经遗弃的前清衙门的石狮，将其移置于省政府和省参议会门前以壮政权威仪。据说石狮有雄雌之别，不可弄错。雌雄差别，程潜可以识别，须请其亲自鉴定。

长沙市是一个私营商业和手工业众多的城市。当时通货日益膨胀，雇工和手工业工人工资无形贬值，特别是泥木业劳资纠纷突出。蒋琨与工商各界会商决定，按中日战前，1938年行情，泥木工每日工资为五角六分，当时可购大米七升（每升价八分），改用实物计发工资，每日大米七升，按大米当日牌价换发给法币。此种新的工资发放办法，除政府机关和公营企事

业外，其他各行各业，均可参照办理。

蒋琨于1948年集资正式成立自来水公司筹备处，汇款东北某钢厂购买无缝钢管，以供铺设自来水主要管道。由于战争影响，财源困难，进度缓慢。

1949年初，国共北京和谈破裂，南京解放，武汉市解放在即。程潜领导下的湖南已脱离中央独立自主，应付大局，财政最关重要，程潜认为蒋琨有才，遂调他升任省财政厅厅长。

蒋升任财政厅厅长前，已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任省财政厅厅长后，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响应和平起义。一些拥护和平起义的人士经常在戡子桥蒋琨私宅聚会密谈。蒋琨在负责筹措和平起义经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蒋琨乐观豪放，不计较一时一刻得失。解放军初入城，无房驻扎，由房屋调拨部门临时借用市内富户房屋分配使用，蒋琨戡子桥公馆亦在借用之列。干部前往联系时，蒋琨毫无吝色，立即收拾搬迁，并请联系借房干部检验他所携出的行李，申明屋内家具用物一概未动，留供解放军使用。

解放后，蒋琨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1年病故。

陈 迪 光

陈迪光，原名介石，继蒋琨后任长沙市长，自1949年3月至同年7月止为期限5个月。他是浏阳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长郡中学及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也曾在长沙主编报纸，后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何键主湘时，省党部分甲乙两派，甲派以张炯为首，拥护国民党中央；乙派为地方派，以刘岳厚为首，为割据湖南的何键所御用。陈倾向甲派。

陈迪光出任长沙市长前，曾任行政督察专员，为人心性平

和，无耻高气扬的官僚气派，有儒家书生本色，并有文名。

陈任市长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彻底崩溃前夕，武汉市已解放，白崇禧所率领的桂系主力部队已退至湖南境内。白崇禧本人亦坐镇长沙市。中统军统特务密布市区，公开逮捕和暗杀进步人士，制造谣言，扰乱人心。长沙市许多报纸均刊载所谓“沦陷区见闻——武汉来客谈”的文章。作者署名钱江湖，自称是武汉市解放后逃出来的武汉市社会局科长，他污蔑武汉市解放后，共产党拆散家庭，实行共产共妻，没收私人财产，公开买卖鸦片烟，人民生活痛苦难言，长沙市居民受其骗，人心惶惶。

此时，陈迪光市长却镇定自如，政治开明，言行谨慎，也不干预市政府员工的思想活动。他明知市政府内已有个别共产党员，并有活动，但他视若罔闻，听之任之。陈接任不久，在一次市政府科局长会议上，凭其过去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嗅觉，发表意见说：“揣测领公意图，以国民党老前辈和湖南家长身份，号召湖南军人大团结，将蓄集力量，保境安民，争取光荣的和平，借以避免战事在湖南境内产生，勿使湖南民众遭受战争的灾害。”

随后，长沙市政府内已出现了进步组织“康乐会”的活动，公开集会，教年青职工集体学扭秧歌，教唱《王大娘补锅》等新歌词，并有一天下午公然停止办公，在市政府坪地开会表演，恭请陈迪光市长参观。陈居然出席，默默观看至宣布散会为止。面部无表情，既不表示赞许，也不表示反对。

时局越来越紧张，白崇禧除派一批军队开赴湘乡、宁乡一带进剿姜亚勋湘中一支队外，并加紧布置特务监视进步人士的活动。白崇禧在一次全市政警军首脑会议上警告说：“如果你们想看看共产党的秧歌舞并不困难，现在市政府机关内就有看的。”陈迪光听了如芒刺背，吓出一身汗。散会后，匆忙赶回

市政府，召来几位跳秧歌舞的积极分子叮嘱说：“你们青年好活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识时务，可以收敛一下，不要做得太显眼了。”并将白崇禧会上所讲的话告知他们。顿时市政府“康乐会”的活动就偃旗息鼓，不再公开化了。

在陈迪光免去市长职前一个月，即1949年6月，他又在一次市政府局科长会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据他观测，一方面大军压境势不可挡，长沙市四面受敌，无险可守，白崇禧军队必将撤退至衡宝一线以求决战。此时市区已无驻兵，客军尚未进城，长沙市必然会出现散兵游勇和无赖之徒趁火打劫，骚扰是难免的。他建议市政府职工应该有一个自救委员会的组织，包括市税捐处员工和市直属警察中队官兵在内，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和物资财源。从积极方面说，可以维持市区治安和秩序；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可以团结员工，加强自卫能力，保护档案财产和员工家属的生命安全。他暗示可由市政府科局长出面，召集三个单位的员工官兵全体大会，讨论组织。他自己则置身事外，并不出面。

在他的示意下，社会科长彭中藩出来召开了一次包括以上三个单位的员工官兵全体大会，选举了市政府和税捐处的职员和工人代表各二人，市直属警察中队官兵各一人，成立了长沙市员工自救委员会的组织。代表们公推我任主任委员，军事科长黄定皮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财粮、保卫三股，并拟订了非常时期的工作细则。但陈迪光对他自己所设想成立的市政府员工自救会的工作，从未再进一步作具体指示，因长沙市并未如他所料，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1949年7月，白崇禧在率其部队撤离长沙前，强迫程潜免除了陈迪光市长职务，另派军统骨干任建鹏为长沙市长。陈迪光离职后，任建鹏并未正式到职，至1949年8月，长沙市和平解放，市政府员工“自救会”并未发生任何作用，就自行消失了。

陈迪光是处于特殊时期出任长沙市长的，他在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名气的。他是文人，在中文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他是程潜器重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与上层社会人物联系较广泛，政治敏感性强，淡泊名位，来去无牵挂，有一种超然的风度，这是他可取之处。但我对他另有一种印象，即温情主义，人情味重，应付各方面有些迁就人情，待人待事平平淡淡，无所作为，有点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这也许是他静中寓动、不露锋芒之处。我与他相交不深，他对我工作上无所要求，仅交办几件朋友托他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而已。

陈迪光免去市长职后，曾就任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7年反右时，曾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前病故。

任 建 鹏

任建鹏继陈迪光后任长沙市长，任期限只有1949年7月一个月。

任建鹏，望城县靖港人，曾任国民党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警察总队队长。武汉市未解放前，任武汉市警察局汉口分局局长，是军统骨干。他与桂系军阀集团并非一体，但双方反共的立场一致，白崇禧在撤退前，将其安置为长沙市长，希望借重军统势力以反共。但任建鹏并不愿作替死鬼，与白崇禧均先后逃离长沙市。

公布任建鹏为长沙市长后，陈迪光匆忙布置移交，未等候新任接收，就迅即离开了市政府。约一周后，任建鹏才来市政府一转，来时并未携带随从，亦未布置办理移交接收手续，仅只约见原任局科长，相互介绍，略事应酬，嘱各安心工作。当即由原任主任秘书布置召开包括市税捐处和市属警察中队全体

人员大会，请其训话。他态度从容，说话时一本正经。散会后，就独自离开市府走了。以后再未露面。实际他并不是真来接市长职的，这次来，寓有私人打算，他以市长身份，向长沙市银行借支了数百银元，作为旅费，乘飞机逃离了长沙。

任建鹏虽然并未正式履行市长职务，没有以市政府名义办过一件事，但因他是军统干将，先声夺人，长沙市人民都对他怀有恐怖心情，进步人士，都警惕地防备着顽固势力将作垂死挣扎。

不久，程潜将省主席职位让给陈明仁。陈明仁在一次省、市军政机关公务人员联合纪念周会上发表讲演，嘱全体省市公务员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尽忠职守，不要担心时局变化。“应付大局，山人自有锦囊妙计”。这才使形势有了突然转变。他是半公开表示，湖南在他的领导下是会走和平解放道路的。

1949年8月1日，陈明仁任命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政工处长吴博夫为长沙市长，任建鹏挂名市长职务自然消失。

任建鹏最后逃往台湾，据闻在台湾台北市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职。

吴 博 夫

吴博夫于1949年8月1日接任长沙市长。8月5日湖南省政府和平起义，长沙市解放。长沙市解放后，市人民委员会尚未正式组建，吴博夫仍以长沙市临时市政府名义，维持市区正常秩序，办理迎解，准备移交工作。至9月23日正式移交清楚，计解放前后共任市长职53天。他是长沙市新旧政权过渡时期的市长。

吴博夫，湘阴人，雅礼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有一定的中、英文基础。论其学历似不应走他以

后踏入社会所走的道路。他是为名利、权势所迷惑，而走上歧路的。他自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毕业后，仅只在铁路上当过6个月见习生，因羡慕国民党军官挂斜皮带，穿刺马靴神气。就跟着同乡、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军官鄧悌从军。鄧悌是复兴社头目之一，于1934年介绍吴博夫加入复兴社。吴博夫是为谋取升任大官而加入复兴社的，后来历任复兴社中央组织处助理员、苏州分社助理书记。1946年任国民党七十一军政工处长（后仿美编制改称新闻处长），四平街《大众日报》社社长，曾宣传鼓动支持陈明仁在四平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顽固对抗。1948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新闻处长。1949年3月随国民党第一兵团撤退到长沙，任第一兵团少将政工处长，兼任长沙市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负责检查新闻报刊，监视群众言论集会。

我初不识吴博夫，至其任长沙市长时，始知同乡（汨罗与湘阴原是一县），知其家世。他为人直心快，语言比较快率，行动欠深沉，欠缺政治家从容稳重的风度和修养。

当时，全国解放已成大势所趋。吴博夫在陈明仁部队中工作多年，为陈明仁所信任，因能遵照陈明仁指示办事，因而参加了和平起义。据他自己说：陈明仁任命他为市长前，曾召他谈话，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表态说，从道义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一切以司令官的意志为意志，一切行动听司令官指挥。陈明仁明了他的个性，认为可以大胆信任，不致坏事。他是老牌复兴社员，历任部队政工处长，因与反共政治人物有较深关系，由他任市长，迷惑一些反动派，可代表陈明仁去敷衍那些蒋介石派来破坏和平起义的要人，如国防部新闻处长邓文仪，高级将领黄杰等。吴博夫在就任长沙市长时，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一切遵照陈明仁省主席的指挥办事。”

吴博夫在起义过程中，做了以下几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一) 由他协助查明保释被扣押的进步人士如赵可夫、段梦晖、刘运世、龙汉河、钟振龙等人；

(二) 和人民一道参加迎解活动，在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市民和起义军政人员的情绪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三) 在迎解委员会领导下，将市政府档案、文书、财产、武器弹药及市政府所属机关在职员工等，编造出清册，完整的移交长沙人民委员会接收。

解放初，新任人民政府市长阎子祥第一次来长沙市临时政府会晤吴博夫，联系了解情况。吴博夫见面的第一句话说：

“我们国民党员太不争气，八百万精兵全部输光，只好让位给你们。希望在你们的领导下，国家命运能有好转。”

解放初，吴博夫被人民政府安排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事，以后军政委员会裁撤，改调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52年，适逢一友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有问题的女人刘正诚，她是刘戡的胞妹。刘戡是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于解放战争中，在陕北全军覆没阵亡。吴博夫与刘正诚经常相会密谈。刘正诚告知吴博夫：她是台湾做情报工作的，希望吴博夫能供她一些有关人民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吴博夫告诉刘正诚，他想去台湾，要求刘正诚代他弄一张入台证，结果未能如愿。

1959年，吴博夫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罪恶事实是一贯思想反动，破坏各项中心运动，加入了中国海陆空军总部特务组织，与特务分子刘正诚勾结，搜集我方军政情报。

1978年，根据释放县团级罪犯条例，吴博夫获宽释，重新安排为省参事室秘书。

民国年间湘西苗民“革屯”斗争

伍新福

清代乾嘉苗民起义后，由凤凰厅同知傅鼎“总理边务”，在湘西“苗疆”举办“苗防屯政”。他先后于凤凰、乾州（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麻阳、泸溪、保靖、古丈坪（今古丈县）七厅县，均丈和收缴苗民田土共15万余亩，作为“屯田”。其中分授屯丁领耕5万余亩，所剩10万多亩，均召佃收租，以充“苗兵”工食钱粮及地方军政各项开支。由此产生了湘西苗族地区的“屯田”和“屯租”制度。

“屯租”剥削额是相当高的。从定额看，每亩“屯田”交纳租谷一石左右。湘西山多地瘠，粮食产量很低。据统计，直至1949年，湘西自治州所辖各县，粮食平均亩产为214斤。所谓一石，按习惯为120斤。可见，“屯租”定额平均在收获量的50—60%以上。除交纳规定的额租外，还要加挑运盘费，斗面折耗，屯官仓丁的“堆尖”、“踢斛”等陋规，浮收多征，“屯田”佃户所受的剥削就更重。湘西苗族地区流传的一首《屯租歌》云：

朝耕土，夕耕土，年年月月欠屯租；
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粮钱。
一年四季替人锄，苗家没有一块土；
一年四季替人耕，苗家没有地安身。

这正是“屯租”剥削下的苗族人民悲惨状况的真实写

照。

民国取代清朝之后，不仅全盘承袭了清代在湘西“苗疆”实行的“屯租”剥削制度和各种陈规陋习，而且更是弊端丛生。民国初，在湘西设“电务经理处”，主持有屯七县“屯租”的催征和收支。然迭经“护国”、“护法”和“靖国”之役，湘西群雄并起，地方军阀混战不休，原有关于“屯务”的各种制度、设施均废弛不顾，但“屯田”佃户却依然照旧纳租。地方军阀将其攫为己有，作养军自立的基础。而大小屯官苗弁和区乡官吏，则乘机竞相浮收滥征，中饱私囊。什么“斛面谷”、“地皮谷”、“马口”、“裤裆谷”等等，名目繁多。据记载：“自民国成立，军阀专横，屯政之害，十倍于前”。湖南省主席何健也不得不承认：“自清傅鼎设屯分防，至今二百年，积久弊生，毋庸讳饰。逮入民国，时变纷纭，未遑整理”，“一般收租官吏，因距省城很远，交通不便，陋习相沿，巧立名目，以为剥削苗民计……屯田制度，积弊甚深，久为民病。”

因不堪“屯租”剥削压榨，民国年间湘西苗族人民进行了多次英勇的反抗斗争，最后掀起大规模的“革屯”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废屯升科”，废除了“屯田”和“屯租”制度。

一、民国初年的反抗斗争

梁国昌、石生富“抗屯”。民国四、五年(1915—1916)，保靖县水旱灾害连年，田土荒欠，屯租无出，屡邀上峰减免，不仅未允，反而派出公差，造门催逼。据记载：“被绳缚者有之，受吊打者亦有之”，“受害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激动众怒”。鸡屎寨苗首梁国昌、排河苗首石生富等，因此相约

揭竿而起。保靖各苗寨，一倡百和，永绥苗寨亦多响应。梁国昌、石生官等迅速聚众数千人，多次攻打碉卡、城垣，杀伤许多屯苗官兵，抗交屯租数年。地方军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平息。后来，以重金购买苗奸，从中间离起义队伍。梁国昌为其女婿“反水”杀害，石生官亦死于苗奸之手，所部溃散，“抗屯”未果，屯租剥削依然如故。

龙庭九“抗租”、“灾捐”。民国八、九年（1919—1920），古丈县因水旱凶灾，山土田亩均有种无收，苗民困苦不堪，无力纳租，屡请减免不允。当局仍严令逼交租谷，并且催缴苛捐杂税，苗民怨声载道。九龙洞苗首龙庭九，力大强悍，精武术、善医药，远近闻名。他当即挺身而出，组织苗民抗租、抗捐。据记载，“历时不久，古丈苗民几乎有三分之二愿听庭九领导”，而“附和参加者，几达万人”。苗民义军在庭九率领下，屡挫官兵，“县政府的一切政令不能行使苗区者数年”。地方当局调集数县兵力，设总指挥统一“清剿”。最后，官兵借助机枪火力优势，进攻九龙洞，龙庭九不幸中弹身亡。各寨苗民被迫归降。

龙庭九“抗租”、“抗捐”斗争虽遭失败，但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将“数年欠租，一律豁免，桐茶杂税，都不成立。”

二、大革命时期的“抗租”、“反屯”

大革命时期，在党组织领导下，湘西有屯七县，掀起以抗交“屯租”、夺回“屯田”为中心的农民运动。

1924年12月，中共麻阳县特别支部成立，孙家信为书记，旋风寨苗民龙绪基、杨柳坡苗民龙宏杰等为特别支部委员，发动农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苗、汉“屯田”佃户要求收回“屯田”的情绪逐步高涨。1925年秋，特别支部一

面请在省城的党的外围组织“麻阳旅省学友会”和“麻阳新民社”，支持收回“屯田”，一面发动农会组织抗交“屯租”。

“旅省学友会”和“新民社”派黄万亿等向省议会和省长公署申请废除“屯田”，未获结果。于是印制“快邮代电”，申述废屯理由，在有屯七县广为散发。苗、汉农民“反屯”情绪更日益激烈。

1926年，陈渠珍派屯务处把总徐章甫到麻阳江口勒收“屯租”。江口农会与之开展说理斗争。附近各村寨农协会员闻讯，纷纷手持锄头、木棒、长矛赶来，将徐章甫团团围住。徐章甫依仗陈渠珍的权势，态度横蛮，激起农民群众的愤怒，当即将他捆绑，挂牌送进县城游街。沿途一万多苗、汉农民涌进县城，要求县府将徐章甫枪毙。县长马少援进行包庇，阻止公审，并以“关押待办”为名，暗地放归凤凰。陈渠珍受此教训，当年不敢再派人下乡逼交“屯租”。

其他有屯各县，甫、汉农民也曾不同程度的发动起来，展开了“抗租”、“反屯”运动。例如，1927年，乾城县（原乾州厅）特别党部和农协，曾利用赶场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讲“耕者有其田”，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会将傅公祠中的傅鼎画像焚毁，并抬出傅鼎塑像游街，然后砸碎。同年，共产党员喻德高以特派员身份来到永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运动，提出推翻“屯防”，革除“屯租”的口号，并带领苗、汉群众驱逐了催征“屯租”的人员。

湘西苗族人民所不断掀起的这种反对“屯田”、反抗“屯租”的斗争，特别是党组织深入苗族地区所发动的农民运动，为三十年代“革屯”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广大经受斗争考验、富于革命传统的苗族农民成为了最后推翻“屯田”制度的主力军。

三、“永绥事变”和“革屯”

运动的兴起

1933—1935年，永绥县连年遭遇水旱灾害，“屯租无出”。陈渠珍却派督征人员和屯务军来永绥“催征积年尾欠”，并“预征当年冬粮和第二年的租谷”，致使“绥民求生不得”，群众抗租情绪急剧高涨。永绥已卸职的屯务军指挥宋濂泉，由于“屯租”分配之争，与陈渠珍积怨甚深，于是便利用群众情绪，举起“反陈抗租”旗帜。陈渠珍决心武力解决，遂派屯务军营长刘鹤卿率两个大队开抵永绥麻栗场。

1936年6月24日，宋濂泉集合旧部和地方武装，组成“反陈抗屯军”，围歼了陈渠珍派驻绥城的屯务军中队，随即开赴麻栗场，堵击刘鹤卿部。沿途许多欠受“屯租”之苦的苗民，自发地拿起马刀、梭标前来助战，人数聚集达数千之多。与此同时，宋濂泉又派被解职的屯务军中队长董平，率旧部和屯户，从县城出发，进攻驻珥诺的屯务大队刘旭部。刘旭突围，奔刘鹤卿，合兵扼守麻栗场。

刘鹤卿一面凭借麻栗场高地，以十挺机枪封锁道路，一面向陈渠珍告警求援。陈急电各县，调集屯务军，并亲临排碧部署，拟分三路围剿宋濂泉的“反陈抗屯军”。宋部人数虽众，但系临时凑合，战斗力不强，面临被歼的危险。何键和兼湘西绥靖处长的二十八军军长陶广，恐陈渠珍乘机消除异己，扩大势力，暗助宋濂泉，电令双方停战撤兵，听候派员调处。陈渠珍自知何键不能容己，处境被动，相持五天后，便被迫下令将刘鹤卿部队撤离永绥。宋濂泉也因此收兵。时称“永绥事变”。

关于这一事件，1936年7月27日湖南《大公报》有如下报

导：“永绥苗民与屯军，日前忽发生冲突，其起因则为在绥催征欠租及预征屯谷之督征员，罔恤民艰，藉词恫吓。而卸职之屯务军营长宋运征（即宋濂泉别名），因积恨屯务处长陈渠珍，藉故泄忿，而鼓动苗民聚众反抗。于是一时双方秣马厉兵；形势严重。后经二十八军军长陶广从中调停，飭令双方撤退，遣散变民，绥境秩序得以复恢。”

何键和陶广借“永绥事变”，进一步钳制陈渠珍，彻底解除其兵权。6月30日，以长沙绥靖公署、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会衔”发布命令，“整顿湘西军政事宜”，“各县绥靖事宜，着归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负责”。陈渠珍眼见自己在湘西的基础已被瓦解，迫于形势，辞去屯务处长职务，于同年8月离开驻地乾城，赴省城就任省府委员之职。

“永绥事变”表面虽属陈、宋之间的武装冲突，但它是以永绥苗民抗租为后盾的。以此为发端，在永绥城乡掀起了“抗租”、“革屯”热潮。而宋濂泉鉴于何键对陈渠珍的态度，更有恃无恐，企图借“抗屯”之势，重掌永绥兵权。宋濂泉致书县长刘慕唐，劝他大胆为民，废除屯租。同时，将自己集合起来的武装，以“抗租”为词，开进县城，向政府示威，并要求编为“保安团”。7月上旬，刘慕唐惧怕事态扩大，被迫出面召集全县区、乡、镇长，各公法团及各乡镇士绅代表三百余人开会，讨论“废屯升科”的方案，组织“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宋濂泉特邀请吴恒良出面，主持“诉愿团”。

吴恒良，永绥县瓦水人。他为苗中富户，有文化，当过上五乡小学校长四年，又曾在地方杂牌军和宋濂泉属下任副官、参谋、团副等职，在永绥苗族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和威望。8月9日，吴恒良以“诉愿团”名义，向全省发出《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宣言》和《快邮代电》，吁请各界支持。《宣言》和《代电》痛斥“屯政”之害，倾诉“屯租”剥削之苦，正式提

出“废屯升科”的要求。即废除“屯租”，所有“屯田”、“官田”均归民私有，按照全省其它地区之例，向政府交纳田赋，“改租为粮，减轻负担”。同时，永绥唐家湾的“屯田”大户苗民隆子雍、县城汉民向备三，以善辞令被推为“上诉”代表，赴省请愿。

陈渠珍辞去屯务处长后，由三区专员余范传兼任屯务处长。余范传在何键支持下，坚持征租如故，态度十分顽固。10月，余氏“出巡”各县，在永绥驻十日，解决“屯务纠纷”，并采取强硬手段压制群众运动。他居然将群众抗租诬为“二、三狡黠流痞、伪造民意者所把持煽惑”，要求“本年屯租照旧交纳”，并限令“旧历十一月十五日止，缴足三分之二，十二月十五日止，全数缴齐”。还声言“取消永绥屯租诉愿团，并将缴其图戳”，“令驻军袁团长”等“严密辑拿暗中唆使、仍敢抗租之捣乱分子”。鉴于刘慕唐态度软弱，余范传建议撤销其县长职务，请调其亲信李卧南接任。

10月15日，省府常会讨论屯制改革，同意将民国二十四年以前欠租蠲免，但坚持二十五年的“屯租”仍照章完纳。10月28日，省府明令李卧南接任永绥县长。12月1日，李卧南走马上任。为贯彻省府征租命令，李卧南撤换了一批征租不力的乡长，对苗民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宋濂泉本意不在“革屯”，怕承担责任，自动遣散了进城的部队，离开了湘西。

永绥县“诉愿团”和平“请愿”活动，持续约半年之久。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局的腐败，以省府主席何键、专员余范传、县长李卧南等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阻梗，毫无结果。正如《梁明元德政碑》记载：“组织诉愿团，恳求改革，事经数月，阻于贪污，未克如愿”。诉愿团活动的受挫和顽固保屯势力的高压，促使永绥“革屯”运动于1937年春，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和平“请愿”方式的斗争，转变为广大苗民武装“革屯”起

义。

四、“革屯”武装起义及其发展

1937年元月26日，在永绥县龙潭乡以马王塘苗民石维珍等人为领导，首先举行武装“革屯”暴动。石维珍率领群众杀掉正在苗寨催征屯租的枪兵，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苗守备石达轩，并打开龙潭屯仓，将屯谷分给群众，放火烧了仓库。接着，起义群众包围了前来镇压的屯务军一个连，缴获20多只枪支，建立起第一支“革屯”军。

2月14日，永绥长潭乡木构寨梁明元，邀约七、八个苗族农民歃血为盟，组织“革屯”队伍。几天后扩大到40余人。3月4日，略坝场上刁梯，长乡常健从县城参加会议回来，赶到场上看热闹，并当场对抗租群众进行恐吓、威胁。梁明元带领盟兄弟杀死了常健，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12支。接着发动群众，开仓分谷，连续焚烧了长潭、下寨、窝勾三所屯仓。梁明元的“革屯”军迅速发展为数百余人。

武装“革屯”起义很快从永绥波及保靖。同永绥长潭乡毗邻的保靖水田乡苗民石兴顺等亦发动起来，组织队伍前往木构寨归附了梁明元。

3月12日，梁明元率“革屯”军三百余人开赴龙潭同石维珍汇合。两支义军共同组成“革屯”大队，推梁明元为大队长，石维珍为副大队长，统一指挥。吴恒良、隆子雏等“诉愿团”领导人，也相继转向了武装斗争。

余范传、李卧南鉴于武装“革屯”势力迅速发展，急电何键，请派军“进剿”。何键立即派六十二师刘建文旅前往永绥，并发布“通辑令”，悬赏捉拿吴恒良、隆子雍、梁明元、石维珍等“革屯”首领，查抄其家产。面对省军的残酷镇压，

永绥“革屯”军，采取了分散隐蔽，小规模零星打击敌人，伺机再起的策略。

1937年7月底，何键迫于“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将镇压“革屯”运动的省军撤出湘西。8月初，梁明元、石维珍等立即召集会议，建立“革屯”军指挥部，将分散的“革屯”义军重新集聚起来，并决定在绥、保交界的谷坡设立指挥中心。会后，梁明元、石兴顺等率领“革屯”军千余人，进兵保靖水田乡，开仓分谷，烧毁水田、鼻子寨、葫芦等苗寨的屯仓，并出“告示”宣布废除“屯租”。8月17日，击败由保靖县城派来镇压的保安连。同时，隐蔽在川、黔边界的吴恒良等人也集合队伍，回到永绥，在太阳山召开各支“革屯”军首领会议，吴恒良被推为指挥。8月22日，“革屯”军进攻吉洞乡，击毙乡长陈启光，杀掉苗千总石秀德。9月2日，梁明元、吴恒良于下寨河设伏，重创前来镇压“革屯”军的乾城和保安部队，并进而乘胜围攻永绥县城。

永绥、保靖“革屯”起义爆发和迅速发展后，凤凰、麻阳苗族人民以龙云飞、龙杰等人为首也举起了“革屯”的旗帜。

龙云飞，凤凰县总兵营（今山江）苗民，曾在陈渠珍部下任团长。陈渠珍的新三十四师整编调离湘西后，他离队在家闲居。1937年春，何键派六十二师张谷忠旅进驻凤凰，借“清匪挤枪”为名，深入苗区，大肆搜刮。陈渠珍许多旧部及家属均受牵连，龙云飞亦被勒令交出存枪。为切身利益计，龙云飞试图利用苗民大闹“革屯”，来重新寻找出路。恰值国民党政府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CC派头子陈果夫对何键嫉视，指使CC骨干分子张炯等纠集倒何势力，密谋倒何。早对何键不满的陈渠珍与倒何派声气相通，暗有勾结。但陈近在何耳目之下，不便出头，故龙云飞便成了CC派的物色对象。CC派和陈

渠珍企图利用龙云飞充当急先锋，在湘西发动事变，以武力为后盾，压何键倒台。龙云飞与原陈渠珍副官双景五等，于1937年7月被邀赴武汉，同CC派头目举行秘密会谈。议定由龙云飞在湘西出面组织武装倒何，并由中央党部派杨光跃前往协助，

龙云飞从武汉返回凤凰后，即集聚旧部和起来“革屯”的苗民队伍，并密约麻阳的龙杰，两县同时起事。

1937年8月底，龙云飞、杨光跃在总兵营约集凤凰各路人马，组成“革屯抗日救国军”。龙云飞自称司令，杨光跃任副司令。同时邀约吴恒良于9月8日攻打三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乾州城。9月7日，石维珍、龙正波等率领绥、保“革屯”军二百多人到达竿子坪，同龙云飞队伍汇合，总计约一千五六百人枪，当晚深夜开拔。8日拂晓，龙云飞等率领大军分三路进攻。经激战，击溃守军，一举攻占乾州城。随即发出通电和宣言，揭露何键罪行，明确提出“革屯”、“抗日”、“倒何”三项主张。龙云飞控制乾州城半月之久，并乘势以二千多人进攻凤凰城。由于守城保安团兵力较雄厚，加之内应不灵，凤凰县城围攻一周未能拿下。从麻阳调来的援军赶到，龙云飞被迫撤退。

在麻阳县，与龙云飞起事的同时，龙杰于1937年8月底亦在县城锦和镇举行暴动，控制了县城。县长田蔚贞仓皇跳墙，逃往凤凰城。龙杰召集各乡自卫中队，编成五个连，成立“倒何、抗日、抗屯义勇军”，占据县城五天。国民党当局急忙调一个保安团前往镇压，起义队伍由龙杰带领退出县城，经石羊哨，从溪口上总兵营与龙云飞汇合。

9月15日，梁明元等在谷坡召开“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成立大会，也正式在“革屯”中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后又由吴恒良出面，整编“革屯”军，制订纪律，称“湘、川、黔

革屯抗日军”。吴恒良任总指挥，隆子雍任副总指挥，向备三为参谋长，梁明元为前敌总指挥。保靖县田伯卿亦率部投归“革屯”军，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贵州松桃义军由杨勇臣率领组成独立营，活动于四川秀山与龙山里耶一带。龙焕云，也组织起“革屯抗日军”，后由龙云飞任命为“湘、川、黔革屯抗日军”第五路指挥。9月28日，吴恒良、梁明元集中永绥、保靖、龙山、秀山、松桃等边境各县大小二十多支“革屯”义军，由田伯卿、龙焕云为指挥，攻打保靖县城，未克。

各路义军风起云涌，“革屯”武装斗争达到最高潮。局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9月24日，专员余范传被迫呈请辞职。蒋介石“极为注意”，“电令将原定调往前线之军队，停止开拔，协助剿匪”。何键急调保安第二、五、十六各团及保安暂编团，分途兼程并进”，前往镇压。9月30日，何键还致电四川省府主席刘湘，请派军“会剿”。

在军事镇压的同时，何键又采取“招抚”手段，以分化瓦解义军。龙云飞攻占乾州城后，何键急派“素居湘西苗中领导地位，颇有信仰”的专员公署秘书石宏规，“前往招抚”。后又派省保安上校副专员陈策勋来湘西“宣抚”。吴恒良表示愿意同政府协商解决，并致书面呈文，请陈策勋转何键。在呈文中吴恒良提出两项受“招抚”的条件：第一，“改屯升科”；第二，“将原集请愿之武装民兵四千余名”，“予以编定”，

“俾得向国家觅一努力途径，尽人民一份子责任”。何键得此呈文，派胡锦涛为永绥县长，作政府代表继续同绥、保“革屯”军具体磋商改编、废屯有关事宜。

龙云飞坚持以“倒何”为宗旨，企图进一步扩大事态。10月13日，派部队到龙潭，邀约吴恒良、梁明元再次进攻永绥、保靖县城。吴、梁等人按兵不动。10月20日以后，龙云飞、龙杰亦将部队集中于凤凰总兵营和龙角洞一带，进行整训，准备谈

判改编。

何键因反共坚决得蒋介石重用，主湘八年多。但何非嫡系，故遭CC派人物的排挤，蒋介石对他在湖南搞“独立王国”也颇为不满。湘西苗民“革屯”起义爆发后，何键无力控制局势，特别是龙云飞打起“倒何”旗帜，攻陷乾城，武装起义蔓延至整个湘西苗区和湘、川、黔边境。CC派即以此为借口，请蒋介石将何键调离湖南，以张治中代何主湘。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来长沙接任，12月初何键被迫离开湖南。

五、“废屯升科”和“革屯”军受编抗日

1937年12月7日，张治中主持省府委员会第二次常会，决定对湘西“适应某种情况，剿抚兼施”，并派总参议徐权总理其事。12月15日省府第三次常务会决议，成立湘西绥靖处，以徐权为处长。同时，省府代表与革屯军代表开始谈判。在谈判中，革屯军代表隆子雍、向备三、龙矫等人，力陈“废除屯租”的合理要求，反复阐明“革屯”斗争的正义性，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将“革屯”军与“匪”并提的论调，并表达了“革屯”军受编抗日的强烈愿望。张治中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并会见了隆子雍等“革屯”军谈判代表。最后达成“废屯升科”和“收编抗日”两项原则协议。

1938年1月12日，张治中通令取消何键发布的通缉吴恒良等人的命令。从1月22日开始，有屯七县代表（麻阳代表未到），先后在民、财两厅会商数次，拟定“废屯升科”六条具体办法。2月10日经张治中审批，3月9日由省府常务会正式通过实施。六条的基本内容为：

（1）凤凰、乾城、泸溪、古文四县屯租，依照各该县屯苗代表意见，发交各县政府减五成征收；

(2) 麻阳县依凤凰等四县办理;

(3) 永绥、保靖二县,按照现有租额及各县代表意见,发交各县政府征收;

(4) 屯中学校经费由省政府筹付。

(5) 有屯七县一切善后事宜,由各该县县长同各该县代表及各公法团拟定办法;

(6) 撤销省屯租征收局。

从六条内容看,规定虽不够明确,但实质上还是肯定了“废屯升科”的原则。1933年后,在有屯七县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实施。永绥县是“就租升科”,改纳田赋,原每石屯租折交纸币四角。凤凰县,先是按原租额八成收租,后又改为五成,并取缔收“斛面谷”、“地皮谷”、“马口谷”等陋规,裁减屯官、屯丁1300余人。乾城县依照省府规定的五成收租。麻阳县开始按五折征收,后改为六折。泸溪县按八成折收。保靖县亦按八折。古文县按每石租谷价三元折半交县。同时在各县开始陈报土地,以实际占有管业为准,颁发土地所有权证。1944年后,清丈土地,所有田土无论有租无租,一律科以田赋。至此,延续140多年的湘西“屯田”和“屯租”制度最后废除。苗族人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革屯”斗争,达到了自己的基本目的。

在“废屯升科”的同时,张治中又着手“革屯”队伍的收编工作。1938年4月1日成立沅陵行署,取代绥靖处,起用陈渠珍,以省府委员兼行署主任,负责点编苗民“革屯”军。凤凰龙云飞和永绥吴恒良、梁明元两支大队伍共八千余人,分别编为湖南保安部队新编第一旅和新编第一团。新编第一旅由龙云飞任旅长,杨光跃任副旅长,龙恩普、田儒礼、龙杰、龙和清分别任一至四团团长。吴恒良、隆子雍分别任新编第一团正副团长,梁明元任中校团副兼第一营营长,石维彭、董平任营

长。其余部队编入新编第三团，龙矫任团长，田伯卿为第一营营长。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张治中去职，薛岳主湘，1939年，将陈渠珍收编的全部队伍，调桃源整训，扩编为新六军，下辖暂五、暂六两师。新一旅编入暂六师，龙云飞任师长（不久调离），杨光跃任第三旅旅长，龙矫任第四旅旅长，第五团团长龙恩普，第六团团长田儒礼。新一团编入暂五师，为第一旅第一团，吴恒良升少将团长，梁明元仍为营长。改编后又开往湘潭整训，1940年3月，撤销新六军番号，暂五师编入七十三军，暂六师编入七十九军，开赴抗日前线。在以后数年的抗日战争中，以湘西苗民为主体的暂六师和暂五师，参加过长沙大会战以及其它大小战役10余次。湘西苗族子弟，英勇杀敌，血洒沙场，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外国洋行在长沙的经济掠夺

罗立德

一、长沙开埠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夺了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开放商埠和外国在中国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政治、经济特权，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遭到破坏，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为主要方式。初期输入商品以鸦片、棉花、棉织品为大宗，还有煤油、糖类、香烟、钢铁和装饰品、奢侈品。相应地：（1）开设银行。先后在上海开设的外国银行有：英国丽如银行（1845年）、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7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德国德华银行（1889年），俄国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等；（2）开办航运。先后开办的轮船公司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1867年）、怡和洋行（1877年），这两家洋行于1881年开始长江航运；（3）兴办工厂。为开展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理厂，为掠夺农产品原料而办的茶厂、棕厂，为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而办的

火柴厂、玻璃厂、香烟厂等。这类资本输出的方式，都是为其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的。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中国出现了为虎作伥的买办阶级。

二、洋行操纵着长沙市场

1902年在上海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次年美、日两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上项条约。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长沙开为商埠，属全国八十处“约开商埠”之一。帝国主义依据“利益均沾”的约定，接踵蜂涌而来。《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规定，外商划定“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修完之铁路及新码头为界，北以浏阳河、西以湘江为界”。外商藉口北门外河沿不便停泊轮船，后又议定以西门外河沿，上自永州码头起，下至鱼码头止准予租用。事实上外商均在西门外沿河一带租地设行，且蔓延至南门外及城内，长沙成为华洋杂居，全埠通商。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攫得的种种特权，掌管着长沙海关，在长沙开设领事馆，开办邮政和内河航运，为在长沙大肆进行经济掠夺打下基础，长沙海关开始设在水陆洲，由美国人夏立士任税务司。美国领事馆设在兴隆码头四号，日本领事馆设在平浪宫二号，英国领事馆设在水陆洲。长沙邮政分局原由汉口海关直接管现，后改由长沙海关兼管。日本没有掌握海关管辖权，便在长沙开设东信郵便局。长江航线原为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日清洋行三家经营的轮船所霸占，共占长沙水域轮船吨依的70—80%。长沙开埠以后，三家洋行陆续来长沙开办航运。开始日本人在长沙创办湖南汽船会社，有湘

江、沅江两商轮行驶于长沙——汉口之间。之后日清汽船公司，1915年10月租用江西帮管业的大金码头，商船航线除继续行驶长沙——汉口外，进一步南到湘潭、衡阳，西到南县三仙湖、常德。英国轮船在大西门至小西门河沿，据有怡和码头、太古码头，有同和、湘潭、沙市、吉安及绥定、秀山等大小轮船六条，行驶长沙至汉口、长沙至上海往来航班。

为了倾销商品，掠夺工业原料，开埠以后不久，就有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开设洋行17家。1924年在长沙开设的洋行大增，计有：日商36家，英商24家，德商10家，法商5家，共75家。次年各国洋行共达88家，新加入的国家有意大利和瑞士两国。还有经营洋货，托洋人庇护的华人开设的洋行。同时，还有外商开设的各种公司，如英商开设的楚南烟草公司、通用电器公司，英美合办的英美烟草公司，日商开设的野田公司等。英、美、德国的洋行，也开设公司、批发处等附属机构。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都附设有轮船公司和堆栈，亚细亚洋行设有堆栈及福记洋油公司，福记洋油公司又在小吴门外、西湖桥、北门外三处，设东、南、北三个分销处，同美商正大洋油公司在这三处所设分公司唱对台戏，开展竞争。这些洋行、公司及其附设机构，组成庞大的购销网络，遍布全市。业务影响较著的洋行有，英商太古、怡和、亚细亚、安利英、卜内门洋行；美商美孚、恒信、慎昌洋行，以及英美矿务洋行；日商大石、小岭、三井、盐川、日丰洋行；德商德孚、谦信、裕兴、多福、瑞成洋行等。

这些洋行、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受任何约束，没有行业界限，大自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吃的、穿的、用的，无所不有，什么有利就经营什么。以至洋货充斥市场，人民生活用品，几至无货不洋。输入商品以纺织工业品、五金制品、搪瓷工业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香烟为大宗，还有

海味、食糖、干果等。1904至1911年，长沙开埠头八年，长沙关进口洋货共33,883,040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6,425,501关平两，较1904年的1,989,237关平两增加2.23倍。民国年间愈演愈烈。1920年进口净值竟达15,929,430关平两，较1904年进口净值增加7倍。当时每两关银折合银元一元八角，这三年平均每年洋货倾销价值银元2600多万元。

这时长沙市场被各国分割垄断，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国、美国垄断着煤油、香烟。美商美孚洋行于1911年前在长沙设行，随后两年英商亚细亚洋行也来长沙设行，这两家洋行垄断了长沙煤油市场。约在七月后，美商德士古洋行又来长沙设行。经过激烈竞争，三家达成协议，按比例分销，美孚和亚细亚洋行各占销售量40%，德士古洋行占20%。1920年输入煤油6,875,260加仑，机器油57007加仑，年销售款约6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在湖南销售香烟三万箱（每箱五万支），约值银元500多万元，占全省香烟销售量的85%，垄断了全省香烟市场。

各国洋行、公司凭藉种种特权和雄厚的资金，在长沙扶植买办势力，设置经理处、经销处或分销处，由洋行发给衔牌悬挂。这能庇护商販，抬高社会地位，逃避民国政府的捐税，赚取因加工征税款而引起的商品增值。同时，洋商还对经理处等进行賒销、分红和发给销货回扣等手段，笼络商販替他卖力推销，占领市场。这类洋行卖办中，既有殷实商户，也有资金薄弱的摊販。长沙谦和钱庄、余太販油盐号等商界大户，都曾充当“美孚洋行经理处”。“五四”运动后，我市人民反帝情绪高昂，提倡使用国货。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后出产“爱国牌”、“白金龙”香烟，很受民众欢迎。英美烟草公司称国产香烟为“敌牌”，一面降低洋烟售价，进行抵制，一面唆使各经销处大量收购囤积“爱国牌”、“白金龙”香烟，待烟霉变后烂价

出售，破坏国产香烟的声誉，使之销路阻滞。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掠夺农产品原料和矿产品原料。经长沙集散外销的农副产品有：粮食、茶叶、苎麻、湘叶、烟叶、五倍子、植物油和牛皮、兽皮等；矿产品有：锑、锰、铅、锌、钨、锡等。外销物资大都是初级原料，价格低廉。如五倍子是有机染料、有机化工原料和医药原料，农民经过采摘、加工、成装后，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上下，仅够劳动工食。1935年外销五倍子约5.6万石，其中销往德国50%、英国20%、日本15%、美国10%、法国5%。回过头来，德国向我国输入高价染料，英、美向我国输入高价药品。湖南矿产资源丰裕，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交通闭塞，矿产品全赖水运，从长沙集中转运汉口、上海外销，产销命脉系于洋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和美国乘机抢购湖南的各种矿砂，供作军事工业原料。从1914年至1918年的五年间，湖南出口矿产总值30,752,754关平两，称为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欧战结束，矿产品需要骤减，价格一落千丈，无论官办、商办矿业，均纷纷收缩或倒闭。

此外，各国商人还在长沙经营堆栈、运输业务。1925年有外商87家（其中：日商31家、英商22家、德商20家、美商8家、意商5家、法商1家），在湘江东岸上起宴家码头，下迄木码头，共11处码头经营堆栈、运输业务，垄断了矿产品、棉纱、布匹、百货、烟草、石油等储运业务的全部或大部。

各国洋行、公司除进行经济掠夺外，还以销售报表形式，规定各级分支机构定期填报，或派出业务人员外出调查，搜集各地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乃至各地风俗民情，其目的明显超出了商业业务范畴。

三、洋行成了历史的陈迹

1840年鸦片战争，显示着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保护着经济入侵。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的长沙对外贸易，不只使长沙处于经济上被掠夺的地位，而且农副业、城乡手工业、民族工业生产，都遭到外商的打击破坏，人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早在明末清初，浏阳夏布便畅销全国，远至朝鲜、日本，“岁售银百十万两。”清光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采购茶叶，湘茶运汉口外销，每年值银600多万两。长沙地区种茶事业得到发展，浏阳县有废除麻园，改种茶叶的。加之洋纱、洋布的竞争，浏阳夏布生产渐趋衰落。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国际茶叶市场竞争激烈，茶叶销量锐减，茶价下跌，湘茶连年亏折甚大，致使“办茶之富商，束手无策，种茶之山户，生计将穷”，茶叶生产又遭挫折。湖南锑矿储量名列前茅，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长沙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厂从事炼锑业，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华昌炼锑公司开工生产，才炼出纯锑，誉称“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昌获利甚多，成为国内著名企业。欧战结束，锑价陡跌，华昌损失巨大，最后以接纳中美贸易公司投资为条件，每年向美国出口锑砂一万吨以维持残局。1927年长沙开设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中国华昌烟草公司，生产“曼丽牌”、“岳麓牌”和“革命牌”香烟，颇受群众欢迎。然而不到三年，便被英美烟草公司所挤垮。旧中国水利设施极差，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宣统元年（1909年），沅、澧二水同时暴涨，至8月下旬水势仍未稍退，滨湖各县均受灾甚巨；同时长沙、宝庆、衡州府属各县，半遭虫灾和旱灾。全年大部份地区陷于饥馑，饥民流徙长沙乞

食求生。次年春荒，奸商囤积居奇，英国洋行乘机收储贩运，这年长沙输出大米竟多达2,279,407石（每石合150市斤），导致长沙米价一日数涨，由往年每石二千到三千文，涨至七千文以上。

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经济掠夺，激起了长沙人民的愤怒反抗。1910年（宣统二年）暴发了震撼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者的“抢米风潮”，并发展成反帝仇洋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发生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查禁、焚毁日货大示威。1925年10月举行了收回大金码头示威。1929年举行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大罢工，并收回湖南邮政和长沙海关管理权。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对外贸易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沙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集中转运市场，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左右国际市场锑矿行情。问题的症结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的对外贸易，处于被掠夺的地位，失去了平等互利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一举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对外贸易的新纪元。党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贯彻实施，为我国进出口贸易，揭开了新的一页。

外国在长沙开设的洋行

洋行名	国籍	业务内容	行 址	洋行名	国籍	业务内容	行 址
大石洋行	日本	苏广杂货	小西门外	日清汽船公司	日本	航运	小西门外
小岭洋行	日本	纱、布、染料、堆栈	小西门外	戴生昌汽船公司	日本	航运	小西门外
三井洋行	日本	纱、布、染料、堆栈	楚湘街	石井照相馆	日本	照相	太平门外正街
日丰洋行	日本	苏广杂货、堆栈	太平门外	太古洋行	英国	南货、白糖、海味	太平门内下河街
盐川洋行	日本	苏广杂货、堆栈	小西门外	太古堆栈	英国	仓储	太古码头
山本洋行	日本		楚湘街	太古轮船公司	英国	航运	金线街口
三隆洋行	日本		沙河街	亚细亚洋行	英国	石油、堆栈	潮宗门外
中岛洋行	日本		半湘街	亚细亚油池	英国	石油	三汊矶
岡部洋行	日本		大西门外	亚细亚福记公司	英国	石油	浏阳河街
天华洋行	日本	榨厂、土产、冷饮	浏阳河街	福记油栈	英国	石油	福星门外
广贯堂	日本	染料、西药	小西门外	东福记分销处	英国	石油	小吴门外
杏林堂	日本	西药	小西门外	南福记分销处	英国	石油	西湖桥
陈志记	日本		浏阳码头	北福记分销处	英国	石油	北门外
大同炼银厂	日本	冶炼	岳麓区鲫鱼庙	怡和洋行	英国	航运、堆栈	碧湘街
同仁医院	日本	医疗	樊西巷	怡和堆栈	英国	仓储	怡和码头
怡和轮船公司	英国	航运	怡和码头	慎昌洋行	美国	纺织机械、纺织品	潮宗门外
太平洋洋行	英国	茶叶	太古码头	南星公司	美国	染料	半湘街
卜内门洋行	英国	染料、堆栈	西湖桥	施美洋行	美国	桐油	
安利英洋行	英国	桐油	灵官渡	北美洲保险	美国	保险	坡子街

(续表)

洋行名	国籍	业务内容	行 址	洋行名	国籍	业务内容	行 址
英美矿业公司	英、美	矿业	草潮门 上河街	旭升洋行	美国		
英美烟草公司	英、美	香烟、 堆栈	草潮门 河街	多福洋行	德国	染料	六铺街
通用电器公司	英国	电器	小西门 下河街	多福洋行 颜料处	德国	染料	坡子街
和记洋行 长沙庄	英国	牲猪		裕兴洋行	德国	染料	灵官渡
美孚洋行	美国	石油、 堆栈、 蜡、 蜡烛	福星门外	瑞成洋行	德国	染料	半湘街
美孚油池	美国	石油	马厂	西门子 洋行	德国		下河街
正大洋 油公司	美国	石油	大西门外	德孚洋行	德国	染料	西湖桥
东正大洋 油公司	美国	洋油	小吴门外	谦信洋行	德国	染料	小西门外
南正大洋 油公司	美国	洋油	学宫门外	拜耳洋行 总批发处	德国	染料	福胜街
北正大洋 油公司	美国	洋油	北门外	爱礼司洋行 总批发处	德国	染料	灵官渡
德土古 洋行	美国	石油		瑞福洋行	德国		上牛头洲 尾
恒信洋行	美国	锦矿、桐 油、 染料	大西门外	开利公司	德国	染料	灵官渡
开利公司 保险部经 理处	德国	保险	学宫门外	荷兰保险 公司	荷兰	保险	金线街
瑞记公司	德国	堆栈	大西门外	远东矿业 公司		矿业	灵官渡
汽巴洋行	瑞士	染料	金线街	万国 储蓄会		金融	新坡子街
义信洋行	意大利		小西门外				
天德洋行	意大利		半湘街				
宝汇洋行	法国		灵官渡				

回忆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

谢庆利*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国统区一般公教人员所得工资，难以维持最低生活。为了缓和矛盾，湖南省政府当局提倡组织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的员工消费合作社。如1946年10月的汉寿和靖县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1947年5月的宜章和道县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1948年6月的汝城、攸县、会同、兰山等县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等，还有辰溪惠民煤矿、祁阳阜新煤矿等员工也先后组织了消费合作社。其它如湖南省银行总行及岳麓、城北两办事处、湖南省公路局、湖南电器公司、中国银行衡阳办事处等单位的员工也纷纷组织消费合作社。不仅如此，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如衡阳警备司令部、沅陵湘西师管区的官兵们也组织了消费合作社。最有甚者，长沙市山陕甘同乡会也集合同乡，组织起“山陕甘同乡会消费合作社”。

1946年下半年，湖南省政府也令省社会处（当时是省合作社主管机关）筹组“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以谋省府员工之福利。由省府各机关单位选派筹备委员25人，先后于1946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2日、12月30日，1947年2月8日、2月20日，共开过6次筹备委员会议。先后议决，入

* 谢庆利，曾是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成员。

社社员必须是省政府各机关单位的员工，职员入社每人须认购五股，每股法币一千元，共五千元（当时法币五千元约折合银元一元）。工友入社每人须认购二股，共二千元。社员代表名额产生办法是，单位社员名额在50人以下者选择1人，50人以上者，每满50人增选代表1人，共选出社员代表83人。到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时止，入社单位共26个、社员3829人，股金1514.7万元。

1947年2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大会由社会处长刘修如主持，选举产生了“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李锐、刘公武、张千群、李毓九、刘修如、丁鹏翥、蒋昆、狄昂人、谭抱经、秦载宽、张曾复、李钦和、孙奇昂、朱绍诚、张凤楼等15人为理事，黄石、周宝树、王和政、余华萍、陈幼鸣等5人为侯补理事，梁维嵩、曾宪枢、许仕安、陈特、李镜蓉、朱有为、徐光等7人为监事，李厚玲、李俊、杨克观等3人为侯补监事。并选举刘修如为理事会主席，梁维嵩为监事会主席，聘请狄昂人为经理，柳云圃、汤铭为副经理，张鸣阜、袁家睦、陈藏仲分别为社务、业务、财务课长。另聘29人为门市部工作人员，由省政府拨中山东路227号房屋一处为门市部地址（今一师附小门口地区），正式营业。资金来源，除股金外，当时省政府拨给特种资金一亿元（后又增拨二亿元），并前驻耒阳时省政府员工福利社剩余稻谷11000余担作为自有资金，以资周转。

经理事会讨论决定，米、油、盐、煤四种生活必须品为配售，不论家庭人口多少，按每社员每人每月供应米八斗、油五斤、盐五斤、煤五担、其它百货南货则凭社会证随意购买，不限数量。从2月开业到10月20日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时止，共经售米12356担、茶油12352斤、盐76918斤、煤13860

担、百货4.23亿元，布匹7668万余元，南货4226万余元。社售价格一般较市价均低百分之十以上，以6月为例，米每斗市价12600元，而社售仅9700元，茶油每斤市价8000元，社售为6800元，盐每斤市价1750元，社售800元，煤每担市价16000元，社价8500元。再从10月看，米每斗市价64800元，社价为61600元，茶油每斤市价15600元，社价13200元，盐每斤市价4100元、社价3200元，煤每担市价64000元、社价19000元。据估算，从开业到10月，每个社员约减轻负担56万余元，总计达32.11亿元。经营结果，1947年终决算，盈余9亿余元，但仅货币贬值损失就有6.5亿元之巨，所剩纯利就寥寥无几了。

除上述业务外，该社还办有其它福利业务，为社员照相、理发，特约蓉光、庐山两照相馆及华中、白宫两理发店，社员凭证八折优惠等等。

在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该社之所以能为入社员工谋一点福利，其原因是当时省政府从资金、物资上加以扶助，除两次拨款三亿元作为该社周转资金外，财政厅还供应廉价田赋谷二万担，并分期付款，作为该社供应廉价米的来源。又如3月间向救济分署一次购盐1000担，分月出售，后市价涨至每斤2000元，而该社仅售1000元。

该社以后曾于1947年10月25日、1948年3月15日、1948年8月14日、1949年2月19日、1949年7月2日，先后召开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议程多是报告经营情况，听取社员意见，研究改善经营办法以及改选理、监事等等。但每次讨论的焦点，一是资金不足（资金多可一次购进大批商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陆续以廉价供应社员），二是省府拨给的廉价田赋谷不能及时保证等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什么善策，从实际结果来看，该社实为省府员工米、油、盐、煤的廉价配售店。在当时情况下，对保证

省府员工生活还是起了一点作用。故当时一些未曾入社单位的员工，竟相加入该社。如某些中央驻省机关及长沙医专、国民日报等单位，先后申请加入该社。到1948年7月底止，入社单位增至78个、社员7948人。至1949年2月19日召开第五次社员代表大会时，社员已增至8289人、入社单位79个。

当时配售给社员的米油盐煤，均较市价低百分之三十左右。不要实物者还可发给差价，差价款约可等于某些员工的月工资额。当时生活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据1948年1—6月平均统计，市价与社售价比较，大米每担市价2516000元，社价1210000元，煤每担市价212000元，社价183000元，菜油每斤市价113000元，社价108000元，盐每斤市价21500元，社价18400元。

1948年年终决算，该社得纯益1.02亿元，当时该社资产总计4.5亿元、除去负债0.75亿元以外，净值约为3.8亿元（1948年8月19日以后，已改用金元券，当时每担谷价约300金元）。

1949年2月19日，该社召开了第5次社员代表大会，改选了理监事会。王和政、王恢先、汪西赛、蒋固、李贵、梁人伯、程志刚等7人当选为理事，石振东、刘雪光、周宝树、陈建章、王阳、任明高、汤铭等7人为侯补理事，梁维嵩、曾宪枢、许仕安、徐光、朱有为、李镜蓉、李厚玲等7人当选为监事，谭同甫、贺鼎揆、袁蕴良等3人为侯补监事。

1949年6月20日，该社已停止收付。7月2日召开的第6次社员代表大会，是该社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带有遣散性质。

7月18日，该社曾召开一次社务会议，决定停止营业。8月长沙和平解放，省工商厅派员接收清理了该社人财各项。该社留长人员大多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浏阳花炮古今谈

汤万全 杨敬儒

绚丽多彩，变化万千的浏阳花炮，给人们美好的生活带来了欢乐。这朵光辉熠熠的奇葩，早已驰名中外。1986年8月9日，浏阳花炮在摩纳哥21届国际焰火大赛中一举夺得了第一名，获得两万法郎的奖金。这天，当中国燃放一结束，10多万游客和当地观众，掌声雷动，海笛齐鸣，许多人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说，“好，中国第一！”

浏阳花炮夺取“天下第一”，决不是偶然的。在历史长河中，它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洗礼。

花炮，是烟花、爆竹的统称。爆竹也写作炮竹。爆竹，是燃烧竹子发出爆炸的声音而得名。楠竹、苦竹、斑竹等，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从爆竹启示了人们用纸卷筒装药爆炸。据最早的历史记载，爆竹烟花这朵灿烂的人工之花，已绽开了1500多年。南朝梁宗怀写的《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岁时节令、风特故事的。其中曰：“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说明这时燃放鞭炮已经相当普遍了。浏阳属楚地，自然不在例外了。传说，唐朝李畋，是爆竹发明者之一。据传，当时灾害连年，瘟疫流行，李畋以小竹筒装硝，导引烟花，以硝爆驱散山岚瘴气，减退了瘟疫流行。因而爆竹很快推广开来。为了纪念李畋先师，浏阳人自古把他作为发明爆竹的祖师爷。在宋代，浏阳城关镇田家巷建立了“李祖先师庙”。每年四月初八日，

花炮工人都去朝拜，极为隆重。爆竹发明后，几经改进，用麻丝将一个个筒装药编织连接起来，名为“编炮”。有的编成一丈多长，要用小竹竿撑着燃放，称为“爆竹”或“爆仗”；有的编成如赶驴的鞭子一般长短，燃放时，噼噼啪啪，发出同抽鞭子一样的响声，叫做“鞭炮”。这些就是爆竹的由来和发展。随着我国的火药的发明，人们把自然的爆竹，引向了纸筒代竹的阶段。公元975年，宋朝有个叫杨万里的，写了一本叫《诚斋集·海鳅赋》的书，它记述了纸管爆竹制作方法，文中说，“……此炮以纸管装石灰和硫磺制成，升入空中，然后降下，落到水中乱跳……”这是后来的花炮原始形成之一。宋书《武林旧事·岁除》中记述……至于爆仗，内载药线，一薰连百餘不绝……”这时的爆竹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了。当时的文学家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旦》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根据史料记载，浏阳花炮始于唐，盛于宋。唐朝有位叫张说的文人写了《岳州守岁二首》的诗歌，其中一首曰：“桃花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另据《中国实业志》记述：“湘有爆竹制造，始于唐代，发达于宋末及逊清乾隆年间，湘东之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个县均为花炮制造之中心地。”

1934年，张人阶编写的《湖南省经济调查丛刊》中，有一段文字说“鞭炮为湖南之特产，尤以浏阳所产具有历史上之信誉，盖湘省鞭炮之制造，发源于浏阳也。”这本书中，从浏阳花炮的历史沿革，到制作工艺、产量、产值、销售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光绪年间，浏阳花炮即开始出口，当时爆庄有培德厚者，经销广庄鞭炮，运销广东。因广州为当时洋庄鞭炮交易的中心，自此，浏阳鞭炮就驰名海外了。光绪三十年统计，出口数量即达万余担，价值七十万两。至宣统三年，

出口数量增至五万担，价值达九十余万两。”该书还记述说：

“湖南鞭炮之出产，最初发源于浏阳，后随该业发达，产地逐渐推广于邻县。”又说“浏阳鞭炮，久负盛名，经验相传，制造精美。”并列了不少品种。还说“居民于农闲时操此业者，达三十余万人，其城区制造之作坊，有三百余家，年产达十四万箱以上”。在此之前，浏阳花炮业，就在全省设立了不少炮庄，全国各地均为其市。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浏阳花炮在厦门、汕头、汉口、烟台、福州等地就设置了不少炮庄，比较著名的有“培德厚”、“绥丰永”、“谦达利”、“瑞华祥”等。他们经营的范围，远达日、美、英、伊朗、南洋等地。1929年，浏阳花炮参加“中华国货展览会”荣获一等奖，在全国享有盛誉。1933年，浏阳花炮应选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又荣获一等奖，再次扬名中外，因而促进了浏阳花炮的发展。现在全县有花炮品种四百多个，上千个不同规格。花炮统分两大类，即烟花类和鞭炮类。烟花类又分为，喷花、旋转、火箭、吐珠、线香、小礼花、烟雾、玩具、组合、礼花弹等类。鞭炮类包括黑药炮、白药炮、火箸等类别。爆竹还有单响、双响、连响、鞭炮、排炮、卷庄炮。著名品种有：加花快引、雷鸣、顿鞭、花皮炮等60多个品种，而以燃放时响声宏亮、气味芬芳的“梅花散纸”著称于世。五彩缤纷，鲜花怒放的烟花，著名的品种有全家乐、电光花、大地开花、圣诞烟花、万国伞旗、月旅行、金盘起月等三百多个品种。这些品种的特点是：品位优良、结构新颖，外观艳丽，燃放时百花争妍，有声有色，给人以意气风发，心情愉快的感受。最逗人喜爱的是小型玩具烟花，以色新、声响、运动、烟雾和花形塑造形象而引人入胜。1985年10月间，国际烟花协会亚洲烟火研究员、美国人利连路先生，来浏阳参观，看了燃放时的“全家乐”后，伸着大拇指，连连称赞说，“这是王牌烟花！是你们

工人对花炮事业的一大贡献！”1968年，浏阳烟花首次去香港燃放，博得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从而取代了日本烟花垄断香港市场的地位。香港居民说：“祖国烟花的燃放，好象在香港撒了一颗原子弹，震动大得很！”

浏阳花炮，老产品质地优良，新产品层出不穷，声、色、光、烟俱备，大、中、小齐全，各类产品，造型美观，响声清脆，气味芬芳，燃放安全。解放后还成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在传统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改进配方。如过去的烟花哨音药剂，多年来是采用没食子酸、氯酸钾、六氯代苯等化学原剂。科技人员为了不断创新，翻阅了许多篇中外有关文献资料，经过两百多次试验，研制出了新的配方，较原来的产品安全性大，吸湿性小，燃放效果好，因而受到世界各地广泛的欢迎。1979年10月，西德扣劣公司总经理扣劣先生，看到浏阳的彩色“电光炮”烟花后，赞不绝口地说，“你们的电光花，比西德最好的一家还要好得多，可称世界第一。”

中美药号与益阳西药业

张永年*

清光绪32年（1906年），挪威基督教信义会倪尔生在益阳桃花仑创办信义医院，为西医药传入益阳之始，但其时益阳尚无经营西药的专业药店。1913年，我父亲张厥臣由浙江来到益阳，鉴于益阳地处资江下游，交通便利，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经营西药这一新兴行业大有作为，乃邀宁波同乡严阿华共同商议，两人各投资银洋500元，计划在益阳开办一所西药房。经过一番筹备，乃在益阳大码头正街靠河岸租佃铺面一间，于1913年4月1日以中美大药房挂牌开业。从此益阳开始有了私人经营的西药商店。开业时，雇请乐队热闹三天，扩大宣传。

当时市民对西医药还不甚了解，将信将疑。但时隔不久，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病，如小儿蛔虫病、秋季常患的疟疾、暑天的时疫、各种皮肤病、外伤以及花柳病（性病）等，服用西药奏效甚快。治蛔虫的山道年制剂、宝塔糖、驱虫片，味甜无药气，儿童乐于食用。金鸡纳霜丸治疗疟疾，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八。高温季节的万金油能吃能外擦。十滴水、仁丹治疗中暑有效。六〇六是治疗花柳病的救星。其它消炎止痛的药品，或

* 张永年，解放前经营“中美药号”，解放后任益阳西药业同业公会主任。

口服，或外用，使用方便，疗效显著。可是我父亲和严阿华对西医药理论均无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业务打不开，加以经营管理无方，效益很不好，历年都是亏损。1925年父亲病逝，严阿华也拆伙离店回浙江老家。在此困难期间，我只得继承父业，独资经营。为吸取教训，振兴这一企业，我自备不少医药书籍及英文药典（当时西医药资料很少译本）。由于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懂英语，具备自学条件。我悉心钻研，在掌握一些西医基本理论的同时，熟悉药物性能以及使用剂量。凡顾客上门，首先问明病情，详细介绍药品性能以及服用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群众反映良好。顾客说，“在中美药房买了药，等于也看了病，对症下药，确有效验。”从此，我店树立了信誉，也增进了营业。仅两年时间，除还清我父亲在世的亏欠外，还有相当盈余。

我店赚了钱，继之而开业的西药房一年比一年增加了。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武汉、江浙一带逃来的难民（包括商民），或由部队下来的医护人员，为一时生计，随便租一个门面，既卖药，又门诊。从1940年至1949年，益阳城区已有西药房18户：中美、博仁、宁波、伯特利、亚洲、美华、义生和、新民、益阳、华美、湖北、治安、惠康、曹荣记、新生、和平、平安、同江。

解放后成立了西药业同业公会，我任同业公会主任。1951年，中美、美华和益阳三户资金比较雄厚的西药房，商议组织合营，成立益阳资江医药器材行。不久转为公私合营，改名资江企业公司医药部。总理由市长胡为乐兼任，曾海楼任经理，我担任医药部主任。1952年胡市长调离，公司奉命撤销。原合营的益阳药房抽走资金，另设离店。中美与美华仍合伙恢复资江医药器材行。不久，我店响应益阳市委号召，停止西药业务，全部转产投资扩大资江瓷厂。

衡阳市的“丐帮”

周 沛*

笔者于解放前后曾在衡阳新闻界工作过一段时期，因工作关系，曾对衡阳丐帮（“叫化子厂”）的情况有所了解，现就当时的笔记和记忆所及，整理如下。

衡阳“丐帮”的由来

在衡阳有名的回雁峰东侧，有一条狭窄的傍山而上的小街，叫做雨花亭（亭子已在解放前塌毁，街名系因亭名而起），也就是昔日所谓的“叫化子窝”。这条血泪斑斑的小街，用它的沉痛的悲惨的历史告诉我们：旧社会的乞丐，遭受着多么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这条傍山小街宽约二米，长不过200多米，由于地方偏僻，距市中心区较远，又靠近寿佛殿（过去烧香拜佛，香火旺盛之处），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不少流浪汉流落到这里来。那时他们多露宿在寿佛殿前的戏台两侧。反动统治阶级恐防他们惹事生非，便先后设立了“养济院”、“栖流所”、“南门上院”、“南门上厂”等，以容纳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乾隆二十九年建坊添修“养济院”碑中说：“衡城养济院……雁麓右

*周沛，当时在衡阳新闻界工作，现为民盟衡阳市委宣传部长。

侧，穷民无靠者，萃而居焉。”这是现存的关于这条小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栖流所”碑记中说：“故失所者以雁峰寺戏台两侧为乐郊之适，日则乞食，夜侧安宿……苦辈无容身之地，爰筑斯室，名曰栖流所。盖谓为流离也可抑谓流寓也”。这便是养济院、栖流所的由来。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流落到这里的人日益增多，反动组织也就更为严密，统治者压迫控制他们也就更加厉害。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条街大约有80多户人家，其中除了两户做线香的和一户是甲长以外，其他都是乞丐。这些人主要分居在三处，即：南门上院、南门上厂、栖流所。南门上院主要住的是聋、哑、跛、瞎、老弱残废等人，南门上厂住的是一般乞丐，栖流所主要是住一些过路的流浪者和流动乞丐，三处共约200人左右。而定在衡阳的也即是住在“厂”和“院”的约有160余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也有一些逃荒的、失业者、老妓女以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等。他们在无处投奔、失去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情况下，只好沿门乞食，而且被迫加入“厂”、“院”。因为统治叫化子的头儿告诉他们，“作田要交粮，讨米要入行”。这是天经地义，否则就不准在这里乞讨。入厂入院的时候，每人要缴纳二元入院费，如果一次交不起，以后讨来也要补交。这些钱就归乞丐头子——“头牌”所得。

丐帮的头子——头牌

有人可能以为，叫化子头儿也许算不了什么，可能生活还较苦吧？其实他们不仅生活非常优裕，甚至在社会上还是颇有地位的人物呢。南门上厂头牌陈振民当了几十年的叫化子头儿，一般人都称他陈老板，许多商家富豪做红白喜事，都要请他

去赴宴。他自己死娘和生儿子，每次做酒都是一百多桌，后来他在自己年老临终的时候，便把这个“宝座”传给了18岁的儿子。他的儿子陈善庆继承父业，不仅继续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且修建房屋，开设澡堂（三星池），当上了经理。他和他的妻子，冬天的皮袍子都有四、五件，夏天的纺绸、纹纱样样俱全。他如果走在街上，俨然富贵人家子弟，谁还会以为他是叫化子头儿？他家里还请有长工、奶妈，甚至还有管家的。

残 酷 的 剥 削

头牌进行剥削的方法很多，除了收取“入院费”以外，还有吃缺、克扣，缴贡米以及租鞭等等。那时住在厂、院的乞丐只要经过县政府登记在册的，每月都有救济米发放。头牌便采用虚报冒领（死去的乞丐不注销名字）、冒名顶替（救济院来点名时，便临时从外面找几个流动乞丐来顶替）；以及先登记名字，迟几个月才发到本人等种种方法来冒领救济米。在发米时也从不发足应有的数量，如规定每人三十筒，实得只有廿七、八筒。更残酷的剥削是，农村里的乞丐讨来的米还要向他们上缴“贡米”，如衡阳县东乡（今衡南县）系归南门上厂管辖，每一季度从泉溪市、冠市街、茶垌等处送来的“贡米”即达四、五百斤。除上面这些以外，“租鞭”是头牌、二牌一项重要收入（二牌凌万祝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看鞭），这项收入也是依靠控制乞丐而取得的。所谓租鞭就是某户人家做酒，向他们租一条鞭（一根小木棍）挂在门首，鞭上刷过油漆，刻有“南门上院”等字。凡属他们管辖控制的乞丐看到这条鞭，便不准到这里来伸手乞讨。如果不向他们租鞭，他们便指使大群乞丐都去胡闹，弄得人家不可收拾，所以许多人家做酒，为了避免麻烦，都不得不向他们租鞭。他们每租一次鞭，少则几

元，多则几十元，视酒席大小和主人家财力而定。如遇冬季生意特别好的时候，平均每天可进鞭钱四、五十元（以银元价折比）。这些钱绝大部分为头牌、二牌等人所得，只有极少一部分，为了蒙哄大家，才分发少许到众人手里。除上述剥削以外，他们甚至在死去的叫化子身上，也想出主意进行剥削。如有一个乞丐死了，他们便叫另一个残废乞丐守在尸体旁边，嚎啕痛哭，哀求过路人施舍一点掩埋费，过往行人看到情状凄惨，常有给与一角、两角钱的，这些钱积少成多。当然不会真的用作掩埋费，也就大部分纳入头儿的腰包了。

狠 毒 的 刑 罚

说起这些刑罚，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乞丐当中，竟然还有那样名目繁多而且极为残酷的刑罚，可说是骇人听闻。乞丐在入院之初，头儿便向大家宣布他们的“规章”，如有违犯便要严厉处罚。处罚当中用得最多的是“戴锁链”，即把一条铁链子一端系在犯事人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柱子上，使人不能走动，犹如拴牲口一般。这种刑罚只要头儿认为谁犯了事，就可以不问情况先锁起来再讲。如伙子刘新（专门替厂、院挑东西的乞丐），因为夫妇吵架，便被锁过一次。女乞丐刘洪桂因为讲了一句命不好才讨米，叹了几声气，也被锁上。她前前后后总共锁过20多次。戴锁链只不过是一种极普通的刑罚，更重的是各种毒打，有所谓打背心、打长衫、打抱肚、打黄金条，吊半边猪等各种名目。厂内设有专门负责打人的“掌板”。这个人是头儿的忠实爪牙，乞丐们都愤恨地称他为“黄狗”（本名王桂林）。他打人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要是给谁打“背心”，打出的伤痕准是一件背心式样，不会有一鞭走样。乞丐们要犯了什么事才会挨打呢？一般当然也要数上几条所谓“罪

状”。其实有时什么事不犯也会挨打。比如有一次，李金山到帮会头子张大爷家求乞，因他不知，误称张为五爷，即被送回厂内毒打一顿。在打的时候，还要点上蜡烛、线香，买来瓜子、香烟等，头牌身披绣金龙袍，头戴木顶高冠，坐在堂上，两边坐着救济院代表等人陪审，打手侍立两旁。这排场被人称作“半边衙门”。那次打李金山，头儿一声吆喝，打手便如狼似虎，把李金山绑住一手一脚悬空吊在梁上，名为吊半边猪；用竹条狠狠地抽打，名曰打黄金条子。打完之后，还要承认打得对，并承担全部茶点费用。李金山因无钱出茶点费，只好向别人借“打子钱”来还清这笔阎王债。又有一次，女乞丐刘洪桂因女儿有病，向别人讨了一条丝瓜作药方，但头儿硬说她是偷人家的，马上叫人把她绑在桌子上，用一根扁担穿过桌面，绑成一个十字架形，抬到那户人家的菜地里去毒打一顿。后来刘洪桂因女儿病了，自己又挨打，又气又急，成了疯子。乞丐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受着各种毒刑的折磨。头儿还威胁说，如有抗拒不服，擅自逃走，还要砍脚后跟、挖眼睛、钢针穿舌等等，这种象过去西藏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刑罚，不一而足。

是谁给了这些叫化子头儿这样大权力，来对这些赤手空拳、贫苦无靠的乞丐进行任意宰割呢？是万恶的旧社会！这些头儿和反动政府、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保长、区长以至反动政府的官吏或帮会头子做酒，叫化头儿可以送义务粮，不取分文。叫化头儿请“春酒”的时候，地方豪强、恶霸劣绅、贪官污吏都是座上贵宾。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当然不会白吃白拿头儿们的。在必要的时候，往往给头儿以有力的支持。

可 怖 的 痘 疫

在旧社会，饥饿、贫穷与疾病总是不可分离的。这些衣食

无着，饥寒交迫的乞丐，更是与疾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是得了病，那真是只有听天由命。头儿是不会加以任何照看的，医药根本谈不上，拖好了是自己的“运气”，当然大多数人就这样拖死了。1946年，“南门上厂”有个叫猫袜子的乞丐（当时已有三十多岁），又饿又病，四肢无力，以至老鼠叼他的眼睛，他也无力驱赶。后来还剩下一点点气，头儿便叫“索头”（专管掩埋死人的人）将他拖出去埋了。另一个患病的老乞丐刘瘸子。睡在冷尸房里等死，饿得连一杯水也吃不上，只好接屋檐水润喉，最后还是饿死了。就在那一年，还有一户从南乡三塘逃来的穷人，一家八口，两天之内病死七个，最后剩下一个两岁的小孩，爬在死去的妈妈身上吮着奶头。后被一个好心人看见，才将小孩救了去。那年正是饥荒和瘟疫流行的时候，许多人没有东西吃，只好吃野草、观音土，以至很多人都得了肿胀病，死人就象倒柴一样。雨花亭里每天都要摆上几具死尸（有些是外面在夜间送来的快断气的人），多的时候达到十几具。当时担任“索头”的人说，真是埋人不赢。许多死者就被草草地一个挨一个、甚至是成堆地埋在附近的五桂岭荒山上。这些凄惨的事实，说来是多么使人毛骨悚然。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流浪的穷人作了全面安排。愿意回家的，政府发给路费和安家费，帮助他们去农村落户；不愿意回家和无家可归的，政府帮助他们组织生产自救，先后办起了掸帚厂、淘沙提炼厂、草袋厂等，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对那些老弱残废的人，分别送到救济院、敬老院，以终余年。雨花亭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历程，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篇章。

桃花江的迷信活动

刘 建 纲

解放前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五花八门的神权思想在益阳桃花江一带流行甚盛。兹搜集其大端，缕述于后，以警世人而免其死灰复燃。

（1）收吓：农家有人病了（小孩占多数），发高烧，夜不安神，昏迷不醒，就以为是白天或黑夜受了狭促鬼的惊吓，魂不守舍，必须请巫师（师公）收吓招魂。“小收吓”，巫师手捧香米一碗，用手巾罩住，于黄昏之际，在门前遥对天空，右手持米碗，左手念诀作法，口中念念有词，再照病人的头上，连挥三下。再把米倾在手巾里包住，放在病人的枕头下面，枕睡三夜。对巫师的报酬，酒肉茶饭一顿，包封一个。

“大收吓”，要在堂屋中设立香案，巫师请神作法，用黄纸书符数道，宰雄鸡一只，用血祭符。经过“施法”后，把符折成方形，约一寸大，缝一小布袋装入，佩在病人身上，或七天或一月。巫师的报酬要包封一个，香米一升，雄鸡一只，三牲一块。病往往由小病拖成大病，直至死亡。桃江南峰村的胡家翁妈笃信神鬼，尤爱收吓，生了小孩八个，孩子病了，不请医生，只靠此术，结果夭折了三个。

（2）喊魂：小儿病了，昏迷好睡，就以为是白天在荒郊野外游玩，三魂七魄脱离了躯体，逗留在野外。到了黑二更时分，母亲守在病者身旁，点油灯一盏，门外也点一盏灯，高

呼病人名号：“×伢子快回家睡啊！”在野外则预立一人闻声后即回答说：“回来了哟！”重复数十遍，到三更时分，再叫一遍，说是把病人的魂魄喊回来，幻想病就会好。

（3）许斋饭：人偶而患了小病，头痛发烧，就怀疑本家的土地菩萨索食。就备三牲、酒醴、斋饭、荷包蛋二个，到土地庙酬愿，求保安康。

（4）烧包袱钱：夜间作梦，梦见了已亡故的亲人或戚友，适而得病，就说亡灵在阴曹地府没有钱用才归家作祟。要买晒纸数斤，打成纸钱，封成包袱形式，二封或四封不等，备酒饭一桌，焚香秉烛，作揖跪拜，把包袱钱烧掉，祈祷亡灵默垂庇佑，使病人早日痊愈。

（5）“敬夜老爷（乡间称神为老爷）”，人患了疾病，收吓、喊魂无效，以为是神鬼顽固作祟，即请巫师问卦许愿。巫师在堂屋中焚香秉烛，请神作法。首先问卦，手执竹卦一付，口中念道：“是×鬼在此为殃作祸、请降阳、巽、阴三卦（阳卦全仰、阴卦全覆、巽卦一仰一覆）不间。”如卦象相合便列为鬼祟。定日备红花、雄鸡、珍珠、斋饭、包封、香米，请巫师还愿。巫师每敬“夜老爷”一次，便可得包封一个（三元三角三分或一元三角三分），香米一升，雄鸡一只或二只、三只不等。石井头乡杨材冲的刘少哉患了伤寒病，不延医治疗，只敬菩萨，结果钱也花了，人也死了。

（6）冲锣，打翻解，还红油天烛：双江乡团洲村农民丁卓人患时疫症，已至危险阶段。巫师杨某问卦，说是凶神恶鬼附体；就许大愿，还红油天烛，打翻解。请巫师三、五人，敲锣打鼓、吹牛角。巫师身披法衣，头带羽冠，作法事三天三夜，斩鸡九只，杀猪一头（称杀夜猪子），夜里装神弄鬼，把脸搽黑，赤膊赤足，把火砖烧红，在上面行走，称为踏梅山（脚上涂有药工）。还在房前屋后和坟山里钉铁符镇鬼。工资

从高，外要包封银元33元。这次冲锣，用掉谷子40余担，只落得人财两空。

（7）拿妖捉怪：高桥乡张家冲农民李世忠之妻崔氏，患有精神病症，胡言乱语，云是蛇精作怪。家人远至安化石门，接一位菩萨，名曰“田法官”，前来降神打轿，拿妖治怪。神像乃一木雕菩萨，高不到一尺，遍身漆黑，坐在一座高约二尺的小木轿里。轿上面绑木杠一根，出马时本地选精壮少年二人抬轿，名曰“马脚”，同来弟子二人，每天锣鼓喧天，号角震地，堂屋灯烛，日夜通明，香烟燎绕。每次出马，杀鸡一只，筛酒三大碗，把雄鸡血滴入酒碗中，马脚喝了，就来了神，抬着法像，推墙倒壁，登山涉水，在野外狂奔，专打庵场寺庙。时而，马脚倒地，口吐狂言，这样捉精七天，仅在一干塘涵洞内，捉了一条大青虫。云是蛇精变化，用桐油浇了烧掉，其他一无所获。此次，用费数百元，病人崔氏，病情丝毫未见松减。

（8）拜庙烧香：老年人祈求长寿，中年妇女祈祷子嗣，便拜庙烧香。最严重的是，病不延医，依赖神圣，备了香烛，去拜庙求茶救水、抽签、问卦、开药方、问吉凶、查休咎，许愿时备雄鸡一只，茶油若干斤。并捐红丝绸一段，盖在菩萨身上。每年三月三日，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桃江浮邱山朝拜圣帝。九月二十八日也有成群结队的人到赵家山南岳庙去敬南岳福主。解放后，才有所收敛。

（9）孕妇画符：妇女怀了孕，怕“生产鬼”讨替身，就请巫师到家敬神画符。用黄纸写巫符数十道，分贴在住房的门枋上和窗帘上。孕妇本身也配带一道（用小布袋盛着），作法事一场，以求保得孕妇分娩安全。板溪乡天瑞村村民李子俊之妻尹氏，怀孕时画了符，敬了神，分娩时难产而死。后李对人说：“今后再也不信师公子（巫师）的鬼话了”。

(10) 做水陆道场：民间死了人都要做道场。少则两天，多则七天，请来道人、和尚、礼宾多人，设儒、释、道三个法堂。三个法堂都设坛位，儒教堂设立朱文公（熹）神位，由礼宾数人，喊礼祭奠。吟蓼莪诗、唱三叠曲、读祭文……等。佛教堂祀释迦牟尼、木莲尊者圣位，诵金钢经、救苦经、解冤经、血盆经、多心经等。道教堂规模最大，道人也最多。门前竖长幡四面，庭前扎一焦面鬼王（纸的）。室里设立太清、上清、玉清神位，挂满堂功德。功德上绘各种神像，十殿阎王，十八层地狱。满屋香烟缭绕，灯烛辉煌，笙箫齐奏，鼓钹齐鸣，爆竹之声不绝于耳。每一道人身着法衣，头扎道巾，日夜行法事十余场。法事程序：（1）迎神。（2）开路。（3）设灵。（4）祭灵。（5）开生方。（6）破地狱。所谓破地狱是用麻竹48根在庭中插成五花八门，道人持锣打鼓、口唱经文，孝子手捧灵位，高举引路幡子，尾随其后，在麻竹中穿行，然后用瓷碗一个，内装鸡蛋一只，主持道人手执桃木剑猛然一击，把碗和鸡蛋打碎，名为破地狱。（7）渡奈何桥，即用高桌十数张塔成拱桥状，上覆白布。道人一群引着孝子孝女，手捧灵位、举引路幡，越桥面过，名为过奈何桥。（8）孤：设一高台，用大米做斋粿一箩筐放在台上。主持道人披着衣巾，带头巾，上台朗读“孤词”，召来孤魂野鬼，把斋粿掷于台下，再召再掷，直至掷完斋粿为止。（9）烧纸屋。请花匠用竹片作架，再糊上红绿花纸造成纸屋一栋，内设家式用具，应有尽有。置小篋贡数十只，内装纸钱、包袱钱，花纸剪成衣服，装在纸皮箱里，都要贴上“车夫力士”神像，在道场完工的一天，把纸屋搬到附近的荒坪里焚化。也由道人鸣金击鼓，举行法事，朗读阴府放行“关文”。（10）送神、奠土。做一次道场耗用至巨，民国十四年石家段地主豪绅石荷香死了，做道场七天，扎婆娘拜庙48个，铺张浪费，为全乡之冠。解放后板溪乡花桥

口刘姓家死了父亲做了道场三天，用费一千余元。

(11) 打醮：每年秋收后，乡间地主豪绅借酬谢神恩为名，向农民捐款打醮。他们却从中渔利，同和尚、巫师、道士串通一气，大饱私囊。浮邱寺、关帝庙、三仙庙、南岳庙，每年都要打醮一次，时间三天、五天、七天、九天不等。农民负担沉重，豪绅、道士则大吃大喝，玉山颓倒，乐也悠悠。

(12) 还虫蝗福：每年农历五六月，正是蝗虫发展高峰期。农民以为是天降之灾，因而求菩萨吹西风扫除害虫。地主豪绅，发起挨家捐款。请巫师二至三人，设神位祭祀，宰猪一头，杀鸡数只，庆菩萨一天或三天。或接大戏班在郊区搭草台一座，演戏数天，称为还虫蝗福。1934年，南峰村一带发生大蝗灾，乡间戏也唱了，法事也做了，而蝗虫漫山遍野，愈演愈盛，把山间楠竹、田里禾苗蚕食一空。

(13) 求晴求雨抬菩萨游行：乡间如果久晴不雨，久雨不晴，便由绅士为首，纠集农民多人，先设坛祈祷，再抬菩萨游行。浮邱山附近，抬的是祖师菩萨或潘、仙、李三仙真人，浮、葛、许三仙真人。九、八区则抬着关公，敲锣打鼓，铙炮火药，舞龙耍狮子。出动人数宛若一字长蛇阵，游行时间，三至七天不等，往往是求晴不得晴，求雨不得雨，而豪绅道士，还大骂农民心不诚。

(14) 庆娘娘菩萨：乡人如果家门不顺，人口患病，牲畜遭瘟，就请巫师问卦，说是三洞仙娘降临，要在他家设立娘娘坛位。三年一大庆，行法事三天三夜；一年一小庆，行法事一天一夜，行法事要请法师三至五人，扎一花坛，箫鼓乐齐鸣。巫师系“头扎”，穿巫衣，吹牛角，装神弄鬼，号召神兵。夜间带木制面具，大发村言俚语，引人发笑（称笙盘脸子）。每庆一次，要宰猪一头，杀鸡数只。巫师工资包封、香米、用费至巨。石井头乡杨材村杨小春家，为了庆娘娘，年年当田卖

地。只有数年工夫，就把田土卖光。

(15) 装娘娘放阴：解放前夕，沾溪杉木村妇女符巧云，在家里设立娘娘坛位，装仙娘放阴。去问仙娘的人，先天夜里要在家里焚香禀告，第二天备包封一个（内放三元）、香三支、蜡烛一对、香米 1 升，到仙娘家焚香炳烛、叩头作揖。“符仙娘”把眼一闭，打一个呵欠，一会儿就来了神，说是仙娘赴位，或问坟山、屋场，或问疾病、失窃，她就见风转舵，闭着眼说鬼话。还说可以放阴，把死去的亲人魂魄调来和你谈话。信口雌黄乱说一顿，不到十分钟时间，所备钱财就骗到了手。1955 年符巧云被人检举揭发，判刑二年。

(16) 白果仙人治病：安化大福坪，一戴姓屋后，有白果树一颗。他大造谣言，蛊惑群众说，此树是得道的白果仙人降世，百病能治，与人消灾，常化一白发老人，在梦中给人治病。板溪乡柑木村谢明初的七岁小女孩患了瘫痪症，送至安化大福坪戴家治疗，被戴活活打死。后戴某因利用迷信诈骗财物，砸死人命，被人检举，判以死刑。

(17) 六壬菩萨显灵：石井头乡川天界胡之初屋后有一块大花岗岩石。1956 年忽谣传六壬菩萨降生在石头上，能治百病，轰动一时。石头下面香烛堆集如山，鞭炮声终日不绝。每日前来敬神的、求救荼的、求治病的不下百十余人。后被石井头乡政府派来民兵在石上泼了很多屎尿和秽水，臭不可闻，但敬神的人仍在距离十余丈以外，焚香遥祝。后来见不能治病，其怪自败。

(18) 仙水治病：1970 年牛潭河下首河床里泛出一股浑水，迷信的人就大肆宣扬仙水出现，百病能治。凡人吃了，可以益寿延年。不数日竟传开百十余里，求仙水的络绎不绝，河岸上爆竹碎皮就有一寸多厚。石井头乡南峰村村民刘石林、胡桂初虔备香烛，取来仙水吃了，不但不能治病，反而腹里疼

痛，大泻十余天，延医诊治，方始痊愈，连呼上当不小。

(19)看相摸骨：麻衣柳庄，是相术的蓝本。它按照人的面目手掌纹路，进行分析，所言全是骗人术语。面部分上庭（额）管少时二十年，中庭（鼻）管中年二十年，下庭（颌）管老年。天庭饱满，少年腾达；鼻如悬胆，中岁飞黄；地角方圆，晚年安乐。按耳、目、口、鼻、舌，列为五行，依春、夏、秋、冬，观其气色，定期时运。手相，按手指长短掌中纹路，定其夭寿穷通，富贵贫贱。石井头乡南峰村民刘在南于少年时被看相术士看了，说他年龄不满二十岁，就要死亡。他信了术士的话，卖掉田土，每天饮酒食肉，在家等死。可是现年已过50岁依然健在。由此可见，相术是骗人的东西。

(20)算命卜卦：“一支铁竿分休咎，五个金钱定吉凶”，这是江湖上算命先生的一付对联。很多在街上摆课盘、乡间算八字的人自称为铁口或者×神仙，自夸能晓过去未来。他们的蓝本，号《百中经》。按人的生庚八字、年、月、日、时，排成天干、地支，以天干一字、地支一字合并而成六甲，产生夭寿穷通，妻财子禄，夫主荣华。宣扬帝王将相；穷人乞丐，都是由命运决定了的，不得怨天尤人。南丰村刘中枚翁妈，50岁时，八字先生算了她过不得年就要去见阎王，说如果此人不死，他再也不算命了。现在她年满75岁，依然健在。

(21)送关煞：小孩未满12岁，谓之未出童关。走江湖算八字先生为之推算命理，故作惊人之语。称小儿带有各种各样的关煞：如阎王关、断桥关、将军箭、鸡飞落井关……等，有夭折之危。必须请算命先生把关煞送掉，才能长命百岁，易长成人。送一次关煞，须用雄鸡、三牲、酒醴、包封、香米、布、五色线等，要用10多元至20元。南峰村农民刘××一个独生孙子，爱同掌上明珠，请算命先生送了关煞，不久这个小孩患急性肺炎死了，落得人财两失。

(22) 念司命经：每年到了农历十二月，家家都要祭祀灶神，称灶神为“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定福府君值班者”，灶前张氏相公，灶后李氏夫人，日有挑柴童子，夜有运水郎君。司命菩萨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夜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的善恶事迹，再降吉凶。所以家家都希望司命菩萨上天奏善事，下地降祯祥，在年终腊月，都请巫师念司命经。

(23) 春祈秋报：农民作田种土，都希望得到个好收成。每年在春耕时节，就祈祷神圣庇护，风调雨顺，岁稔年丰。由地主豪绅充当首士，户户写费，人人献捐。或唱戏、或宰牛杀猪，请巫师祭祀，称为春祈。到了秋收后，那怕只收得五成都要感谢神的赐予，集资捐费，唱戏酬恩，名为秋报。

(24) 庆菩萨诞辰：每逢菩萨诞辰，乡民备了雄鸡血食、三牲酒醴、香烛鞭炮，前往祝贺。三月三日是浮邱山祖师菩萨诞辰，二月十九日拜观音大士，六月六日庆关公，九月二十八日庆南岳福主，还有其他许多菩萨诞辰，都要前往庆贺。

(25) 烧包做盂兰会放河灯：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有“七月初一鬼门开，阎王放出鬼回来。”的迷信习俗。到了农历七月上旬，家家户户，祭祀祖先亡灵，每天奠三次酒饭，到了七月十三日夜，祀纸钱一封封排在门前荒坪里焚化，献给亡灵。

(26) 施茅山法：茅山猖，供奉通天教主，称为截教。乡人称邪法子，畏之如蛇蝎。人或患了绞肠痧，腹痛不止，说是遇了茅山猖，就要请茅山法巫师前来敬神。扎茅船一只到水边焚化，把茅山猖送走。

(27) 古堂佛：解放前后时期，九区元株坳的黄菊圃、黄国华，千工坝的刘应时，联络一区的昌明早、石井头的刘迪泉、胡春益等多人创立反动会教道门《古佛堂》，替人治病，并诡称黄国华是真命天子降世，到处收门徒发展组织，黄菊圃

自封国师，刘应时称大丞相，封刘迪泉为镇国大将军。大造谣言胡说共产党天下不久长，三年后黄国华就要登基做皇帝，夺取共产党的天下。后被桃江县公安局破获，按其罪恶大小分别判刑，彻底消灭了这一反动组织。

（28）同善堂、慈善堂：解放前桃江镇工商业地主文熙悦兄弟，首创同善堂，联络各地豪绅地主，宣扬神道权至上，名为同善，实为统治压迫人民。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文熙悦镇压，并彻底摧毁了其组织。

（29）宗教哲学研究社：八区农民胡碧生和胡象华兄弟等笃信宗教研究社，秘密发展教徒多人，大肆制造谣言，说末世人民遭劫，只有研究哲学、宗教，打坐修炼才能成佛成仙。他们借打坐为名，奸淫妇女，蛊惑群众。胡碧生还遁入大山之中，不食烟火，只吃水果度日。在山洞中坐炼40余日，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才出山回家。解放后取缔反动会教道门运动中枪决了首犯孔某。许多中坚分子如胡象华、胡碧生等被判刑，其反动组织亦被彻底消灭。

“政权、族权、神权”是封建统治者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大绳索”，“神权”的麻醉作用更为严重。时至今日，封建迷信，仍孽根未绝，且有死灰复燃，日益猖獗之势。特揭露此29种以警世人。

澧县禁烟见闻

郭德山*

鸦片烟，俗称大烟，是一种麻醉毒品，久吸成瘾，不易戒除。长期吸食，使人怠惰昏庸，感情迟钝，精神萎靡，体质消瘦，所以是一种危害人体健康，缩短寿命的毒品。

民国建立，吸食鸦片的人（以烟枪烧吸者为“吸”，以烟泡吞服者曰“食”）有增无减，许多人终日吞云吐雾，伛偻骨立，因此，世界列强都称我们是“东亚病夫”。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初，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下，被迫颁布禁烟的法令。

禁烟法令规定：中央设立禁烟委员会总会，省、专区、县皆分层设立支会、分会。

4年禁绝，第一年领取吸烟执照，第2年劝戒，第三年勒戒，第4年处死刑。

开始登记领取执照，凡是吸食鸦片者，只要领取执照，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吸食。每张执照费5角，半年更换一次。

在此法令颁布以前，原来售卖的商号，都叫做“土栈”，法令颁布以后，一律改为“土膏店”。凡是领了营业执照的土膏店，可以设店挂牌售卖，但须缴纳重税。

政府中除设立禁烟委员会外，并附设戒烟医院（第3年改

*郭德山，澧县老中医，根据当时见闻写成此文。

为勒戒所)。戒烟开始，一律采取自愿。禁烟委员会的主任由省方委派，以下有秘书、书记、科员、会计及密缉员。当时在澧县下层的密缉员有彭丕忠、余子云、严铁焕等人，终日出没于烟馆，执行“任务”。

在戒烟的第一年，街上的烟馆林立，每天早饭后和晚上是“瘾君子”抽烟最多的时候。这时候密缉员全体出动，分段挨次在每个烟馆内查铺，凡是吸食鸦片的人都须检查执照，若是查出没有执照，就抓到监狱里去，处以罚金，但若暗暗给密缉员一笔钱，就可以悄悄放掉。若是捉到禁烟委员会去，就要重罚，但如能给科员、办事员一笔钱也可以释放。

第二年劝戒，凡是抽烟的人，仍旧可以改领新执照，就能继续抽烟。不过要订立戒烟规划，并接受劝导，自带伙食到戒烟医院去戒烟，或增加执照费，继续抽一段时间。已戒烟的，若是再抽，捉到后即处以重罚。凡是更换执照的人都须接受劝导，保证马上入院戒烟，或订立半年规划后再戒，最多也只能订立一年的规划。

第三年勒戒，即勒令戒除。停止土膏店经营烟膏，严禁贩运，取消烟馆，不再继续发给执照。凡在私馆或在家庭吸烟被捉者，一律押送至“勒戒所”硬性戒除。

这期间，对于戒烟执行人员来说，正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凡捉到的人，由于勒戒太痛苦，必须以重金贿赂，才得释放，每放一个有钱的人，多达30石谷。城关的大商户吕裕和小老婆吕三元，捉到监狱里，来了烟瘾，送几个烟泡就花了光洋数10元。

第四年判死刑，在城关枪毙了10个人。有一次枪毙两个中年妇女，一个是堰塘的人，一个是城关的人叫张大姐。由于这两个妇女都是穷人，枪毙了。而有势有钱的张么婆、金姑、李乔生、吴浩然等都吸烟，他们却可以逍遥法外，安然无

恙。

有一天枪毙4个人，在划珠笔的时候，我曾挤到伪政府内部去看。其中有一个姓朱的在津市（原属澧县）开私烟馆，绰号叫“猪老壳”。还有一个姓张的，是湖北公安人，在津市做皮花包生意，为了一个妓女争风吃醋，却被恶棍诬害为吸鸦片而提到县政府来的。当从监狱绑出来的时候，他大声呼喊：

“你们要查明白！我不抽烟！我只有28岁！”在跪下呼名点珠的时候，喊他的名字，要他答应，他不肯答应。当政府陈正时科长把4个人的名字喊完，珠笔划完，推倒桌子后，姓张的知道已无希望，大声骂道：“你这个狗官哪！我是冤枉哪！”随即把这4名“烟犯”枪毙在小南门外。

最奇怪的是刚刚枪毙了烟犯，国民兵团军医吴浩然随即倒在卧铺上抽烟（他是有烟瘾的人），兵团团长马旭也卧下来陪灯（他是无瘾而是好玩的人）。警察所长蔡思泉碰进去看见了，说：“好大的胆子，刚才枪毙了人，你们还敢抽烟”。吴浩然笑着说：“杀人杀不到我们头上来！”一时街上传为奇谈。

这次全国上下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又监禁、又罚款、甚至还杀了人，为什么还是禁不了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凡吸鸦片的人，有权的不能杀，有钱的不得杀，这样怎么能把法令贯彻得下去呢？所以在澧县虽然杀了10个人，卖的还是卖，吸的还是吸，不过隐蔽一点而已。

二是旧政府办各种事务，多半是“一紧二松三不管”，碰到松的时候，你就是幸运的人；碰到不管的时候，你就是自由自在的人。

三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紧接着武汉失守，长沙1次大会战。这些客观形势的冲击，粉饰了禁烟运动的天折，成为禁烟运动“龙头蛇尾”的借口。

湖南花鼓在台湾

唐友邦*

湖南乡亲沦落台湾，个个思乡心切，彼此相聚，都喜欢哼几句家乡花鼓戏调，聊解思乡之苦。在1963年的一个晚上，台北市吴兴街蔡龙彪乡亲的家里来了两位乡亲朋友，他们是周伏生和王杰，偶然谈到筹组花鼓剧团计划。因为兴趣相投，一拍即合，三人决定合资合力，并推选蔡为团长。随即培训了一批人员，组成“湘宁业余剧团”，并已依法向台北市备案，这是台湾省有湖南花鼓剧团的开始。

当时，凭“花鼓戏”三字，就的确够吸引人的了。花鼓戏在台北中山堂开锣之日，曾引起全城轰动，中山堂里人山人海，远住金门、马祖的乡亲也有乘飞机来台北购票观看的。演出的剧本，是根据蔡龙彪、王杰、李舜、邓盛才等人回忆出原始词曲片断，由周伏生主编凑成一本“讨学钱”和唐桂凡自编的另一出戏。乐器简单得只有胡琴和唢呐。尔后还到高雄市搞了几场演出。就这样，在“台湾省中国大陆地方戏剧研究会”的档案里留下了一段湖南花鼓在台湾的创始记录。

为了发扬家乡文化，当湘宁剧团处于艰难拮据时，“湖南剧团”继之而起，发起人是唐应涛乡亲。唐素来兴趣此途，且

*唐友邦，湖南宁乡人，曾在台湾参与了组建花鼓剧团的工作，后从台湾回老家定居。该文是他回乡后写的回忆录。

略有积蓄。湖南剧团诞生后唐应涛自己任团长，除留用湘宁的原班人马外再招兵纳将。他主持团务的原则是“三好”：一是学习精神好；二是台上节目好；三是生活安排好。同时又聘请徐增汉乡亲为顾问。徐先生很有音乐和戏剧知识，曾不遗余力倡导家乡花鼓戏，外号“花鼓精”，是花鼓戏革新的主脑。从此，花鼓戏文场方面增加了扬琴和笛子，并灌制唱片分赠乡亲同好，极受同乡们的喜爱和推崇。剧团顾问徐增汉乡亲因失调养，一病经年而不幸逝世。徐的去世，使剧团蒙受重大损失，

“台湾省地方戏剧协会”及“文化促进委员会”均表惋惜，曾赠“痛失英才”的祭幛悬挂灵堂以示吊唁。最特别的是同乡组织治丧委员会时，兴起唱湖南花鼓悲调去灵堂哭灵。因此，湖南花鼓剧团在台湾由梨园弟子创下别开生面的“花鼓哭灵”先例。

唐应涛组团后，团务抓得较紧，能督促大家认真排练。又由于王杰编导得力，演技很有进步。后因湘剧组扩充过急，以致积蓄很快就花完了，经费难以为继。

“台湾省文化促进委员会”和“湖南同乡会”为了维护该花鼓剧团的存在，之后又在台北市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人包括“文促会”的负责人梁世德先生和同乡会的代表、关怀剧团的很多乡亲以及团里全体干职演员。会议决定遵循朱庆云总干事的“五不”政策，以致力于剧团的巩固发展。“五不”的具体内容即：第一是尽量开源，不搞滥费；第二是集思广益，不逞个人英雄；第三是湖南人唱湖南戏，不吸收外省人参加；第四是多编写新时代的剧本，不演陈旧的戏；第五是排练未到成熟阶段绝不演出。

这次会议，本来旨在团结一致以振兴家乡文化，不想两派之间造成了意见上的较大分歧。几年来，一派主张墨守成规，认为花鼓本来是“斜门”戏，不需改革。一派则力主革新，认

为必须演些反映时代生活的节目。唐应涛因故辞去了团长职务，改由朱庆云担任团长。朱庆云一本初衷热心团务，在任内费尽了唇舌与国立复兴剧校及联勤总部剧团取得联系，吸收很多湖南籍学生加入阵容。

这些学生本来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一经排练，个个出色，该团的“演员荒”从此解决了。这些学生年轻，又是正规学校出身，具有一定的革新进取精神。基于这一情况，只好由李安荣、唐桂凡、周伏生、纪超和我等赶编一些新剧本排练演出，包括“七姊下凡”、“偷诗赶潘”、“小姑贤”、“全家团圆”等。其中我编写的“七姊下凡”被选拔参加庆祝“双十节”的文艺演出，得到观众的好评，并在参加台湾戏剧节的会演中荣获赞誉。湖南花鼓热闹一时，世新电台每星期都有湖南花鼓戏播放。正是湖南花鼓在台湾轰轰烈烈的攀峰时期，朱庆云因故招来人怨，他愤而辞去团长职，由刘应堂乡亲继任。刘团长乐不在说，也想作点贡献，随即去香港向华侨们募了一笔可观的“乐捐金”，再转回大陆家乡观摩了几场花鼓戏，回台后，力主向大陆学习改革。可惜因病不治在上任不久后逝世，剧团一时群龙无首。究竟补选谁为团长，大家意见分歧，几次会议都无决定。1980年6月，经“湖南戏剧文化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大陆地方戏剧研究会同意，由卜翠云接管团务。

此后，另组建了复兴剧团，台湾国大代表向无畏先生也邀请成秋阳、马锡庆、朱庆云、严国璋（中兴国乐团团长）等人在台北自宅加紧排练文场，并重点培训尚在戏校就读的几位学生，也决定另组剧团新开局面。这时，我也有班戏剧学生，而且这班学生都是能歌善舞的山地姑娘，很有实力和新竹或桃园县合作组团，如果能和王杰紧密配合，花鼓戏是能别开生面的。比乡亲们更关怀剧团的还是台湾省文化促进委员会和湖南同乡会，两会认为三团鼎立将造成人才的分散，互相争夺演出

市场，乡亲间难免不伤和气。经文促会、同乡会，以及花鼓戏界元老商酌，认为要从中斡旋，搞“三潭印月”，决定成立“再兴剧团”作团结的中枢领导。筹备时期由唐桂凡代理团长掌握实权。1983年2月，“再兴剧团”正式成立，4月5日在立法院第二会议室召开会员大会并改选团长，宣布剧团交某某贤达接管，梁世德主任代表“文促会”发言，呼吁大家要搞“和平统一”，对内演出各显身手（包括乡亲们喜庆日的邀请和同乡会春节的活动），对外演出就要用“再兴剧团”的名义（包括全省会演和出国演出），三水合流。

笔者已经离开台湾多年了，希望在台的戏界同仁，能凭借花鼓戏的一角宣传阵地多给乡亲们作点贡献，给乡亲们以美的享受和思乡的慰藉，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不是吗，旅台的很多乡亲们都喜欢哼一哼：“有泪皆成血，无家何处归，只有花鼓调子解乡愁？”

回忆“台湾军校”

杨 异 撰*

1947年，我部驻扎福建厦门。这年10月，我从厦门前往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第十六期学习。当时全国共办了9个军官训练班，除台湾这个训练班外，还有徐州、兰州、西安等地亦办了班。

台湾的第四军官训练班共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区队，每个区队分3个班。每个班9人，这期共有一千多学员。我编入三大队七中队一区队一班学步科。当时蒋介石任名誉校长、关麟征上将任校长、孙立人上将任陆军训练总司令。我们三大队的大队长是郭楠上校、中队长是牧政中校。

这期招收的学员都是行伍出身、自排长至营长一级的初级军官。学生来源，均由各部队选拔。教制、教材、教授方法等方面，基本上仿照美式，武器装备亦全部美式，美国教官10多人。课本有《步兵操典》、《阵中勤务》、《射击教范》等，

《剿匪戡乱》手册亦人手一册。政治课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时事形势”、“剿匪戡乱”等。唱歌内容有“义勇军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等。

我记得孙立人将军经常在凤山军营操坪讲台上训话，以他

*杨异撰，湖南人，曾在台湾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率中国远征军驰援缅甸，拼死抗击日军，屡建战功的亲身经历，勉励学生树立“保国卫民，乃军人之天职”的思想。他常讲解“孙子兵法”，以此作为教学带兵之方。他的谆谆教诲，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校期间，我们每天4点起床，跑步30华里，然后于7点半钟吃早饭，8点上课。每周星期二、六上午在教室上课。其余时间在室外训练，称之“打野味”。训练要求很严格，教官动不动就打人，搞的是军阀作风。学校伙食，每餐3个菜，吃大米饭，一个星期吃半斤肉。那里盛饭、盛菜不用瓷碗，全部是楠木碗，别有风味。军校周围有密密的铁丝网，军营达10多里，有十几栋三层楼的教室。我们就在铁丝网内学习、训练，不得随便离开军校。

台湾凤山在台南西部，离海有几百里，系丘陵区，盛产甘蔗、水果、高丽参等。在校期间，军校组织了几次集体参观。我们参观了屏东糖厂，该厂规模较大，是台湾产糖最多的糖厂。台湾的饮食传统来自闽粤，食品以“甜”为特色，无论宴席上各种名菜，都有加糖习惯，故台湾糖业发达。台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不仅甘蔗产量高，果树生长条件亦得天独厚，一年四季均有果实成熟，又可称之为“果树之乡”。我们还参观了世界有名的日月潭，潭中的水有红绿色，真是色彩斑斓，令人留恋。

1948年庆祝“双十”节时，我撰写了论“两党必须合作，一致抵御外侮”的文章，约二千来字，登载在《台湾日报》上。为此受到了奖励，亦被孙立人将军赏识。他亲自召见了，我，并题“前程无量”四字赠我。毕业时，因我各项成绩优异，孙将军又要留我在军校任教官。由于我怀念故土，不愿留在台湾孤岛，故未从命。

1948年10月底，我毅然离开了台湾。离台登轮时，同学旧

友依依难舍，至今难以忘怀。我仍回到了厦门，任闽南师管区司令部上尉人事参谋。由于我不愿参加内战，故一再向师管区司令童懋山提出辞职，并正式交了辞职报告，终获批准。1949年7月，便从厦门返回湖南老家，与家人团聚。

40余年来，我日夜思念着我曾学习过的台湾军校，思念着在台湾的同学旧友。我热切盼望着祖国的统一，盼望着同学的早日团聚。抚今忆昔，赋诗两首：

其 一

四十年前在凤山，冲破封锁返湘南。
只为人类谋解放，粉身碎骨心亦甘。

其 二

救国当年不顾身，效命疆场立奇功。
离别校友当年少，如今皆是白头翁。

（彭德才整理）

